# 中国经济走向

## ——宏观经济运行与微观经济改革

刘国光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 目　录

## 第一篇　总　论


1　学习周恩来经济思想——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00周年 …… (3)
（1998年2月）

2　学习邓小平经济理论，更好地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 (32)
（1997年2月）

3　加强邓小平经济特区建设理论与实践的研究 …… (35)
（1995年1月）

4　十五大报告对经济理论和政策的重大推进 …… (39)
（1997年9月30日）

5　中国经济适度快速稳定增长的理论与对策 …… (46)
（1997年9月2日）

6　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 …… (55)
（1997年11月2日）

7　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若干难点问题 …… (64)

（1997 年 12 月 2 日）
**8　实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跨世纪发展规划的一个关键问题** …… (75)
（1995 年 10 月）
**9　“九五”、2010 年发展目标与增长方式转变问题** …… (79)
（1995 年 11 月）
**10　学习《薛暮桥回忆录》** …… (90)
（1997 年 1 月 25 日）

## 第二篇　宏观经济形势跟踪

**11　1994 年国内经济形势与 1995 年展望** …… (95)
（1995 年 3 月 17 日）
**12　当前中国经济的走向** …… (103)
（1995 年 6 月 13 日）
**13　对当前经济形势与宏观调控取向的一些看法** …… (115)
（1995 年 11 月 5 日）
**14　我赞成继续“适度从紧”** …… (123)
（1996 年 1 月）
**15　经济形势分析与宏观调控对策** …… (128)
（1996 年 5 月 3 日）
**16　对当前经济形势与若干流行观点的一些看法** …… (133)
（1996 年 8 月 21 日）

17　当前我国经济形势的特点与问题 …… (149)
（1996 年 10 月）
18　论“软着陆” …… (156)
（1997 年 1 月 7 日）
19　关于就业问题及其他 …… (166)
（1997 年 4 月 25 日）
20　略论当前经济形势 …… (174)
（1997 年 7 月 17 日）
21　从短缺到宽松 …… (180)
（1997 年 9 月 15 日）
22　再谈“买方市场” …… (185)
（1997 年 10 月）
23　“软着陆”成功后的经济形势和对策 …… (197)
（1997 年 10 月 11 日）
24　增长速度·宏观调控·供求关系 …… (203)
（1998 年 4 月 27 日）
25　东亚金融危机与中国 …… (210)
（1998 年 5 月 27 日）
26　当前中国经济形势 …… (217)
（1998 年 6 月 23 日）

## 第三篇　经济体制改革
## （国企改革为重点）

27　关于以国有企业改革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

问题 …… (225)
(1995 年 3 月 17 日)
28 谈谈当前中国国有企业改革 …… (232)
(1995 年 5 月 11 日)
29 当前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和难点问题 …… (239)
(1995 年 5 月)
30 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的协调改革问题 …… (246)
(1995 年 9 月 20 日)
31 抓大放小,从整体上搞好国有经济 …… (252)
(1995 年 11 月 5 日)
32 努力探索搞活国有中小企业的新路子 …… (260)
(1996 年 6 月 20 日)
33 中国中小企业改革若干问题 …… (267)
(1996 年 11 月)
34 重视集体经济的发展和改革 …… (308)
(1997 年 7 月 11 日)
35 对股份合作制少些指手划脚多加规范引导 …… (315)
(1997 年 8 月 1 日)
36 关于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 …… (320)
(1998 年 2 月 26 日)
37 私营企业主是社会主义的帮手 …… (328)
(1995 年 10 月 17 日)
38 中国证券市场之我见 …… (332)
(1995 年 11 月 16 日)
39 论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前景 …… (344)
(1996 年 2 月)

40　证券市场规范化建设与监管 …… (349)
（1997 年 1 月 2 日）

## 第四篇　地方经济

41　略论“京九”沿线的资源开发 …… (355)
（1995 年 1 月 10 日）
42　关于城市经济发展战略问题 …… (358)
（1995 年 11 月 5 日）
43　发挥武汉在地区协调发展中的作用 …… (364)
（1996 年 1 月 29 日）
44　“一国两制”是香港回归后经济繁荣发展的
可靠保证 …… (371)
（1997 年 5 月 8 日）
45　在深圳市政府第四次高级顾问会上的发言 …… (375)
（1997 年 5 月 19 日）
46　江苏应为全国发展挑重担 …… (384)
（1998 年 6 月）

# 附　录

## 记者专访

1　中国统计改革的目标取向——建立现代统计制度 …… (391)
（《北京统计》1995 年第 1 期）
2　从单项改革转向制度创新 …… (395)
（1995 年 1 月 10 日《中国市场经济报》）
3　大转变时期的消费问题 …… (399)
（《消费经济》1995 年第 5 期）
4　物价上涨难避免，通货膨胀须控制 …… (404)
（1995 年 7 月 20 日《中国贸易报》）
5　坚定信心，搞好国有经济 …… (407)
（1995 年 8 月 28 日《工人日报》）
6　转变增长方式迫眉睫，加快体制改革同步行 …… (412)
（1995 年 10 月 11 日《中华工商时报》）
7　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转变 …… (419)
（1995 年 11 月 25 日上海《文汇报》）
8　证券市场正在规范发展 …… (430)
（1995 年 12 月 20 日《证券报》）
9　国债市场：进一步规范和发展的方向与举措 …… (434)
（《证券研究》1996 年第 1 期）
10　财政、货币政策将继续“适度从紧” …… (442)

（《北京周报》英文版 1996 年第 22 期）
**11　收缩国有经济范围** …… （447）
（1996 年 12 月 3 日《中国经济时报》）
**12　坚持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 …… （452）
（1996 年 12 月 31 日《金融时报》）
**13　进一步加快发展深化改革** …… （455）
（1997 年 1 月 25 日《深圳特区报》）
**14　正确理解“发展是硬道理”** …… （458）
（1997 年 3 月 14 日《中国经济时报》）
**15　股份合作制不是“搞私有化”** …… （462）
（1997 年 6 月 11 日《中国经济时报》）
**16　股份合作制至少存在 20 年** …… （468）
（1997 年 8 月 27 日《中国新闻》）
**17　十五大以后中国改革形势和经济走向** …… （471）
（1997 年 9 月 30 日《中国经济时报》）
**18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改革的行动纲领** …… （480）
（1997 年 11 月 3 日上海《文汇报》）
**19　必须大力发展证券市场** …… （489）
（1997 年 11 月 22 日《中国改革报》）
**20　永久性与世界性研究课题** …… （493）
（1998 年 5 月 14 日《澳门日报》）

后　记 …… （497）

# 第一篇

## 总　论

# 1 学习周恩来经济思想*

## ——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00周年

## (1998年2月)

1840年的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走向。曾经创造了发达的古代经济和璀璨的古代文化的东方文明古国,其传统社会结构陷入了一种被迫、急促、曲折和痛苦的历史嬗变过程中。我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既是遭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而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深渊的屈辱史;也是开始觉醒、开始漫长而悲壮的现代化追求的奋斗史。但发端于"洋务运动"的近代化进程,百年来所取得的成效非常有限,由资产阶级领导的社会变革和现代化努力,也一直没有获得成功。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由新的理论、新的领导、新的主体和力量构成的一场以实现独立、民主、富强的现代化国家为目标的伟大革命运动。它的胜利宣告了鸦片战争以来"屈辱的一个世纪"的结束。独立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奠定了真正启动现代化建设的前提和基础,中国的现代化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

* 本文系为1998年2月在北京召开的《周恩来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写的论文,与毛立言合作。摘要发表于中共中央党校《燧石》杂志1998年第2期。

少年时代就决心“为了中华之崛起”而奋斗终生的周恩来，不仅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卓越领导人之一，以其赫赫功勋彪炳史册；他更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奠基者和开拓者，在我国现代化历史丰碑上镌刻着他光辉的业绩。在经历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初期的艰辛探索和曲折，在我国的现代化进程终于大踏步迈进的日子里，迎来了周恩来同志诞辰 100 周年。值此，我们谨以回顾总结周恩来领导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思想和实践，作为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这位奠基者和开拓者的缅怀和纪念。

## 一

中国近代在经济文化诸方面落后于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历史事实和由此陷入的悲惨境地，决定了尽快实现以工业化为基础的现代化是历史提在中国人民面前的基本任务。当我们在 1949 年通过长期革命战争的浴血奋斗终于争得了对外独立和对内统一这个实现现代化的基本前提时，能否深刻而清醒地认识到这一基本历史趋势和任务，就成为能否承担起领导建设新中国的关键；能否始终坚持和加深对这一基本历史任务的认识，则是我国经济建设能否顺利发展的关键。

周恩来同志作为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核心主要成员之一，在其领导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思想和实践中，始终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为整个经济建设的核心和目标。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思想和目标，是周恩来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核心和灵魂。

在新中国即将诞生的时候，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

一届全体会议上，周恩来同志就向全国人民宣布，我们的目标是“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要把中国由一个农业国变为工业国”①。当经过努力，在很短时间内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以后，从1953年起，我国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正式启动。周恩来同志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时刻，在1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不仅更为明确地提出了“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的地位”，而且第一次非常郑重和明确地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在我国“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的任务②。周恩来同志认为，“我国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③ 基于这种对我国历史发展基本趋势的把握，周恩来同志以后多次强调这一任务和目标，不断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经济建设必须以四个现代化为中心。直到十年动乱中，周恩来同志已经身患重病时，在1975年1月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所作的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中，还重申了1964年12月向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提出的分两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计划，号召全国人民向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前进④。充分显示了他对这一基本目标的执著和坚定。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3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32页。
③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32页。
④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79页。

周恩来同志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以现代化为中心，我们经济建设的总体目标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思想，是有着他的深刻的理论依据和认识依据的。首先，他把握和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宗旨，即无产阶级政党的一切活动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周恩来明确指出，革命的根本目的，是"解放我国的生产力，使我国国民经济能够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得到有计划的迅速的发展，以便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并且巩固我们国家的独立和安全。"① 其次，他深刻认识和把握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反映和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周恩来认为，社会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就在于"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②。从根本上讲，周恩来同志从中国历史的发展及其与整个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关系这个宏大的视野，深刻地洞察和认清了我国社会发展的基本历史趋势和整个社会发展的主题，就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时代赋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历史使命，是摆脱落后境地、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要求和需要。周恩来指出：现在世界上各方面的事业都在飞跃发展，我们要迎头赶上，就要着重研究现代的问题，要一代胜过一代，做出比前人更大的贡献③。他认为，中国只有实现四个现代化，才能"立足于世界"，才能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32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59页。
③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447页。

这不仅是因为从国内来看，“中国百多年来的历史特别是近二十几年的历史表明：中国一直是帝国主义侵略盗匪的重要目标，因此胜利了的中国人民不可能没有强大的国防力量来保护自己”①。“我们必须迅速改变国民经济长期的落后状态”。同时从国际方面来看，我国实现了四个现代化，就“可以促进社会主义各国经济的共同高涨，并且可以增强保卫世界和平的力量。”②

周恩来同志不仅坚定而明确地提出了我国经济建设的总体目标，而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根据我国的国情指明了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要求和推进这一基本历史任务的战略步骤。周恩来同志提出，我们实现工业现代化的具体要求，“就是要使自己有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即“自己能够生产足够的主要的原材料；能够独立地制造机器，不仅能够制造一般的机器，还要能够制造重型机器和精密机器，能够制造新式的保卫自己的武器，像国防方面的原子弹、导弹、远程飞机；还要有相应的化学工业、动力工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等等。但是，应该指出，基本上完整并不是说一切都完全自足。”③ 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要求是，“实事求是，循序前进，相互促进，迎头赶上”，“要有雄心壮志，尽快赶上世界先进水平。”④ 同时，他还从四个现代化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系统出发，强调指出：“我们的四个现代化，要同时并进，相互促进，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3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25页。
③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32页。
④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12页。

不能等工业现代化以后再来进行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①

对于我国推进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和战略步骤，周恩来同志指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15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② 从实际的发展进程来看，虽然存在着“文化大革命”那种必然会阻碍现代化进程的非正常的动乱因素，但第一步目标还是基本上实现了。第二步目标要求和实际进程不可能完全吻合，其中有“文化大革命”那种政治上的因素的影响，也有对国情和现代化的客观标准和内涵认识不足的地方。这种情况是任何一个政党和领导者都难以完全避免的。实践证明，对我国实现现代化这一基本历史任务认识得深刻与否、坚定与否，是检验一个领导者对我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把握得如何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周恩来作为我国四个现代化的首倡者，并始终坚定不移地为之奋斗、付出了毕生精力的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事业的奠基者和开拓者，虽然他的认识还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而且也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没有很好地付诸实施，但其影响却是巨大和深远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和我们党重又确定的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对周恩来这一核心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12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79页。

## 二

中国的现代化不是通过资本主义途径实现的现代化，中国的社会主义也不是工业化已经完成和现代化已经实现或正在实现条件下的社会主义。这个现实同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有着很大的差异。怎样认识这种历史条件下的社会主义？怎样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这种形态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就成为一个非常深刻的具有很大难度的历史性课题。

周恩来同志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早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研究的基础上，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诞生和在探索中发展，对现实中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认识也在不断发展。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我国社会的性质和未来走向问题，也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发展和将来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问题，实际上已经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理解问题摆到人们面前。基于对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生产力高度和物质基础的认识，周恩来不仅严格区分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界限，而且认为将来向社会主义转化，也应该有客观物质基础的依据。对于我国必须经历一个新民主主义阶段，而不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原因，周恩来认为，“实现社会主义要有一定条件的”，其中包括，落后的经济变为先进的经济，工业化相当高了，人民觉悟提高了，还有国内外情况等等。如果条件不成熟，就急于转变到社会主义，“并不能实现社会主义”。对照东欧各国的情况，周恩来指出：“没收资产阶级的企业，去掉资

产阶级，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做法，我们中国有所不同。”“中国的经济是落后的，要实现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还需要动员各方面的力量。要发挥资产阶级的积极性，让它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经济事业，使我们的经济能更快地发展。”①

总之，他认为进入社会主义，要转变得很自然，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水到渠成”。既不能脱离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过早地否定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的作用，也不能脱离群众的觉悟水平，急躁地把将来的前途当作今天就要实行的政策。不论是经济建设，还是经济改造，都应当稳步前进。

后来，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践中，针对当时一些不同的见解，周恩来坚持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两个方面来认识和判断社会主义，他一方面提出要全面认识过渡时期的目标，指出社会主义最基本的标志就是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取消了生产资料的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农业、手工业集体化了。所以，仅仅把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作为过渡时期目标和任务是不完全的。同时他又指出，社会主义是建立在一定物质基础之上的，国家工业化是经济改造的关键。因此，过渡时期的中心内容，就是实行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②。至于过渡时期的长短，则取决于是否基本上完成了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如果这些任务

① 周恩来：《发挥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积极作用的几个问题》，1950年4月13日。

②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254页。

“基本上实现了，过渡时期就算结束了”①。

正是由于周恩来对创造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物质基础的重视，所以他对在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时出现的那种只讲社会主义改造而忽视国家工业化的倾向是不赞同的。他在1954年9月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们必须用全力来实现宪法所规定的我们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而这里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人人都要关心提高我们国家的生产力。我们必须了解，增加生产对于我们全体人民，对于我们国家，是具有决定意义的。”②

当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他针对一些人认为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就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就完结了的想法，进一步从建立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角度提出了两个过渡的思想。他指出：过渡时期是两个过渡，一个是三大改造，一个是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第一个过渡比我们过去设想的时间是大大的提前了，但在逐步实现工业化过程中，过渡时期还不能算走完。他说，要使工业在工农业产值中的比重占到70%以上是很不容易的，不能随便提出“提前完成中国工业化”的口号，“我们过渡时期还是照原来设想的那样长一点没有坏处。这可以督促我们更快的努力使工业生产发展的规模更大，速度更快。”③ 他针对一种认为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说法，更为严格地指出：“也可以这样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05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44页。

③ 1956年2月6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党委会第17次会议上的讲话。

说，不过不怎么样准确。因为有两种过渡嘛！”他认为，完全进入就得建成社会主义，而建成社会主义就要消灭剥削和贫困，还要消灭愚昧。“不然，会给人们一种错觉，以为我们现在已进入社会主义了，我们什么都是社会主义了，原来社会主义就是这样。”就是说，这会降低社会主义的标准，就会对社会主义产生误解。他还指出：“要真正巩固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成果，必须实现工业化才行。如果没有工业化，农业即使合作化了，也不巩固。手工业也是如此。”①

可以看出，周恩来与那种脱离生产力的发展、片面地注重生产关系变革的倾向不同，认为要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不只是要实现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而且还要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他认为，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资产阶级从整个阶级意义上来说，已经不存在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已不再是主要矛盾。但过渡时期并没有完，社会主义还没有建成，只有再经过“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消灭了剥削，消灭了贫困和愚昧，才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种注重生产力发展程度和社会物质基础，把社会主义区分为未建成的不完全的社会主义和建成后的完全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可以说是后来邓小平和我们党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思想渊源和雏形。

50年代中后期，周恩来等同志针对当时急于求成的倾向，提出反冒进的意见，受到批判。接着，在“左”倾错误思想影响下，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出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误，遭受严重挫折。周恩来在总结这些实践经验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91页。

中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又有了新的发展。他更加坚定了要依据生产力发展水平来实现生产关系变革的思想，更加明确了生产力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1961 年，他在同一位外宾谈话时指出："我们把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看作是一个长期的任务。""社会主义是指生产关系而言，同时也表现在生产力上。""现在中国很穷，很落后，离富强的要求还很远，需要几十年才能赶上去。因此我们党和国家的政策和指导思想是一切为了有利于生产关系的改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增加。如果政策收不到以上效果，那就应该予以纠正。"1962 年 1 月，周恩来对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书面报告草稿，提出应该"把所有制的改变要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农民觉悟程度来决定的意思补写进去。"4 月，他又在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上指出："我们过去有一段时间设想得太容易一点，以为经过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我们的社会不是属于全民所有制就是属于集体所有制，好像社会主义改造很快就能完成。不仅农村，城市都得进入人民公社，把街道里弄都改造过来，成员都改造过来。而且还有一部分人，认为很快地就能从集体所有制转到全民所有制。现在看来这些想法是不恰当的。"① 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改造要随着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进展才能相应地完成。如果说我们中国实现现代化需要几十年的时间，那么，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完全建成，就得花更长时间，然后才能向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前进。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比较长期的想法，认识社会主义改造需要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395 页。

一个很长的时间。”①

在片面注重生产关系变革、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脱离了现实条件的“左”的倾向影响很深的情况下，周恩来却注重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物质基础的这一基本点出发，来认识现实社会主义的存在条件、成熟程度和未来发展问题。从这里，我们不是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后来邓小平和我们党强调的生产力标准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胚芽吗？

## 三

在我国实行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以前，“左”的倾向在1957年以后就开始出现并日益严重。在这种“左”的倾向长期笼罩的气氛下，周恩来同志却一再强调，我国国民经济要健康发展，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必须坚持“科学的态度”，“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在当时的艰难情况下，这是难能可贵的，充分显示了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成熟和坚定。大家知道，“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周恩来同志对实事求是有精辟的见解。他认为，实事求是这四个字，话虽简单，却包含着丰富的内容。要做到实事求是，不是那么容易的。而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一定要认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才能指导经济工作②。就一定要“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③；可以说，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务实精神是周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96页。
② 转引自《周恩来的思维艺术》，第303页。
③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50页。

恩来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基础，是他领导我国经济建设的指导原则，这一思想和原则贯穿在大到对社会主义发展速度和发展程度的认识，小到每一项具体的经济工作当中。

在对社会主义的建设速度方面，他意味深长地说，我们“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工业建设可以加快，但不能说工业化提早完成。晚一点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有什么不好，这还能鞭策我们更好地努力。”① 当1955年下半年在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等问题上出现一些忽视客观经济规律、操之过急的设想时，他指出，“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②。他再三指出计划要符合实际，不要光热火朝天，而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他认为，反对右倾保守当然是重要的，对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但领导有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

在制定、实施经济计划方面，他指出，我们的经济计划，不管是“远景计划”，还是“年度计划”，都必须切实可行，不能冒进，特别要注意“积极稳妥”、“综合平衡”。要做到这一点，一方面“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另一方面，“应该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③ 周恩来提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90～191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90页。
③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18～219页。

出："凡是不合乎实际的就要修改"。他认为，计划发生不符合实际的情况时，就应该修改计划；实际情况超过了计划的，也应该承认，计划不能一成不变。

在经济建设的各项具体工作当中，在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问题上，周恩来也反复强调要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他提出，进行经济问题的调查研究时，必须对事物进行分析、综合和比较，要敢于正视困难，解决困难，总的原则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坚持真理，修改错误"。他认为，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就要反对经济建设上的浮夸作风，反对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反对弄虚作假的思想作风。1961 年，周恩来就把实地调查了解到的农民反对办食堂、不赞成供给制的实际情况向毛泽东作了电话汇报。应该看到，那个时候在"左"倾思想日益严重的情况（当时就有因反映农民反对办食堂而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精神，是多么不容易，多么可贵。这样做，不仅在当时起到了减少"左"倾影响造成的损失的作用，而且也为以后我们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打下了基础。

## 四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总是在一定的制度和体制框架中运行的，选择何种经济体制作为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是一个关系到它的运行绩效乃至成败的问题。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形成的"斯大林模式"曾经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体制典范，在世界社会主义实践中产生了

广泛的影响。中国也不能例外。这一模式的形成和运行有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成效，但后来被证明是效益低下的。但是认识和摆脱这种模式的影响并最终校正这种体制，是要经历一个历史过程的。当我国开始创建社会主义制度及其具体运行体制的时候，虽然“学习苏联”是当时唯一的选择，但我国领导人较早地就提出要对苏联经验采取分析的态度，要结合中国的情况来学习。当这种高度集中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在初期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而开始逐渐暴露出一些固有的弊端时，周恩来同志对这些弊端就有所觉察，开始思考和探讨如何改进我国的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很重要很有远见的思想。

在所有制形式方面，周恩来看到，在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和基本完成以后，在人们的思想中和实践中已经出现了一种追求所有制和经济组织“一大二公”的倾向，他就开始制止和纠正这一倾向。1956 年，针对全国一些地区忽视农业技术条件和干部管理水平盲目地把小社并为大社的倾向，他指示农业部派人实地调查。当年 8 月他在会见外国的一个农业代表团时说：在我们国家“最近有希望搞大社的趋向，因此造成一些强迫命令”。他认为，在没有实现机械化以前，合作社“太大了不好搞”，“原来就是小社，不要再让他们组成大社”了。他怀疑有些大社是否搞得好，主张还应“搞些个体生产”，因为我国农民有“人力畜力耕作时代的个体耕作习惯，同时合作社增产不能很快，所以搞些个体生产，对改善农民的生活是有利的。”“从工业方面来说，小型工厂固然有它的缺点，但是它们在生产经营方面比较机动灵活，容易适应多样的、经常变化的需要。因此，凡是经营合理并且能够适应社会需要的小型工厂，

都应该保存下来，不应该草率地加以合并或者取消。”手工业合作组织一般也“不宜过分集中”，应该“使大社、小社、小组同时存在”，“以便于直接为居民服务，时时便于吸收家庭辅助劳动参加生产”①。

在所有制结构方面，他针对当时存在的一味求纯的倾向，提出要允许作为公有制经济补充形式的私有、个体经济存在和发展。1957年4月，针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在所有制结构上暴露出来的问题，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阐述了他关于多种经济成分的主张。他以开办煤矿为引子明确地提出了各行各业都“来一点自由，搞一点私营”的构想。他说：“大煤矿国家办，小的合作社、私人都可以开。……搞个办法，把过去的规定改一下，这样有好处。主流是社会主义，小的给些自由，这样可以帮助社会主义的发展。”“大概工农商学兵，除了兵以外，每一行都可以来一点自由，搞一点私营的。”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些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②。在工业方面，有些手工业，“可以让他们自产自销，不必勉强组织起来”；在商业领域，要“有计划地组织一部分自由市场”，在一定范围内，“实行产品的自产自销”；“在城市居民区或者广大农村中，都应该保持相当数量的小商小贩，采取合作商店、合作小组、代销，甚至完全自购自销等等方式，更好地为居民服务”③；在农村，“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

① 1956年9月16日，周恩来《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和报告》。

② 1957年4月6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八)。

副业。”① 可以看出，周恩来关于所有制形式和结构的思想是对当时追求“一大二公三纯”倾向的一种大胆的纠正。

在分配方式和分配政策方面，周恩来很早就认识到原有分配体制中存在的平均主义弊端，提出要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反对平均主义，同时防止收入差距过分悬殊。1956 年 3 月，周恩来指出，工资制度中的平均主义倾向等问题“尖锐地突出来了”，“现在非解决不可”了，“要求我们来一个全面的改革”。他深刻地指出：“平均主义是一种鼓励落后、阻碍进步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同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制度毫无共同之点。平均主义妨害职工学习技术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积极性，对于发展经济建设很有害，因此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平均主义”②。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相适应的原则是按劳取酬”；“对于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国家所付给他们的报酬还应该有一定的差别。取消这种差别，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提高业务、技术水平都是不利的”③。基于这种认识，周恩来提出和领导了在分配制度方面的改革，建立新的奖金制度、升级制度，并逐步扩大了先进定额标准的计件工资制的范围。改进后的工资等级制度“对熟练劳动与不熟练劳动，繁重劳动与轻易劳动”“规定了比较明显的差别。”并且“适当地扩大了低等级工人与高等级工人工资标准的差距”。对高级知识分子“规定了较高的工资标准”，对知识分子中“有重要贡献的规定了加发特定津贴的制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典》。
②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143 页。
③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八)。

度”。他特别强调，“应该根据按劳取酬的原则，适当地调整知识分子的工资，使他们所得的工资多少同他们对于国家所作的贡献大小相适应。”①

在主要反对分配制度中的平均主义的时候，周恩来也提出防止收入差距过分悬殊、注意社会公平的问题。他认为，在社会分配问题上既不能发展平均主义，又要保证不能只让城市中一部分人，乃至城市中也是极少数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而广大人民首先是农村的人民生活水平不能提高，造成悬殊太大。高级工资不要跟低级工资相差的倍数太多。这是我们工资中应该注意的②。

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周恩来同志很早就认识到受“左”的错误倾向影响而形成的社会福利制度方面存在的弊端。他在1957年7月提出公费医疗制度也“有很多毛病”，需要研究解决。后来他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正式向全党提出改革公费医疗制度的问题，并明确提出了和个人利益挂钩的改革建议，“劳保医疗和公费医疗实行少量收费（门诊、住院和药品），取消一切陋规，减少国家补贴”。同时，他还提出改革城市住宅管理制度，认为原来收费过低，指出公房的“租金一般应包括折旧、维护、管理三项费用”，用这个办法解决国家在住房方面的财政负担。

在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周恩来提出了改革高度集权的经济管理体制，正确处理中央集权与地方、企业拥有一定自主权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72页。

② 1957年3月24日，周恩来在杭州市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的问题。他指出："社会生产力发展不能光靠集权"①，"中央集权的政府，权太多了，很容易养成官僚主义"②。认为苏联近20年由于"过分集权于中央，进一步集权于斯大林"，"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比应有的少了"③。基于这种认识，他提出了改革高度集权的经济管理体制、实行分权的思想。他认为，分权问题主要不在于现有的企业究竟是归中央还是归地方管理的问题，"主要的是使地方有权"，"地方除了有党权、政权（就是行政权）以外，还要有人权、财权。"④ 除分权给地方外，还"必须给每一个生产单位以一定的自治权力"，"给它一定的机动范围"，使企业的"经营积极性不受阻碍"⑤。

周恩来同志很客观地认识到，在改革中探索一个比较完善的经济管理体制不是一下子就能完成的，各种改进后的体制还要"在执行中不断改进。实行一个时期，又要有改进，要不断改进。"这实际上是要在认识和实践相互作用的长过程中来探索适合现实的经济管理体制。因此，他在领导和推行分权改革的时候，坚持了实事求是的稳妥求实的原则，他提出要"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统一计划，分工合作；因地制宜，因事制宜"，而具体实施的范围和进程则是"全面改进，逐步实现"⑥。

---

① 1956年6月23日，周恩来在国务院体制会议上的讲话。

② 1956年5月3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司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上的报告。

③ 1956年6月23日，周恩来在国务院体制会议上的讲话。

④ 1956年6月23日，周恩来在国务院体制会议上的讲话。

⑤ 1956年5月3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司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上的报告。

⑥ 1956年6月30日，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的发言要点。

具有非常突出的务实精神和坚持从生产力角度思考问题的周恩来，较早地看到传统体制的弊端并提出了进行体制改革的思想并付诸实践，虽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还不可能达到我们今天的高度，但其中有些观点是相当深刻的，特别是其基本思路对后来邓小平和我们党全面改革理论的提出是有积极影响的。

## 五

作为一个后发超越型的以现代化为发展目标的国家，能否认识现代化的实质，能否认准和抓住推动这一历史进程的基本动力，是我国实现强国富民这一现代化宏伟目标的非常关键的问题。

周恩来同志作为一位受过现代西方工业文明熏陶、有很高文化素养的知识分子型的国家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显示出非常突出的思想特色和非凡洞察力。他深刻认识到科学技术是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基本推动力量，一贯强调科学技术在实现现代化中的关键作用。在我们刚刚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 1956 年，他就强调指出：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期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他还从我国科技现状出发，提出了发展科技事业的宏大任务，他说：我国的科学文化力量目前是比苏联和其他世界大国小得多，同时在质量上也要低得多，这是同我国六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的需要很不相称的。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力求尽可能迅速地扩大和提高我国的科学文化力量，而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这是我们

党和全国知识界、全国人民的一个伟大的战斗任务①。在1963年初，他又非常明确地指出："我们要正确认识科学技术现代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意义。我国过去的科学基础很差。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②

周恩来同志从我国实际出发，对科技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战略性的安排，奠定了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他在领导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过程中，针对初期存在盲目性和缺乏长远打算的情况，提出要"作出全面规划，分清缓急本末，有系统地利用苏联科学的最新成果，尽可能迅速地赶上苏联水平。"③ 在他的主持下，1956年我国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按照规划要求，除基础理论一项外，各项任务均在1962年提前完成。在此基础上，周恩来又主持制定了《1963～1972年科技发展十年规划》。在整个科技事业的发展中，他还极富远见地提出要摆正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关系，指出"为了有系统地提高我国科学水平，还必须打破近视的倾向，在理论工作和技术工作之间，在长远需要和目前需要之间，分配的力量应该保持适当的比例，并且形成正确的分工和合作，以免有所偏废。"④ 1972年他又提出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我国之所以能在高科技领域占有一

① 《周恩来经济文选》，第233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12页。
③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83页。
④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83页。

席之地，卫星能上天，原子弹能爆炸成功，是与周恩来对科技事业的重视和正确领导分不开的。

正是基于对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这种关键作用的认识，周恩来同志也就很自然地对作为承担和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知识分子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正确地解决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

新中国建立前后，周恩来一再告诉全党要十分重视人才和科学技术问题，指出“今天最大的不足是知识分子不足”。“我国要建设，干部、人才就成为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他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需要出发，提出了建立一支包括原有知识分子、知识化的工农干部、大中专毕业生和出国留学生在内的宏大的知识分子队伍的任务。他一再告诫党的各级干部要克服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要尊重、信任、关心、爱护知识分子，使他们能充分发挥业务专长。在我国大规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开始起步的时候，在知识分子问题成为一个突出的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问题时，他在党中央于1956年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的会议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我国知识分子队伍进行了正确的估价。他指出，经过解放后六年多党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知识分子中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们中间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在团结、教育、改造旧知识分子的同时，党又用了很大的力量来培养大量的新的知识分子，其中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劳动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周恩来同志说：“由于这一切，我国的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对于当时存在的对知识分子问题漠不关心、低估知识界的巨大进步，

否认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不给知识分子以应有的信任和支持的看法，周恩来给予了严肃的批评。他认为这是党内的一种宗派主义倾向，是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应该防止和纠正的主要倾向。1957 年后，随着“左”倾思想的发展，党内产生了把我国的知识分子看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错误看法。1962 年，周恩来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工作、戏剧创作等会议上，再一次就知识分子问题发表了看法，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进一步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他从“知识分子不是独立的阶级，而是脑力劳动者构成的社会阶层。一般地说，这个阶级的绝大部分人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是附属于当时的统治阶层并为其服务的”①。再次重申要“把知识分子放在劳动者之中”，“对知识分子的估计要以这个为纲”。他说，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周恩来同志对知识分子的所作的这种符合历史实际的正确分析和估计，对于调动和发挥知识分子在现代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和影响。

也正是基于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关键作用，周恩来同志对我国的教育事业同样给予了极大的重视。他一贯强调教育事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他认为，掌握科学技术的各类人才是建设社会主义、推进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培养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掌握科学技术的各类人才的教育事业，是对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具有直接和长远影响的一项最重要的事业。1951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354 页。

年，他在政务院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反复强调大力培养建设人才。50年代中期，世界处在新科技革命的前夕，要发展经济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人才问题就更为突出。周恩来又强调指出：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进行国家建设和推进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就必须努力培养建设人才①，为国家培养各项建设人才，首先是工业技术人才和科学研究人才，是教育工作的首要任务②。1963年，当他更明确更完整地提出实现"四化"的战略目标时，又强调指出教育不仅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基础，同时也是整个现代化建设的基础。

周恩来同志在对整个教育事业如何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进行了全面、深入、具体的分析和研究的基础上，从我国实际出发，提出了教育事业发展的战略方针，对我国的教育方针、教育制度和教育体系等问题都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他的这些思想和实践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基础，促进了这一重要事业的发展。

今天，我们党在总结历史经验，深刻把握现代科技、教育事业发展与进一步现代化的关系基础上，提出了具有重大意义的"科教兴国"战略，其中，不也包含着周恩来关于这一问题的极有远见的思想和卓越智慧吗？

---

① 《周恩来教育文选》，第140页。
② 《周恩来教育文选》，第140页。

## 六

在错综复杂不断变化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下，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怎样认识和处理依靠自己力量和争取外援的关系，怎样认识和对待与世界各国的关系，也是一个十分重要而且不可回避的问题。

周恩来同志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目标出发，明确提出了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既要立足于自力更生，又要积极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的思想和方针，较早地提出了采取开放态度、向外国学习的问题。建国初期，周恩来就提出，国家建设要以国内力量为主，“生产建设上要自力更生，政治上要独立自主。”① 1956 年他向党的八大所作经济工作报告中指出，那种认为经济建设可以依赖外国援助，不要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想法是错误的；而“另一种关起门来建设的想法也是错误的”。他指出，“由于各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民族独立的力量日益强大，国际局势日益趋于和缓，我国同世界各国在经济上、技术上、文化上的联系，必然会一天比一天发展。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孤立思想，也是错误的。”② 1964 年，周恩来同志在向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指出：“自力更生是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基本立脚点。”“国际合作必须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同时，“外国一切好的经验、好的技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10 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226 页。

术，都要吸收过来，为我所用。”①

然而，对外关系，不是单方面的事情。它不仅取决于自己的愿望和所确定的方针政策，而且还受到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制约。我国要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候争得比较好的外部环境，争得尽量多的与外国经济技术交流的机会，获得对外开放和向外国学习的条件，就必须依据世界政治基本格局的现实，确立一个既有利于我们发展需要又符合世界上多数国家愿望的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奠定我国对外关系的基础。周恩来作为一位杰出的外交家和战略活动家，创造性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建立新型国家关系和国际新秩序的准则。这五项原则同和平共处的目标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规定了相互对等的约束条件，兼顾了当事各方的利益，从而为世界各国实行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些原则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作为战后国际关系中强权政治、冷战对峙的对立物，反映了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愿望，成为国际关系中普遍承认的基本原则。这样，就为我国奠定了为了自身的经济建设而积极主动地实行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的基础，获得了在维护国家主权和根本利益基础上实行对外开放、向外国学习的基本条件。

在这样的基础上，周恩来提出了“和平经济政策”的概念，主张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往来和合作。他提出，发展经济一方面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也要靠国际合作，自力更生建设独立经济并不排除和拒绝平等贸易、互通有无、技术进口、相互援助，特别是经济不发达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40～441页。

的国家更需要发达国家的技术和设备。他还特别强调，我们应该学习一切国家的长处和优点，包括资本主义生产上好的技术、好的管理方法。他认为敢于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就是最有自信心和自尊心的表现，这样的民族也一定是能够自强的民族①。

周恩来同志作为奠定了我国对外开放基础的具有高度洞察力和战略眼光的卓越领导人，一直同当时在对外关系上存在的那种“左”的错误倾向和思想进行着坚决的斗争。1973年2月周恩来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1973年经济计划时，曾批评和指出了当时的一种错误思想和做法。他说，有的出国考察代表团考察回来，也不敢讲外国人的长处，好像一讲就给我们脸上抹黑。要他去考察，就是要把人家的长处学回来，不然，出去干什么？周恩来明确指出，对于外国的长处，就是要学习。不敢说人家的长处，也不敢说我们自己的短处，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是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他曾经严厉地指出：“极左的作法，说得好，是空想；说得不好，就是破坏。”令人遗憾的是，在“左”倾错误的影响和当时特定的国际政治关系下，周恩来这些关于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和实行对外开放的思想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现。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和我们党确立的对外开放战略和政策中，终于得到了实现和进一步的发展。

当我们回顾建国以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回顾周恩来领导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光辉业绩时，不能不使我

① 《周恩来经济文选》，第256页。

们深深感到，要找到一条符合国情、符合客观规律和符合我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也就是要找到一条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和我国实际结合起来的中国现代化之路，具有多么大的难度，同时，又是具有多么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任何在这种探索和开拓中作出贡献的人，都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周恩来作为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基阶段和开拓时期的卓越领导人，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重要成员，在整个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中，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建国以后，周恩来作为政府总理，辅佐毛泽东领导国家建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的作用和影响是决定性的。周恩来在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在执行毛泽东的基本决策中，在许多方面都有发挥和创造；在有些方面，有些时候，又有所补充和校正；所有这些，都有着他的思想特色。他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探索者和先驱者之一。他所做出的重大的历史性贡献，必将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心中。他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执著追求、坚定信念、宝贵思想和不懈奋斗的崇高精神，必将激励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率领下，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实现几代中国人为之奋斗的宏伟理想。

**参考文献：**

1.《周恩来选集》下卷，1984 年 11 月版。
2.《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 2 月版。
3.《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12 月版。
4.《周恩来生平大事记》，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7

月版。
5.《周恩来和他的事业》,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0 年 9 月版。
6.《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八),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典》,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11 月版。
8.《周恩来教育文选》,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4 年 12 月版。
9.《周恩来经济思想研究》,王毅武、刘同德著,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11 月版。

# 2　学习邓小平经济理论，更好地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1997年2月）

邓小平同志的经济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新鲜经验的科学概括。邓小平同志在经济领域中提出的一系列重大论断、基本观点和战略思想，深刻地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改革和发展的规律，形成了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是他创立和发展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他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作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制定经济建设的任务、方针、政策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超越阶段。他认为，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现阶段的最根本任务，一切任务都要服从

---

* 本文系作者为悼念邓小平同志而写，发表于《求是》杂志1997年第6期。

和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是他提出了判断是非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针对原有经济体制严重束缚生产力的状况,邓小平同志提出改革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改革具有解放生产力的意义,"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对中国改革的伟大试验,他确定了胆子要大,步子要稳的指导方针。在所有制改革方面,他提出了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允许和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在分配制度改革方面,他提出了坚持按劳分配为主,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的政策。在经济运行机制方面,他突破传统观念,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两者都要用的科学观点。邓小平同志的上述思想,为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框架,奠定了理论基础。

邓小平同志还把对外开放作为我国一项基本国策,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他提出建设经济特区作为对外开放窗口和改革试验场的思想,带动了全国的改革和开放,形成了全面开放的新格局。

在经济发展方面,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制定了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提出了要抓住机遇,争取出现若干个速度比较快,同时效益又比较好的发展阶段;指出发展战略的重点是农业、能源交通、科学教育。他特别重视科学技术的地位和作用,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新观点,认为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是把科学技术搞上去;要尊重知识,尊重人

才。

在包括经济理论在内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近20年来我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国的经济体制正在稳步地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已提前实现翻两番的任务，国家经济实力大为增强。人民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正在从温饱向小康水平迈进。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威望空前提高。所有这一切，无不是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取得的。近20年的实践经验证明：这一理论是指导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唯一正确的理论。坚持学习和运用包括经济理论在内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我们就能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取得新的胜利。

当前，我国经济学界正与全国人民一道，深深悼念邓小平同志。对我们经济学界来说，学习和运用邓小平经济理论，提高我们经济科学工作的水平，是悼念邓小平同志的最好方式。我们要按照江泽民同志提出的要求，进一步深入学习邓小平经济理论，完整、准确地掌握邓小平经济理论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要特别注意学习邓小平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科学态度和创造精神，使我们的经济科学工作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需要，更好地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伟大实践服务。

# 3 加强邓小平经济特区建设理论与实践的研究*

## (1995 年 1 月)

中国经济特区是邓小平同志提议创办并亲自设计、指导实施的。创办经济特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举措,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具体形式之一。邓小平经济特区建设思想是他改革开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改革开放思想又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可以说,小平同志经济特区建设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创办经济特区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生动体现,用西方评论家的话说,是"致力于现代化的大胆行动和创造性决策"。它充分体现了小平同志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马克思主义者的高瞻远瞩。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有人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特区建设成就,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特区姓"社"不姓"资"。姓社姓资的问题,是一个实践问题,而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问题,判断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

---

× 本文系作者为《邓小平经济特区建设理论与实践》一书所作的序言,发表于 1995 年 1 月 22 日《深圳特区报》。

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的标准直接回答了特区姓社姓资问题，无论对评价特区的过去，还是指导特区的未来，都具有直接的指导作用。但“三个有利于”的理论意义并不局限于特区和判断姓社姓资，而是具有普遍意义。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大报告中就明确指出它是“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的“归根到底”的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使实践标准更具体更丰富了，大大丰富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

邓小平经济特区建设思想，超出了国外搞特区的做法和经验，形成了全新的社会主义经济特区理论。早在小平同志倡议之前，世界上就有若干国家办了一些经济特区，虽然种类繁多，但创办的目的和功能都比较单一，除了为实现某一功能而在政策上有所区别外，特区与非特区没有什么不同。而中国的经济特区就不一样了。小平同志提出特区是“四个窗口、一个基地”，大大超出了国外所有的特区。小平同志还希望通过特区发展带动所在省乃至整个内地的发展，并提出了特区为中心，依次为开放城市、沿海开放带、长江流域直至全国的全方位开放构想；让特区在改革方面带头大胆试大胆闯，创出经验供全国借鉴，以及通过特区的试验为社会主义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闯出一条新路等等。小平同志这一系列构想、指导和谈话、部署等，构成了全新的内容十分丰富的社会主义经济特区理论，进一步丰富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从1979年4月邓小平同志提出创办经济特区至今，已整整15年了。15年来，广东、福建、海南将小平同志创办经济特区的思想付诸实践，五个经济特区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然而，与经济特区建设成就相比，经济特区的理论研

究，还显得不够。尤其是在我国改革迅速向纵深层次发展、开放向全方位层次推进的新形势下，特区面临着许多新课题，需要我们根据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不断发展的实践去研究探讨。随着开放由特区、沿海向沿江、沿边和内陆城市推进，这些地区也实行类似特区的优惠政策，出现了所谓“特区不特”的问题。特区如何进一步发展，如何继续发挥“窗口”、“基地”的作用，特区还要不要办下去？对此，江泽民总书记在今年视察广东时的谈话中明确指出，中央对办特区的决心不变，特区的基本政策不变，特区的地位和作用不变，特区建设将贯穿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始终。中央对特区的信心、决心、政策不变，加上特区的先行优势以及独特的区位优势，我想，特区是能继续当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继续发挥“窗口”和“基地”的功能的。尽管如此，也还有不少新问题有待研究。如：特区如何增创新优势，如何提高整体素质；特区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如何继续进行超前探索；特区产业结构如何升级，产品结构如何优化，特区产业产品结构升级与优化又如何与内地产业产品结构的调整相协调；特区怎样进一步扩大开放，特区的对外开放与全国其他地区对外开放又如何分工协调；如何搞好特区精神文明建设，等等，都需要探讨，此外，关于内地如何学习借鉴特区经验扩大对外开放问题，关于如何逐步缩小特区、沿海与内地的差距问题等等，也需要研究。

以上问题的研究解决，对我国特区未来的进一步发展，对全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上新台阶，都将具有深远而重大的意义。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加强特区建设问题的理论探讨和研究。深圳市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彭立勋等同志长期致力于

这方面的研究。他们将学习、研究邓小平同志经济特区建设理论和总结、阐述特区建设实践经验有机结合起来，写成了《邓小平经济特区建设理论与实践》一书，在特区建设问题的理论研究上进行了新的开拓。该书系统地阐述了邓小平同志经济特区建设思想的内容、特色和伟大意义，多角度多层次地研究了它对我国经济特区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指导作用；同时，全面归纳和总结了特区建设15年来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启示，分别就特区的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经济发展、民主政治和法制建设、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等领域进行了翔实的分析和研究，对特区两个文明建设的基本经验作了深入总结和阐发，同时也进一步探讨了特区未来发展模式与定位问题。全书既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又具有较强的实际指导意义，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一项重要成果。希望该书作者继续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大胆探索和研究经济特区改革、开放和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总结和概括经济特区改革开放和两个文明建设的新鲜经验，把经济特区建设问题的理论研究继续推向前进。

# 4 十五大报告对经济理论和政策的重大推进*

（1997年9月30日）

十五大报告向全党提出了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历史使命。它对世纪之交的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战略部署，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了科学回答，在理论和政策上作出了重大的推进。

在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方面，十五大报告的贡献是十分丰富的，这里只列举主要的几点：

## 一、第一次完整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

《报告》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概括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分别

---

* 本文系作者1997年9月30日在中国经济社会文化交流会召开的十五大文件座谈会上的发言，先后在1997年10月21日《中国改革报》、《理论研究》1997年第23期和《价格理论与实践》1997年第10期摘要发表。

从所有制结构、资源配置方式、分配制度等方面进行了剖析，阐明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逐步走向共同富裕。这一概括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制度的原理，完全符合邓小平理论对社会主义本质和根本原则的科学论断。

## 二、提出了跨世纪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两大任务

《报告》指出：从现在起到下世纪前10年，是我国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努力实现“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为下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报告》深刻指出，在这个关键时期，我们必须解决好两大课题：一个是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个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这两大课题的解决，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全局。这是对跨世纪的关键时期提出的总任务，写在《报告》第五部分阐述八个方面经济问题的前面，作为引子，言简意赅，提纲挈领，高瞻远瞩，极为重要。

## 三、在所有制结构方面对公有制的含义和实现形式有重大突破

针对一些人士认为国有经济比重下降会不会影响“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制的主导作用”,《报告》指出,公有制不等于国有制。集体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经济成分和集体经济成分也属于公有制。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不等于行行业业、大大小小什么都要国有。国有什么都搞,力量分散,就起不了主导作用。主导作用体现在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部门和关键领域的控制力上,所以不宜把国有经济的有限力量分散到国民经济各个领域和大中小各种类型企业上。由此引出了国有资产的结构调整和有进有出的战略重组任务。《报告》明确指出:只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命脉的控制力得到增强,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并不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这一解释是科学的,有力的,有助于解除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疑虑。

关于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报告》明确指出,应允许其向多样化发展,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也就是符合“三个有利于”原则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报告》对近几年人们特别关注的股份制与股份合作制是不是搞私有化的问题,作了回答,指出股份制是一种现代企业的资本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不能笼统地说它是公有或者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强调只要控股权在国家和集体手里,实行股份制不但不是削弱而是扩大公

有制的支配范围。对于目前城乡大量出现的股份合作制，报告作了分析，指出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以资本联合为主的股份合作制属于集体经济的范畴，要加以支持和引导，不断总结经验，使之逐步完善和规范。强调实行股份制不能刮风，不能硬定指标推广。现在有许多不规范的名不副实的股份制，要规范清理。应当指出，《报告》中特别提到了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并不意味公有制经济改革所能采取的实现形式只有这两种。除了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外，公有制经济还可以有各种各样组织形式，如社区所有企业、社团所有企业和各种共同基金，包括投资基金、各种社会保险基金，等等，都可以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所以公有制经济有着非常宽阔的活动天地，其主体地位是不会动摇的。

在“所有制结构”一节，《报告》还明确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继续鼓励、引导，使之健康发展。这是在党的文件中第一次明确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过去的提法是非公有制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必需、有益的补充。现在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一，它对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要，增加就业，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因此，如实地明确它的重要地位是必要的。

十五大报告中关于完善所有制结构的这些新论断，都有利于推动经济体制改革，促进生产力的大发展。

## 四、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方面制定出一系列的重要决策

众所周知,国企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和难点,碰到的问题和改革的思路,过去讲过不少。十五大报告突出地强调了以下几点:

1. 在重申按"十六字"要求,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现规范的公司制改造时,进一步明确国家和企业的权利和责任,既反对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经营活动,又反对企业损害国家作为所有者的权益;强调要培育和发展多元化投资主体,以推动政企分开和转换企业经营机制。过去试点企业独资较多,难以实现政企分开,有的与上级主管部门不愿放权有关,有的因效率低困难多找不到入股对象有关,这两方面的问题都要解决。

2. 强调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必须同结构改组、技术改造和加强管理结合起来。着眼于整体上搞好国有经济,而不是救活每个企业。要抓大放小,实施战略重组。通过市场形成有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不能用行政拉郎配的办法;采取多种形式加快放活国有小企业的步伐。这样,把十四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系列成功的经验写入十五大报告,丰富了国企改革的内容。

3. 对于国有企业改革中碰到的难题,特别是"钱从哪里来,人往何处去"的问题,明确了解决的思路。如在资金筹措问题上,提出"要采取多种方式,包括直接融资,充实企业资金",把发展资本市场同企业的股份制改造结合起来。在安排就业与再就业问题上,报告中写进了近几年来形成的"鼓励兼

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实施再就业工程”等新的系列经验，首先要求党和政府采取积极措施，依靠社会各界力量，关心和安排好下岗职工的生活，搞好职业培训，拓宽就业门路，推进再就业工程；同时要求广大职工要转变就业观念，提高自身素质，努力适应改革和发展的新要求。这对于形成企业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保证职工生活和社会安全，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 五、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是对社会主义分配理论的新贡献

《报告》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同时，比较强调按生产要素分配，提出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这对于鼓励居民投资和激励科技投入，将产生巨大作用，特别受到科技人员的欢迎。《报告》还对如何解决人们关心的分配不公问题进行了阐述，对取缔非法收入，整顿不合理收入和调节过高收入提出了对策。大的思路是清楚的，问题在于落实。

## 六、进一步明确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和健全宏观调控体系的关系

《报告》强调要着重发展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市场，完善生产要素价格（利率、租金、汇率等）形成机制；总结了近几年宏观调控特别是成功实现“软着陆”过程中的新经验，如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一项主要任务，把实施适

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注意调控力度，写进了《报告》；并根据近几年国际国内经验，提出加强对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包括证券市场的监管，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等等，这些论断在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都是第一次出现。对于加强宏观调控，保证经济平稳发展，具有极其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以上所述，主要是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十五大报告中有明显新意或有重要进展的论述。在经济发展战略方面，《报告》也有不少新的论断，包括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等问题，这里就不一一叙述。在全面学习十五大报告的同时，我们经济界人士尤其要深入学习如《报告》第五部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的论述，认真领会其精神实质，并将其贯彻到工作中去，解决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

# 5　中国经济适度快速稳定增长的理论与对策*

（1997 年 9 月 2 日）

从 1978 年算起，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历了 18 个春秋。在这 18 年里，中国经济平均保持了近 10% 的增长率，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两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并取得了宝贵的经验。这些经验归结为一点，就是坚持改革开放和实行适当的宏观调控政策，是实现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快速稳定增长的最重要的保证。

目前，种种迹象表明，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进程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在这一新的时期中，我们将面临一些新的问题。如何将以往的经验与新形势相结合，就成了我们必须深入探讨的问题。仅就这个问题谈谈我个人的见解。

---

* 本文系作者 1997 年 9 月 2 日在广东省北海市举行的“中国经济适度快速稳定增长理论与对策”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发表于《经济研究》1997 年第 10 期。

## 一、转轨时期中国经济快速与稳定增长的一致性

像其他国家一样，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也是在波动中前进的。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保持了快速增长的同时，经济波动的振幅却比改革开放前明显减小，表明中国经济存在着快速与稳定增长并存的内在机制。对中国现代化历程的简明回顾可以表明，这一机制正是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的反映。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中叶，外国列强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从此使中国陷入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境地。从那时起，中国的志士仁人为了救亡图存，就开始了为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奋斗历程。

在一个多世纪前赴后继的奋斗过程中，他们认识到，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的政权，就没有民族的独立、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安定，也就不可能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因此，建立强有力的国家政权成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首要目标。

1949年的人民革命，标志着这一目标在政治上的完成，但要真正实现这一目标，还要为新生的人民政权建立经济保障。这就决定了，在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中需要一个特殊的阶段，我们将其称为狭义或早期工业化阶段。这一阶段的工业化主要以服务于新生政权的建设为内容，目的是建立起强大的国防和有效的行政管理体系。这一特殊的目的决定了不得不把发展重工业置于首位，并且在客观上要求实行以行政命

令为主体的计划管理体制。

在1949～1978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率并不低，在30年中，国民收入增长了4倍多，但与此同时，人民生活水平却只提高了1倍。发展重工业，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本身成了目的，而工业化的真正目标，即满足全社会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反而降到了次要位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国经济学家有时把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称为"供给导向型"经济。由于缺少市场需求的有效约束，不仅使供求之间的结构平衡难以实现，也无法实现供求间的总量平衡。所以，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出现了剧烈的震荡。

到70年代，中国的工业体系已经很齐全，工业化已经具备相当强的基础，进入全面工业化的时机已经成熟。以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市场取向改革为标志，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出现了阶段性转变。如果说，前一阶段是"供给导向型"的经济，那么，1978年末的改革开放则使中国经济向着"需求导向型"经济转轨。

各国工业化的经验表明，结构变动特别是产业结构的变动构成了工业化时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内容，没有结构变化就没有经济持续增长，而需求与需求结构的变动则是这种结构变动的基本动力。回顾中国18年来的经济增长历程，可以看到，中国的经济增长同样遵循了这一规律。一方面，经济的增长，使人均收入有了较大提高，收入的提高导致了需求结构的变化，突出表现为对消费品、中间产品等工业品的需求大幅度增长。从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看，自1981年以来，按可比价格计算，城乡居民用于食品的支出平均每年下降0.75个百分点，即在17年中，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从0.57和0.62

降低到1996年的0.45和0.5。从中间产品的需求看，以农用化肥为例，1980年的1 269万吨，增加到1995年的1.4亿吨，电力和钢材的消费量都翻了近两番。这必然引发庞大的投资需求，导致产业结构的显著变化，特别是第二产业份额的上升。这种结构变化本身就意味着经济的增长。伴随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是人均收入水平的再度提高，从而实现了一种良性增长的循环。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人们消费习惯的改变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使得居民收入在大幅度增长的同时，储蓄急剧增加，从而在总体上提高了国民经济的积累率。使中国在1978～1996年期间积累率保持在37%左右的高水平上。这是保持中国经济快速稳定增长的基础。

按照哈罗德—多玛揭示的规律，稳定增长率应等于积累率与资本—产出率之比。中国目前经济效益还不够理想，但是即使按照4:1的资本—产出率，在37%的积累率下，年均经济增长率也至少应为9%。因此，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快速与稳定并不矛盾，而是有着深刻的经济基础的，这一基础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转变。

## 二、正确的宏观调控政策是实现中国经济快速稳定增长的基本保证

后发国家的经验表明，在赶超发达国家的过程中，政府具有重要的作用。对于中国来说，政府的作用更为重要。它不仅是宏观调控的执行者，也是改革开放的组织者和实施者。中国18年来的重要经验就是，坚持改革开放方针和实行适当的宏观调控政策是实现经济快速稳定增长的重要保证。

从深层次说，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转变正是市场化改革的产物。正是通过市场化改革才使从“供给导向型”经济向“需求导向型”经济的转变成为可能。因为只有市场才能更及时更准确地反映需求和需求结构的变化，也只有市场，才能为广大社会成员提供发挥他们积极性的舞台。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在改革的同时获得迅速的增长，就是因为改革也是与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相一致的。

在传统计划体制下，经济生活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短缺。农产品短缺，工业消费品短缺，能源原材料短缺，几乎所有产品都短缺。以致经济学家将其称为“短缺经济”。为了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解决这一问题，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自然把建立产品市场作为改革的首要目标。这也是18年来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主要采取了理顺不合理的价格体系，改革价格管理体制等改革措施，同时在企业、财政、税收、内贸、外贸、外汇等方面也进行了相应的配套改革。通过十几年的努力，以价格管理体制改革完成为标志，我国已基本建成了产品市场体系，95%以上的消费品价格及90%以上的生产资料的价格已由市场供求决定。

这一改革极大地激发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以农村改革为例，由于改变了统购统销的农产品流通体制，通过调放结合的方式提高了农产品价格，使农民的劳动获得了合理的报偿，因此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各种农副产品都有了迅速的增长。

在坚持改革开放的同时，中国政府在经济的宏观调控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回顾十几年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可以看到，它是由两方面的政策构成的。一方面是以适度

从紧的货币政策为核心的需求政策，另一方面是以产业政策为核心的供给政策，中国的这一政策选择是由中国现阶段体制与发展两方面的特点决定的。

从体制方面看，在转轨时期，中国的经济体制表现出双重体制并存的特点。一方面，传统计划体制在许多方面仍在发挥作用，计划体制下的经济行为方式和一些弊端，如预算软约束和软约束下的投资饥渴、投资膨胀等弊端仍然存在。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体制正在逐步建立，市场还不可能全部承担起配置资源的功能。

从发展方面看，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几十年。为了在很短的时间内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必须使经济有一个较高的增长率。这一基本现实，决定了现阶段中国经济的需求十分旺盛。在经济波动中，经济的收缩不是源于有效需求不足，而是由于瓶颈部门的制约，从根本上说是源于供给约束，资源不足。个别部门和个别时期出现的市场疲软，需求不足，大多是由结构性原因和政策性原因造成的。

上述情况决定了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一方面必须弥补市场发育的不足，通过恰当的产业政策，积极促进有效供给。另一方面，必须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以抑制过度的需求，实现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大体平衡，避免恶性通货膨胀出现和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在实施上述宏观调控的两个方面中都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体制等方面的原因，各项产业政策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到目前为止，需求政策一直居于宏观调控政策的主导地位。自 1993 年以来，供给政策

正在逐步得到加强。从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效果来看，中国政府取得了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宏观调控技巧日益成熟。1996年中国经济成功实现了“软着陆”就是证明。

## 三、在经济发展的新时期，如何促进经济的快速稳定增长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就业问题很可能成为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一个主要问题。

据估计，目前中国的城镇失业率已经达到5%～8%，也就是说，有大约1 200～1 400万城镇劳动力处于失业状态。就业问题已经成为近来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

中国的就业问题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不可能简单地通过扩大总需求得到解决，必须对其进行深入探讨，以寻求解决办法。

从供给方面看，造成劳动力供过于求的原因是：(1) 中国人口众多，就业压力极为沉重，特别是80年代以来，我国进入了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的高峰期，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明显上升；(2)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就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估计有1.2亿之多。伴随产业结构的调整，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的转移，也增大了城镇就业的压力；(3)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实行的是低工资、高就业、国家包分配的就业制度，形成了所谓“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的局面，为数众多的国有企业中存在大量的冗员。随着改革的深入，企业日益把利润目标放在首位，而削减冗员是提高企业效

益的一个重要途径,由此使就业压力更为沉重。

从需求方面看,造成劳动力供过于求的原因集中表现为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目前我国正在进入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工业化阶段,必然使资本有机构成大幅度提高。为了增强国际竞争力,许多企业也自发地采用了资本更为密集型的技术。而从我国的资金供给看,每年的积累率虽然很高,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庞大,"八五"期间平均每年固定资产投资达 1.2 万亿元左右,但按人均来看,每个劳动者平均不到 2 000 元,除了用于老设备的更新改造,每年新增投资所能安排的就业人口有限。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单位投资安排的就业人口正在下降,从而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

此外,在经济的收缩期对劳动力的需求增长当然低于经济扩张期,但比起上述因素,这种短期性原因并不是主要原因。而且它本身也是资源约束的产物。

以上对劳动力供求两方面的分析反映了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面临的基本矛盾,一方面经济的发展要求通过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以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而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的资源特点,人均资本占有量和人均资源占有量相对不足,还需要大量采用劳动密集型技术。伴随中国经济增长,上述矛盾将日益尖锐。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只能是制度创新。

制度创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短期内,仍要通过适当的宏观调控政策减轻就业压力。在供给方面,要积极进行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调整,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在需求方面,仍要坚持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防止在就业压力下,盲目追求经济规模的扩张,保持总需求与总

供给的大体平衡，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

就业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问题，事实表明，迄今为止的市场经济制度还不能解决这一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在坚持市场导向的改革开放方针的同时，探索结合中国发展特点和资源特点的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充分就业，使各种经济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对于经济学家来说，这将是一个严重的挑战。

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改革是在一个拥有960万平方公里土地、12亿多人口和5000年文明史的国家中展开的，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它包含着无比丰富的素材，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对中国改革和发展的研究，不仅有助于中国的经济，也会极大地丰富经济学的宝库。我希望，有更多的经济学家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

# 6 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

## (1997年11月2日)

### 一、经济改革的进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以1978年为分界线,划分为两大时期。在此以前,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从1978年末开始实行市场取向的改革,到现在已18余年。18年来的改革,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否定了过去长期实行的"以阶段斗争为纲",把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提出了改革、开放的任务。改革的重心在农村,实行了包产到户,打破了人民公社体制,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第二阶段,以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否定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提出我国要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革的重心由农村转到城市,在工商等各个领域展开。第三阶段,以1992年中共十四大为标志,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目标,改革重心由南向北,由沿海向内地推进。今年9月召开

* 本文系作者1997年11月2日在日本久留米大学"东亚经济与后工业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学术报告摘要,发表于《消费经济》1997年第6期。

的中共十五大，进一步提出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任务。中国的改革、开放势头方兴未艾，这是全世界欢迎的，也是不可逆转的。

经过18余年逐步深化的改革，中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1. 在所有制结构上，初步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初步估计，1996年国内生产总值，国有经济比重已降到40%左右；包括国有、集体在内的公有制经济约占3/4；包括个体、私营、外资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约占1/4。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不同所有制经济组成的混合经济组织，目前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已占20%。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复合化，给整个经济运行带来了不少活力。

**2. 市场机制作用不断增强。**现在，95%以上工业生产的消费品；85%以上农副产品的价格都已由市场来决定。原来不进入市场的生产要素，如资本、劳动力、土地、技术等，也逐渐走向商品化、市场化。

**3. 国家对经济的管理，由过去行政指令性的直接控制，逐步转向用经济手段来进行间接调控。**近几年来，通过对财政、金融、计划等体制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改革，宏观调控体系的框架已初步建立起来。

**4. 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互相促进，外贸、外汇等涉外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目前，中国已初步形成了包括经济特区——沿海——沿江（长江、珠江）——沿边（境）——沿主要交通干线和内陆中心城市的多层次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

## 二、经济发展的成就

与一些国家的经济改革往往在一定时期要以经济增长的下降为代价不同,中国在经济改革取得进展的同时,推动了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1979～199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平均增长9.9%左右,高于改革前30年平均年增长6.1%的速度。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相应地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也得到提高。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人民币增加到1996年的1 926元,增长指数为409.2%;同期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生活费收入由316元增加到4 377元,增长指数为296.7%。尤其是最近5年,我国经济呈现出快速稳定增长的蓬勃局面。1996年国内生产总值达67 796亿元人民币,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91年增长77.1%,5年平均每年增长12.1%,是新中国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在世界经济中增长速度也是名列前茅(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2%,其中发达国家1.8%,发展中国家5.4%)。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预算资料,1996年中国GDP在世界各国的排位,已由1991年的第10位升到第7位。

改革开放的结果,使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更为紧密。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由1979年的293亿美元,1991年升至1 356.3亿美元,1996年增长到2 899亿美元。1996年比1991年扩大了1.1倍,每年平均增长16.4%。中国在世界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已从第32位提到第11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引进外资迅速增长,1979～1996年共批准利用外资项目28万余个,实际利用外资金额2 839.4亿美元,其中最近5

年2 043亿美元，数倍于前13年利用外资的总和。5年来外商直接投资1 515亿美元，年均增长57.1%，其中1996年417亿美元，占当年发展中国家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1/3，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国家。中国经济的持久、快速发展，将形成巨大的进口和投资要求，为世界各国扩大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合作，带来多方面的机会。

## 三、改革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中国的改革，采取了渐进方式，在体制转换和经济发展中，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是，采取的渐进式改革策略，决定了中国必然要经历一个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时期。在过渡时期中，新旧体制并存，必然带来许多摩擦，而体制上的摩擦又同经济发展中的矛盾交织在一起，使中国经济在转变过程中面临许多难题，它们也是社会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主要的有以下几点：

**1. 反复出现的经济过热与通货膨胀。**所有实行改革和转轨的国家都遇到通货膨胀的挑战。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先后出现了四次经济过热。过去的经济过热往往引起经济的大起大落，造成重大损失。最后一次经济过热由于正确地实行了“适度从紧，适时微调”的宏观调控政策，和不失时机地对财税、金融和外贸等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才得以既控制了通货膨胀又保持了经济相对快速增长（物价上涨率由1994年的21%降到1996年的6.1%；经济增长率由1992年的14%降到1996年的9.7%，平均每年保持10%左右的速度），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但由于旧体制中软预算约束等因素的影响尚

未根除，由投资饥渴等原因引发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潜在压力仍然存在。

**2. 产业结构不合理**：一是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瓶颈制约尚未完全解除；二是一般水平的加工工业能力过剩，而高水平加工生产能力不足；三是服务业发展滞后；四是追求“大而全”、“小而全”的粗放扩张和重复建设，以及地区之间结构雷同现象还比较普遍。

**3. 地区发展差距问题**。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持续快于中部、西部地区，导致地区间发展水平差距扩大，而我国中、西部又是少数民族分布地区，所以地区差距问题如不注意及时适当处理，会带来一些社会政治问题。

**4. 国有企业活力不足，改革进展缓慢**。目前国有企业分散在从一般性竞争性部门到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垄断部门，不少企业经营机制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冗员、债务和各种社会负担沉重，转制阻力重重，成为改革中的一大难点。

**5. 就业问题日益突出**。中国劳动力丰富是一种资源优势，同时也带来就业难题。农业剩余劳动力十多年来已被乡镇企业和其他非农产业吸收了一亿多人，目前仍有一亿多剩余劳动力有待转移。产业结构调整，企业机制转换，以及技术进步等因素，都会不断产生大量的失业和下岗人员，给改革和发展造成巨大压力。

**6. 意识形态问题**。我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明确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不是改变为资本主义制度。但什么是社会主义制度和如何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对此一直有不同的理解。几乎每前进一步都会遇到争论。从改革初对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和广东福建办经济特区是不是搞资本主义，到后

来对社会主义经济是否是商品经济，可否实行市场经济，都有过长期的争论。最近几年又对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是否搞私有化，在一部分人中间发生了怀疑。这些问题不从理论上加以澄清，改革就难以顺利进行。

**7. 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以及国有企业改革等等，碰到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精简的问题，政府机构改革是关键。**但政府职能转变与机构精简涉及政治体制，举步维艰，进展缓慢，成为其他方面改革的制约因素。

**此外，收入分配不公问题、金融风险增大问题、资源短缺与环境污染问题、腐败问题等等，也都对我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形成了挑战，成为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出现的各项难点与热点问题，只有在今后继续推进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进行不断的探索，才能得到解决。

## 四、跨世纪的改革和发展纲领

不久前中共十五大通过的报告，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跨世纪的发展作出了全面部署。这里我就经济方面作点简要介绍。

十五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到下世纪前 10 年，是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我们必须解决好两大课题：一是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是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这两大课题的解决关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全局。报告对如何解决跨世纪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任务进行了阐述，提出了明确的思路和政策取向。

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十五大报告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使改革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取得新的突破。重点阐述了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明确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针对一些人对我国国有企业比重降低，忧心忡忡，阐明了公有制的内涵并不等于国有制，它有多种实现形式，只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并且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命脉的控制力得到加强，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并不影响我国社会主义性质。针对部分人士对公有制改革采取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形式是实行私有化的担心，报告指出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股份合作制是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相结合的集体经济，是改革中的新事物，要支持、引导。同时还第一次肯定了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继续鼓励引导，使之健康发展。这些论述都有利于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大大促进我国生产力的发展。

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报告进一步明确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方向，力争到本世纪末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按照规范的公司制的要求，初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成为适应市场的法人实体和竞争主体。国有企业体制改革要同结构改组、技术改造和加强管理结合起来。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民经济而不是救活每一个企业，通过战略性改组，形成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以至跨国经营的大企业集团；并采取多种形式，加快国民经济市场化进程和健全宏观调控体系，以及实行政府机构改革等方面，提出了推进改革的任务。

在经济发展战略上，报告强调要在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发展科技教育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坚持把农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改造和提高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推进国民经济信息化；促进地区经济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使经济建设真正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处理好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在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的基础上，多渠道妥善解决就业和再就业问题，使全国人民过上小康生活，并逐步走向更高水平。

十五大报告提出的上述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各项任务，将为实现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创造良好条件，预计本世纪最后几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将保持在8%以上，通货膨胀率将控制在5%以下，200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1980年的400%，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10年国民生产总值将比2000年再翻一番，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富裕，形成比较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为下世纪中叶实现全面的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向现代化目标迈进的过程中，中国将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经济的振兴需要大量吸收外国先进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中国广阔的市场和巨大的发展潜力，必将对中外经济合作特别是一衣带水的中日两国的经济合作，产生强大的推力。不久前，我们两

国庆祝了中日邦交正常化25周年。过去25年中日经济合作关系得到了长足的发展。1972年两国贸易额尚不到11亿美元,到1996年已增长至624亿美元。中日经济合作关系是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与中日之间特有的经济互补关系相结合的体现。两国经济合作的发展对双方都有好处,更增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我们希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万古长青。

# 7　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若干难点问题*

（1997 年 12 月 2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从 1978 年末开始实行市场取向的改革，到现在将近 19 年。经过 19 年逐步深化的改革，中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初步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局面。市场机制的作用不断增强。国家对经济的管理，由过去行政指令性的直接控制，逐步转向用经济手段来进行间接调控。初步形成了包括经济特区——沿海——沿江——沿边——沿主要交通干线和内陆中心城市的多层次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

经济改革推动了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1979～1996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平均增长 9.9%，高于改革前 30 年平均年增 6.1%的速度。尤其是最近 5 年，平均每年增长 12.1%，是新中国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

目前，中国正处在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时期。在过渡时期中，新、旧体制并存，必然带来许多

---

* 本文系作者 1997 年 12 月 2 日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讲演稿，发表于《市长参政》1998 年第 1 期，《中国市场》1998 年第 2 期摘要发表。

摩擦，而体制上的摩擦又同经济发展中的矛盾交织在一起，使中国经济在转变过程中面临许多难题。最近（今年9月）召开的中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对这些难点问题指出了解决的原则方向。这些问题主要有：反复出现的通胀压力；日益突出的就业问题；东部与中部、西部地区经济差距扩大；收入分配不公问题；所有制结构调整问题；国有企业改革迟缓问题；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精简问题；等等。下面作一些简单介绍。

## 一、反复出现的经济过热与通货膨胀压力

所有发展中国家和实行改革、转轨的国家都遇到通货膨胀的挑战。新中国建立以来已经历了九次周期波动，其中，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四次经济过热。过去的经济过热引起经济的大起大落，如建国后波动最为剧烈的第二个周期内，高峰年（1958年）国民收入增长速度达到22%，低谷年（1961年）跌到负29.7%，峰顶与谷底的落差达51.7个百分点，如此剧烈的振动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改革后波动幅度趋缓，但拿第八个周期来看，高峰年（1988年）GDP的增速达11.3%，低谷年（1990年）跌到3.7%，落差也有7.6个百分点，带来经济滑坡和疲软，损失也不轻。最近一次的经济波动（1991～1996年），由于从1993年年中起，正确地实行了“适度从紧、灵活微调”的宏观调控政策，和不失时机地对财政、税收、金融和外贸等经济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才能既控制了通货膨胀又保持了经济相对快速增长：物价上涨率由1994年的21%，逐步降到1996年的6.1%，经济增长率由1992年的14%，逐步降到1996年的9.7%，在我国经济史中第一次成功地实现了“软着

陆”。但由于旧体制中软预算约束等影响尚未根除，由投资饥渴等原因引发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潜在压力仍然存在。为了熨平或弱化经济波动幅度，保证持续稳定增长，中共十五大根据近几年的成功经验，明确把抑制通胀列为宏观调控的一项主要任务，并把“实现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注意调控力度”，写进了党代表大会的正式文件，这样就把一项短周期的对策提升为中长期的政策，这对于防止经济过热和严重通胀反复出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二、日益突出的就业问题

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是一种资源优势，但同时也带来就业的难题。中国就业压力大，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总量上的原因，即劳动人口众多，80年代以来，又进入增长高峰。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50～60年代约为50%，90年代上升为60%。二是结构上的原因，包括工业化过程中农村有1.3亿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以及轻纺、机械与传统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就业问题。三是技术性原因，即由于技术进步，同量资本和产出所吸纳的劳动份额减少。综合反映结构性技术性因素的就业弹性系数，80年代下半期为0.34，90年代上半期降为0.16。四是体制性原因，即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人浮于事效率低下，随着改革的深入和优胜劣汰机制的形成，必然要出现富余人员下岗和安置问题。几年来累计下岗人员已接近1000万人。五是周期性原因，即由于遏制经济过热而采取的收缩性措施，会带来某些需求和就业的缩减。解决我国就业问题，要考虑各种原因，采取多种对策，综合治

理。十五大报告中对关系广大职工生活和社会安定的就业问题十分重视，多处涉及，如在“产业结构调整”部分提出的发展第三产业，把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结合起来；在“所有制结构调整”部分，提出要鼓励非国有经济包括城乡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以及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这些都与缓解就业压力有关。对于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中的下岗人员，十五大报告在论述国有企业改革的部分，有专门一段分析了这个问题，要求党和政府采取积极措施，依靠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关心和安排好下岗职工的生活，搞好职工培训，拓宽就业门路，推进“再就业工程”。

## 三、地区发展差距扩大问题

中国是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向来存在明显差距。新中国成立后约 30 年间，由于当时历史背景，实行了一种国家投资向内地倾斜为基本特点的地区发展战略，而原来经济基础比较好的东部沿海地区反而发展迟缓，影响了全国经济发展的整体效益。改革开放以来，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为原则的各种鼓励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并带动中部西部地区发展的政策措施陆续出台。这种地区战略促进了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经济都取得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进展。但由于东部沿海地区持续快于中、西部地区，导致地区间发展水平差距扩大。1996 年统计，较发达的东部 12 个省市土地面积占全国 8%，GDP 占 65%左右，人均 GDP 约 6 000 元人民币(合 720 美元)，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人均 GDP 2 720 元(320 美元)。发展差距扩大导致了地区间利益矛盾日益尖

锐。而我国中部西部地区又是少数民族较多分布的地区，所以地区差距如不注意及时适当处理，会带来一些社会政治问题。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1995 年）制定的“经济社会第九个五年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建议”中，对解决地区发展问题的提法是“坚持地区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这是对当前我国地区发展战略的完整的概括。国内有人认为，缩小地区差距就意味着放弃由东向西推进的地区发展战略，这是不确切的。从东向西推进战略反映了我国地区发展的客观进程。十五大报告对此进一步作了系统的阐述，指出东部地区要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在推进改革开放中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有条件的地方要率先实现现代化。中部西部地区要加快改革开放和开发，发挥资源优势，发展优势产业。这就说明了东部地区仍要先行一步。“报告”还强调国家要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包括优先安排基础设施和资源开发项目，实行规范的财政转移制度，鼓励国内外投资者到中、西部投资，还要求东部地区进一步发展同中、西部地区各种形式的联合和合作，更加重视和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等等。这些要求的落实，对逐步缩小地区差距，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 四、收入分配不公问题

我国改革前在收入分配上实行的基本是平均主义的分配政策。改革后为了刺激效率和发展生产力，提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带动大家共同富裕”的政策。在建立市场经济的一定阶段，收入差距的拉开和扩大是不可避免的。据估计，

农村20%低收入居民与20%高收入居民的人均收入差距，1978年为2.9倍，到1994年扩大为6.6倍。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由1983年的2.3倍，扩大到1996年的4.2倍。当前农村20%低收入的居民与城镇20%高收入居民的平均收入差距为1:13，超过了10倍。在不同所有制之间和不同行业之间，都拉开了差距。1996年，国有经济单位、集体经济单位和其他类型单位（主要是涉外企业）职工平均收入之比为0.6:0.42:1，金融保险业职工收入同地质勘探业之比为1:0.7。在个人收入快速增长的同时，职工工资总额占全部个人所得的比重由1978年的31.8%，下降到1995年的27.2%，这表明制度外的不规范的收入比制度内的工资收入增长更快。据1995年抽样调查，工资外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34，高于同期城镇基尼系数0.28。这表明了工资外收入的不平等分配程度更高，而工资外收入更多是向垄断性行业及拥有某些特权的企事业单位等方面倾斜。收入差距的扩大引起人们的忧虑。有些人认为中国已出现贫富两极分化，“一个资产阶级已在经济上形成，无论绝对人数和经济实力上私营企业都超过了1955年以前的建国初期。”但亦有经济学者指出，现在城镇居民基尼系数约为0.3，高于80年代初期的0.15，从国际比较仍处于合理范围之内，但确实存在两极分化的倾向，值得注意。总之，如何在分配制度上既坚持效率优先，又兼顾社会公平；既促进经济发展，又保持社会稳定，是我国社会公众极为关心的问题。十五大报告中重申了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各种分配方式并存（各种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制度，阐述了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整顿凭借行业垄断和某些特殊条件获得的不合理额外收入，以及用完善税制等手段调节

高收入。通过这些措施，来规范收入分配，使收入差距趋向合理，达到防止两极分化的社会目的。

## 五、所有制结构调整问题

中国的改革一开始就明确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对此一直有不同理解，几乎改革每前进一步都遇到过争论。从改革初期对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和广东、福建沿海办经济特区，是不是搞资本主义；以及后来对社会主义经济是否商品经济，能否实行市场经济等等都有过争论。在所有制结构方面，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各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改革方向。若干年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持续下降，目前已降到40%。对此，一些人士忧心忡忡，并担心公有制企业改革采取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形式，是不是搞私有化。十五大报告着重回答了这个问题，阐明了我国公有制经济并不等于国有制，它还包括各种合作社、集体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和集体成分。指出只要公有制仍占主体地位（目前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76%），并且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命脉的控制能力得到加强，即使国有经济从非命脉部门退出或缩减，其比重下降并不影响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十五大报告还阐明公有制可以有多种实现形式，指出股份制是一种现代企业的资本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不能笼统地说它是私有还是公有，关键要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对于目前我国城乡大量出现的股份合作制，“报告”指出，这是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相结合的一种集体经济组织形式，要加以支持和引导。十五大报告在党

的正式文件中第一次明确宣布，包括个体、私营等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过去的提法只说它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现在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总额中已提高到四分之一，如实地明确其重要地位是很必要的。十五大报告中关于完善所有制结构的上述一些新论断，有利于消除思想障碍，推动经济改革的大步前进。

## 六、国有企业改革问题

国有企业改革是我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也是一大难点。目前仍有不少国有企业活力不强、经营困难，甚至长期亏损。其主要原因，一是国有经济分布过于分散，现有国有企业30多万个，几乎遍布所有的产业部门，其中有不少是国有经济既没有竞争优势又没有必要进入的行业。二是企业体制和机制仍然未摆脱政企不分、吃大锅饭的传统，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该淘汰的不能淘汰。三是国企债务和冗员负担沉重。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作为企业改革目标以来，企业改革的着眼点和着重点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十五大报告总结了这些年国企改革的经验。一是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而不是救活每个国有企业，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以资本为纽带，通过市场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跨地区、跨部门、跨所有制和跨国经营的大企业集团。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形式，加快放开搞活国有小企业的步伐。二是在大中型国企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

革中，进一步明确国家和企业的权利和责任，既反对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经营活动，又反对企业损害国家作为所有者的权益。三是对国企改革中碰到的难题，特别是资金困难和冗员处理问题提出了解决的思路。在资金筹措方面，明确提出要采取多种方式包括直接融资，充实企业资本金，培育和发展多元化投资主体，以推动政企分开和企业转变经营机制，把发展资本市场同企业股份制改造结合起来。在安排就业与再就业方面如前所述，总结并写进了几年来“实行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再就业工程”的系列经验。四是积极推进各项配套改革，包括建立有效的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和营运机制，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以及下面还要讲到的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等等。通过以上改革措施，力争到本世纪末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能够摆脱困境，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 七、政府机构改革问题

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碰到原有政府职能和机构不适应的问题。早在 1984 年制定第一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就已经提出了政企分开、简政放权的原则，以打破政企不分、条块分割的体制。14 年来，尽管进行过几次机构改革，但是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政府职能尚未从根本上触动，反而行政机构越搞越大，人员越搞越臃肿，官僚主义越搞越严重。中央国家机关部委的数量，1993 年仍有 43 个。目前在国家行政机关就业的职工约 1000 万。如果加上国家事业单位的职工和国有企业的党、政、工、团的管理人

员，三项合计约占全国职工总人数的30%左右。十五大报告指出："机构庞大，人员臃肿，政企不分，官僚主义严重，直接障碍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发展"。政府机构改革之所以迟滞不前，一是由于传统计划经济的影响根深蒂固；二是中央部门和地方政府不愿放弃各自的权力和利益；三是政府机构精简与国企改革一样遇到大量人员处理和社会安定问题。因此解决这个问题，在决策上既要有决心，又要谨慎从事。它既涉及经济改革，又涉及政治改革。十五大报告把政府机构改革写在政治体制改革一章，但同时在经济体制改革部分，也涉及有关内容。总的精神是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把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权力切实交给企业，这里面包括：1)国有经济的战略重组，从不该由国家管的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2)在保留国有经济的部门，建立有效的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和营运机制，实行政、资分开(政府行政管理职能与资产营运职能剥离，后者授权大企业集团和国有资产营运公司运作)；3)政府的基本职能是通过制定和执行法律、政策，为企业运行建立一个平等竞争、宏观稳定的经济环境。为此要把综合经济部门改组为宏观调控部门，调整和减少专业经济部门，加强执法监管部门，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专业经济主管部门的调整，凡属一般竞争行业，应改组为行业协会；凡属自然垄断性行业，应改组为全国性集团总公司；凡属历史原因形成的行政性垄断行业，应鼓励展开竞争，成立若干家控股公司。不论采取什么方式，都不应继续保留行政职能，更不能搞成翻牌公司。机构改革中的人员处理，应与国企一样实施下岗分流、培训转业等再就业工程，以维护社会稳定。

上面概括地介绍了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中若干难点问题。当然难题不止这些。此外，粮食、农业问题，产业结构问题、资源环境问题、金融危机问题以及腐败问题等等，也都对中国经济提出挑战。对此十五大报告都很重视并有论述。总之，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中遇到的各项难点和热点问题，只有在今后改革与发展的实践中进行不断的探索，才能逐步得到解决；中国只有在不断解决各项难题的过程中，才能逐步实现现代化的宿愿。

# 8 实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 ——跨世纪发展规划的一个关键问题

（1995 年 10 月）

五中全会提出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九五”时期和今后15年的奋斗目标，并指出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即体制上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和增长方式上从粗放经营为主向集约经营为主的增长方式转变。这是对“九五”计划和到2010年长期规划中心思想的画龙点睛的提法。本来，我国经济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改革开放以来，就在经历着互相关联的两大转变。80年代初期我国理论界曾将此过程概括为“双重模式转换”，即体制模式的转换和发展模式转换。当时所谓“发展模式转换”，或者叫做“发展战略转换”，所指内容较宽，包括生产目的、产业结构、积累与消费关系、发展策略、管理体制以及发展方式即现在所称“增长方式”等方面的转换。改革开放10多年来，上述许多方面大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增长方式”的转变却进展不顺，效果不显。直到现在，在经济发展中仍相当普遍地追求数

* 本文发表于《求是》1995年第21期。

量和速度，热衷于上项目铺摊子，而对于技术改造、提高质量和效益方面，下的功夫较小。比如目前在固定资产投资总数中，属于新建、扩建的基本建设投资约占75%，属于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方面的投资只占25%，而后者当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名为更新改造实则移用于新建扩建。又如改革开放以来十几年中，各种生产要素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中，资本投入与劳动投入约占72%，技术进步只占28%，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贡献占50%～70%的比率，也明显低于战后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这一比率(平均约为30%)。

为什么经济增长方式问题议论了多年，特别是几乎每年都提出要把经济工作的重点转到提高效益的轨道上来，但是这方面的进展仍很不理想呢？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以为，以下几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是经济发展速度往往事实上是各级政府政绩考核和官员升黜的重要依据。二是传统经济体制中政企不分，资金大锅饭和预算软约束的痼疾仍在起作用，因为花的不是自己的钱，所以投资决策者不害怕收不回投资，企业经营者也不怕亏损。三是企业素质低下，经营管理水平不高，特别是国有企业各种负担沉重，影响了企业的创新和开发的能力。四是我国劳动就业的压力很大，不能不靠上一些新项目铺新摊子来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这些情况和背景，是我们在研究和解决增长方式转换问题时必须考虑的。

经过15年来的快速发展，我国经济今年将提前实现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总量增长令人瞠目，但质量效率则瞠乎人后。随着我国进入"九五"时期并迈向21世纪，我们必须在保持经济数量持续增长的同时，以更大的努力放到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方面来。转换经济增长方式的客观要求

之所以日益紧迫地提到我们面前，是因为：1. 过去长时期的经验证明，以追求数量为主要目的和以增加投入为主要手段的外延粗放的发展道路，必然反复引起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和经济调整的剧烈波动，造成不利于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损失；经济发展规模愈大，这种波动带来的损失将愈大。2. 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需求结构层次的升级，以及大规模基础设施整备的需要，我国产业结构将再次摆向重化工的方向，汽车、建筑、石化、机电等支柱产业的大发展对能源、原材料等资源需求的压力更大，如不将浪费资源型的粗放发展方式改为节约资源型的集约发展方式，我国经济发展将难以为继。3. 今后国际经济实力的竞争，总量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在于技术水平、生产率水平、人均消费水平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质量和素质的较量。现在发达国家某些人士借口中国经济总量迅速增长，提出所谓"中国威胁"的论调，千方百计遏制中国的发展。他们故意视而不见中国在人均水平和经济发展质量和素质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的巨大差距。我们则应更加强调这些方面的差距，把世界人士的注意力特别是把我们自己的努力引导到这一方面来，而不必在总量增长上大做文章，这样我们才可能有持续的健康的发展速度，这是符合我国走向现代化的客观规律和客观要求的。

实行增长方式的转变要贯穿、体现到中长期发展规划和今后经济工作的各个方面，包括产业结构的调整，科教兴国方针的实施，投资体制和方向的合理化，等等。特别要针对前面所述障碍增长方式转变的一些体制上的原因，进行综合治理、深化改革。就是说，增长方式的转变与经济体制的转变是互不可分的。五中全会把这两者提高到实现中长期目标的两大

关键，意义深远，我们必须深刻领会。

当然，中国国情复杂，实行增长方式的转变不能一刀切，不能要求所有部门、所有地区都一律采用最新技术改造现有企业，更不是所有部门所有地区都不搞新建扩建。基础设施的整备、新兴产业的建立发展，地区差距的克服与资源开发，等等，特别是城乡大量新增和剩余劳动人口的就业安排，都需要采用新项目投资等外延发展方式。但这要逐步推进，不能急于集中铺开，也不应在原有技术水平上平推，而要采用适用技术，尽可能提高原有水平。所以，要把内涵集约式发展与外延粗放式发展很好地结合起来。但在“九五”期间乃至下世纪，内涵型集约化的发展应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侧重点。

# 9 “九五”、2010年发展目标与增长方式转变问题*

（1995年11月）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下面谈谈我的一些认识。

从现在到2010年至2020年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个非常关键时期。80年代以来的十几年，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9.8%，今后二三十年这个发展势头能不能继续下去？如果今后二三十年经济社会发展比较顺利，中国就能上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很艰难的台阶，为中国由低收入国家走向中等收入国家奠定基础。否则中国将有可能再度失去赶上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机会。

中国在“九五”计划期间乃至进入21世纪头十年二十年，继续保持较快的发展势头是有可能的，有利条件如下：

1.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这将为中国经济建设提供较长时间的国际良好环境。同时世界经济发展的重点正逐步转移到东亚太平洋地区，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难得

* 本文系作者1995年9～11月期间几次座谈会发言纪要综合整理而成，发表于《湖北社会科学》杂志1996年第2期。

的发展机遇。

2. 中国经过十几年的快速发展，到 1995 年已提前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比 1980 年翻两番的目标，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3. 17 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的资源配置方式由计划经济逐渐转向市场机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轮廓已经显现。同时中国越来越充分地运用国内和国际两种资源，特别是吸引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可以发挥后发优势。

4. 随着中国众多人口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层次的上升和消费内容的多样化，汽车、石化、机电、建筑业等新一代主导产业发展的市场条件基本形成，中国国内市场将无与伦比地扩大，从而推动一系列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兴起。

5. 中国较高的储蓄率，在国民生产总值比重为 30% 以上，位居全球第一，可以为投资的增长提供较为充裕的资金来源。

6. 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劳动大军，而且具备各种类型不同层次的人才。

因此，包括“九五”期间在内的中国，今后二三十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条件是非常有利的。当然最主要的还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对我国今后经济社会的长期发展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在认识发展优势、增强发展信心的同时，我们也不要盲目乐观，不能忽视一些限制发展的因素，例如，人口与资源的矛盾，今后将更加尖锐；农业稳定与发展任务艰巨；就业压力将长期存在；国有企业转换机制阻力较大；扩大出口将面临更强

的竞争和更多的贸易磨擦;加入 WTO 后,国内产业亦受到进口产品的冲击,以及反复出现的通货膨胀等问题。

在综合考虑各种有利和限制因素的基础上,1994 年中国社科院经济预测课题组,对"九五"期间经济以及今后 25 年经济增长速度进行了预测。初步结论是,1996 年到 2000 年("九五"期间)国内生产总值 GDP 年平均增长速度的最佳选择是 8%~9%,2000 年到 2010 年是 7%~8%,2010 年到 2020 年是 6%~7%,25 年平均增速为 7%~8%。

尽管长期增长速度呈递减趋势,但在当今世界上仍处于高位增长之列,能够保证中国的经济总量进入世界前列,人均收入进入中等国家水平。如果用购买力平价来估算,中国 GDP 总量到 2010 年将位居世界第二,到 2020 年可越居世界第一。但在人均收入水平、经济发展质量上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

这里我想强调一下,在我们考虑中长期经济速度的较佳选择时,切忌重犯片面追求产值速度的老毛病。五中全会建议中提出要把握好速度问题,速度低了不行,速度过高也不行。先讲低了不行。有人计算 ,我国每年新增人口 1 500 万以上,要消耗掉 3%左右的经济增长率;要保证原有人口的生活水平稳步提高,也需要 3%左右的经济增长率;我们还要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增强综合国力,近期如果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低于 8%,将不利于我国整体经济的发展。当然速度过高易于导致经济过热和严重通胀,也不行。但是这两个不行不能等量齐观,因为中国更容易发生的是速度过高。人们的发展期望和大锅饭投资饥饿的机制,都容易导致速度过高,而不是速度过低,所以要把重点放在防止速度过高这方

面来。过去十几年，我国经济发展的平均速度9%～10%是相当高的，过高时达到13%～14%，工业达到20%～30%以上，这样就反复引起经济波动和通货膨胀，经济过热与经济调整反复出现，这对经济秩序，经济改革，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和经济效益的提高，都带来消极影响。反复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就在于我们的经济工作中存在单纯追求数量、规模和速度的偏向，这在经济技术和管理水平低下又不讲求质量效益的条件下，追求高速只能用多投人，多铺摊子即外延或粗放的发展方式来实现，即高投人、高消耗、低效益、低产出，这样迟早要超过资源承受能力，就只能靠发票子来支持这种超高速即超资源承受限度的增长，这是难以持久的。所以《建议》讲：快是有条件的，要讲效益，讲质量。所以在进人"九五"和向下世纪迈进时，在经济增长方式上，我们面临着要来一个大转变，即从外延粗放为主的增长方式转变为内涵集约为主的增长方式。《建议》中把增长方式的这一转变同经济体制的转变并提，把这两个转变提高到实现"九五"和2010年奋斗目标的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这是对"九五"和2010年长期规划中心思想的画龙点睛的提法。

这两个转变实际上并不是现在才开始讲的。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经济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上述两个转变的阶段。在80年代中期我国经济理论界，包括我个人在内曾经将此过程概括为双重模式转换。一种是经济体制模式的转换，当时称作从传统的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模式转向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模式。另一种是经济发展战略转换，其含义要比现在所讲的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含义要宽些，包括生产目的的转换，产业结构的转换，消费与积累关系的转

换,发展策略的转换,管理制度的转换和发展方式的转换,等等。其中发展方式的转换实际上相当于现在所讲的增长方式的转变。

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我国体制模式和发展模式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上述一整套转换在许多方面都有所前进。例如生产目的,过去长期是为生产而生产,为革命而生产,很少考虑提高人民生活的目的。改革开放后转变过来了。又如产业结构,过去虽然口头上是农、轻、重,实际上重、轻、农;在三大产业的关系上,重二产、轻一产、忽视三产。改革开放后也逐渐调整过来了。又如积累与消费的关系,过去是高积累和低消费,改革开放后也得到了合理的调整。发展策略的问题过去是强调不断打破平衡的不平衡发展策略,改革开放后改变为相对平衡协调的发展策略等等;在经济体制的转换也从大一统的计划经济,经过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前进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阶段。总之,中国经济体制与发展战略的转变,在许多方面取得明显的进展,从而推动了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其中增长方式从外延粗放向内涵集约的转变遇到的困难比较突出,至今进展不顺,效果不显。

外延粗放型的增长方式是以追求数量、规模、速度、产值为目的,其手段主要是依靠资金、物资、劳动力的投入,上新项目,铺新摊子,而对于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和效益重视不够。而内涵集约型的增长方式则主要依靠科技进步,更新改造,管理合理化,生产集约化,以及人的素质的提高,来求得经济增长质量、效率和效益的提高。直到现在我们在经济工作中仍然相当普遍地追求数量和速度,热衷于上项目、铺摊子,而对

于技术改造提高质量、效率、效益方面下的功夫比较小，比如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属于新建扩建的基本建设投资大约占75%，而设备更新技术改造方面的投资只占25%，而且后者当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名为更新改造实则移用于新建扩建。有专家测算过，改革开放以来十几年，各种生产要素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中，资本投入与劳动投入约占72%，只有28%是靠技术进步取得的。这与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的差距，目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中有50%到70%是靠技术进步取得的；二战后发展比较快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中平均也有30%是靠技术进步取得的。

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在总量增长上令人注目，而在质量效率上则瞠乎人后，这并不完全是由于我们在政策上的疏忽。早在1981年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提出了要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实惠的路子；以后多次提出要把经济工作重点转到提高经济效益的轨道上来；而且发展方式及增长方式的转变在理论上也讨论了多年，为什么这方面的进展仍很不理想呢？其中难点何在呢？这里面的原因很复杂，有国情上的制约，也有体制上的制约。我看以下四个原因是值得注意的。首先是各级政府和官员的政绩考核，事实上都与经济发展的速度规模有关系。其次是政企不分的旧体制还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资金大锅饭和预算约束软弱的痼疾仍起作用，因为花的不是自己的钱，所以投资决策者不害怕收不回投资，企业经营者也不怕亏损。三是企业素质较低，经营管理水平不高，特别是国有企业各种负担沉重，没有力量，也没有兴趣进行技术改造和创新。最后一条重要原因是我国城乡劳动力多，需要解决庞

大的就业问题，单纯靠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动效率，不铺一些摊子，在中国是不行的，这么多劳动力就业如何解决？

在重数量速度轻质量效率的问题长期未能解决的背景下，中央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方针，可以说这是过去多次强调把经济工作转到提高经济效益上来这一方式的继续，然而在进入“九五”时期和迈向21世纪之际，把这一转变提得这样高，等同于经济体制的转变，是不是表明现在增长方式的转变有特殊的迫切性呢？可以这么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之所以日益紧迫地摆到我们面前，是因为，第一，过去长时期的经验证明，以追求数量为主要目的，以增加投入为主要手段的外延粗放型的发展道路，必然反复引起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和经济调整的剧烈波动，造成不利于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损失，而且经济规模越大损失越大，我们现在经济又上了新台阶，规模更大了，将来还要大，总是这样反复剧烈波动是不行的，小波动不可避免，但大的波动应当避免。第二是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需求结构层次的升级，以及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我国产业结构将再次摆向重化工业的方向，汽车、建筑、石化、机电等支柱产业的大发展对能源、原材料等资源需求的压力更大，如不改变过去浪费资源型的粗放发展方式为节约资源型的发展方式，我国的资源根本承受不了。按单位国民生产总值消耗的能源来比较，我国大约比日本多四倍。中国人口那么多，市场那么大，在人均资源这么低的情况下，经济发展将难以为继。而且对人均拥有量本已不足的资源过量开采和耗费，将加剧环境污染，破坏生态平衡，危及子孙后代的可持续发展。第三，今后国际经济实力的竞争，总量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在科学技术水平、质量效率效益、人均

消费水平，和整个国民经济素质的较量。在这些方面我们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就太大了。即使在总量进入世界首位以后，我们的人均水平仍然落后，到21世纪末能不能赶上发达国家也是问题。与此同时，发达国家某些人士因为看到我们的总量发展很快，担忧所谓"中国威胁"，造成一种形势扼制我们发展。所以我们应当强调人均水平和发展质量上的差距，把世人的注意力引导到这一方面来，特别是把我们自己的努力放到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和人均水平上来，而不必在总量增长上大做文章，这样才有利于保持持续健康的发展，符合我们走向现代化的要求，也有益于我们与国外更好地做生意，实现经济互补，对于妥善处理国际关系也是有利的。

那么，如何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呢？由于新的增长方式的转变不是一个局部性的，而是一个全局性问题，所以要从方方面面来采取有效的方针措施，把提高质量、效率和效益的要求贯穿体现到中长期发展规划和今后经济工作的各个方面。包括：产业结构的优化，规模经济的推进，新项目建设与现有企业更新改造的处理，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资源开发与节约并举等等。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加强宏观经济与企业自身管理，把提高管理工作水平同经济机制的改革结合起来。

以上提到的阻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种种因素，多属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领域，必须通过深化改革进行综合治理。《建议》指出，要靠经济体制改革，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降低消耗、增加效益的企业经营机制，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机制，有利于市场公平竞争和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运行机制，一句话就是要把两个转变有机的结合起来。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经济体制的转换是互相联系，密不可分的。经济

增长方式的转变要以经济体制的转变为前提条件。没有经济体制上的转变，就难以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体制上的障碍不解除，结构调整、技术进步、挖潜改造、提高质量效益等等，都难前进。前面列举的一些制度上的障碍，大多是政府职能和国有企业方面的问题，所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点也在国有经济，这与国有经济在我国经济中仍然居主导地位是分不开的。国有经济如果不能从体制改革上入手，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难以维持它的主导地位。

当然，中国国情复杂，现在还没有摆脱发展中国家的阶段，对于转变增长方式，也不能要求过急，一刀切。比如不能要求所有部门，所有地区都一律采用最新技术来改造现有企业，更不是所有部门，所有地方都不能搞新建扩建等具有外延性质的建设。

我国基础产业、基础设施相当薄弱，高科技高附加值的新兴产业也需要发展，还要开发边远地区的资源，克服地区差距，特别是城乡大量新增加剩余劳动人口的就业安排等等，都需要相当规模的投入，以进行外延的拓展。但是这种带有外延型的建设要逐步推进，不能急于集中铺开，也不应在原有技术水平上平推，而要采用适用技术，尽可能提高原有技术水平。所以，要把内涵集约型的发展与外延粗放型的发展很好的结合起来，这样才能符合我国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的国情，推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顺利前进。

总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一个长过程，在经济发展的最初时期，不发达阶段，更多地靠投入，也是符合经济规律的。我国人口多，剩余劳动力在增加，有加大劳动力投入的条件。另外中国的储蓄率也很高，引进外资环境气候总的来说

也不错，应当说有资金投入的条件。这些条件，加上世界范围产业结构重组，一些先进国家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在我国由于国土广大，东西部发展不平衡，这种外延型的产业转移向中国内地纵深发展的余地很大，这就决定了我国在一定时期，外延粗放型的发展将占重要地位。而且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和效益效率的提高也要有一个过程，所以这两个增长方式的结合将是长期的，在这过程中我们要努力提高内涵集约因素的比重。这就是增长方式转变的实质。那么，有人问，中国在现阶段，内涵、集约型的经济增长应当占什么样的比重才是比较合理的呢？我回答说，这个很难说的，要看我们的人口控制情况，劳动力资源增长情况，技术管理水平进步的情况。中国和西方不一样，西方总的说劳动力短缺，我们是劳动力过剩，所以不可能一下子把内涵集约因素的比重提得太高，这里有一个发挥资源的比较优势的问题。我们在劳动密集、资本密集、技术密集三者的结合上，应该怎样合理搭配，通过何种步骤来实现这种搭配，这还需要认真摸索解决，这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当然我想我们至少不能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这里还有一个时间问题，如果指的 2050 年，那么内涵集约因素比重当然要更高一些，但如果说的是 2000 年，恐怕这个比重提高不了多少。具体的比例要由搞计量经济学的专家来计量和回答这个问题。有人问我，前苏联在 60 年代后期也曾经提出过增长方式的转变。现在中国采用这种提法，两者有什么区别？我回答说，苏联是在 60 年代末、70 年代初提出这个问题的。但它提出来以后，主要还是要从技术上来考虑，企图以加强机器制造业发展的方法来解决。它到了 80 年代还是这样，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

第一件事就是加速发展，但还是指加速机器制造业的发展。他们仍然是从生产力的角度，而不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提这个问题。苏联的根本问题是在这里。所以苏联的机制转换一直没有动。我们在1982年去苏联考察过一次经济，苏联人也一直在谈内涵、外延这样的问题，但是机制上没有新通道。我们体制改革提的早得多，现在也是从体制改革的角度，以体制改革为前提，再次把增长方式转换的任务提出来的。所以我认为我们的问题提出是和苏联不一样的。

# 10　学习《薛暮桥回忆录》*

## （1997 年 1 月 25 日）

薛暮桥同志是我国老一辈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家，他有长期在经济领导岗位上工作的实际经验，他对我国经济工作和经济理论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薛暮桥回忆录》确切地反映了薛老从事革命斗争、经济工作和科学研究的经历，而这三者又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因为薛老的革命活动主要体现在经济工作领域，而他的经济工作又与不断总结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政策这样一种科学研究的过程是分不开的。所以薛老在经济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充满了实践性、战斗性和科学性，这是经济理论界许多同志共同的感觉。

因为种种原因，我拿到这本《回忆录》的时间很晚（几天前），实在来不及通读细看了。统览了一下目录标题，时间跨度近一个世纪，内容极其丰富。我先选读了有关 1984 ~ 1988 年关于通货膨胀和反通货膨胀的叙述，栩栩如生，十分有味。对这段时期的经济，小平同志在南方讲话中有过评价，说这个时期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台阶。这是就经济发展来说的，这个时期经济发展确实很好，这是由于前一个时期农村改革带

---

* 本文系作者 1997 年 1 月 25 日在《薛暮桥回忆录》座谈会上的发言，发表于《经济学动态》1997 年第 3 期。

来的积极影响。至于这5年的改革，虽然刚刚开过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改革决议，但包括价格改革、企业改革在内的各项改革，进展并不很理想。其原因就在于从1984年第四季度开始再次出现经济过热现象，断断续续一直延续到1988年下半年。对这几年的过热，当时也曾企图采取"软着陆"的办法，但是没有成功。主要是因为当时决策人对"软着陆"的决心不大，宏观调控措施不力。《回忆录》中说，当时决策人遇到一些人大声惊呼经济滑坡，许多地方企业强烈要求放松银根，就在制止通胀问题上发生动摇，反过来又鼓励大干快上，这样，"软着陆"不能到位，经济又重新起飞。如此一再反复，最后酿成1988年夏季的经济波动，这与经济理论界一些人提出通货膨胀无害论有关，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回忆录》对这一史实的亲身经历作了描述。当时事实上执行了一条容忍通胀的政策，或叫"缓和的通胀政策"。对此，以暮桥同志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持反对态度，他们主张坚决制止通货膨胀，并努力理顺价格，为包括价格改革、企业改革在内的各项改革提供一个比较好的宏观环境。可惜当时这些正确意见未被接受，以致后来形势发展到难以为继的地步，被迫进行大的调整。《回忆录》对这一段反通胀"软着陆"失败的教训描述得很生动、深刻，对比最近一轮反通胀软着陆成功的经验，发人深省，很有教益。这里很重要的一条是决策者对宏观调控要坚定有力，措施到位，不能一遇干扰和阻力就轻易放弃调控目标。《回忆录》中说，在根除旧体制下投资饥饿顽症之前，尤其要加强宏观经济管理，这个说法很对，当然，防止需求膨胀和大起大落，还要从体制上解决软约束超分配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强调，不仅1997年和整个"九五"期间，而且在整个体制转轨完

成前，都要坚持适度从紧、适时微调的宏观调控政策。这对于促进两个全局性的重大转变太重要了，没有比较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天天忙于应付扑灭通货膨胀之火，什么增长方式的转变，什么经济体制的转变都谈不上。仅此一例，说明薛老回忆录所总结的经验多么重要。我认为不仅经济学界要好好读这本书，不仅广大的干部要好好读这本书，而且特别是处在决策地位或有可能进入决策圈子的年轻同志更要好好读这本书，以利于推进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我自己也要抓紧时间读完这本书，认真学习。

最后，祝愿薛老身体健康，为国保重。

# 第二篇

## 宏观经济形势跟踪

# 11　1994 年国内经济形势与 1995 年展望*

（1995 年 3 月 17 日）

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改革，这几年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以 1992 年春邓小平南方讲话、党的十四大和 1993 年十四届三中全会为标志，进入了一个新一轮的快速增长，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运行经历了四个周期。现在正处于第四个经济周期的中后期。前一周期的高峰在 1988 年，当时出现经济过热，下半年开始治理整顿。1990 年经济到达谷底。1991 年开始回升。1992 年重新进入高速增长。1993 年年中又达到高峰，出现过热，经济秩序特别是金融秩序混乱。于是开始实行加强宏观调控。去年（1994 年）继续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同时在财政税收、金融外汇等领域开始出台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并取得成效。因而 1994 年经济发展总的来看势头不错，表现在：

* 本文系作者 1995 年 3 月 17 日在伦敦中国驻英大使馆内举行的一次报告会上讲演第一部分摘要。

## 1994年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①]

**第一，由于1993年下半年开始的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措施取得成效，既避免了经济的进一步过热，也避免了经济在调整过程中的大滑坡或大起之后的大落。**国民经济在从前年的高峰平稳回落的过程中，仍然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1994年GDP增长率达到11.8%。不仅大大高于世界经济平均为3%的增长率，也高于亚洲经济平均为8%的增长率。

**第二，社会总供求基本平衡。**在社会供给方面，工业生产比上年增长26.1%，农业生产增长8.6%，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多数增产，只有少数农产品如粮食、糖料等产量有所下降。国内市场货源充裕。另一方面，社会需求增长得到了控制，如投资需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去年增长31.4%，增幅比1993年的58.6%回落27.2个百分点。消费需求，去年全年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实际增长7.2%。货币投放量，国家银行贷款规模和财政赤字，都控制在原定目标之内。

**第三，对外贸易高速发展，国际收支明显改善。**1994年比1993年出口增长31.9%，进口增长11.3%，改变了1993年对外贸易巨额逆差的局面。外汇储备从年初212亿美元，年底增加到516亿美元，增长1.4倍。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从1美元兑8.8元人民币，升为1美元兑8.5元人民币。实际利用外资继续增长，全年使用外资458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33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2.7%。到去年底，注册外商投资

① 1994年数字，据《中国统计年鉴1995年》资料校正。

企业数已达到20.6万户，去年一年增加了4万户。

**第四，城乡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全年城镇人均生活费收入3179元，比上年增加3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加8.8%；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221元，比上年增加3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加5%。但值得注意的是，一部分居民因通胀和停工半停工，实际收入水平下降。

## 1994年经济发展中的主要问题

**第一个问题，物价涨幅过高，这是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去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了24.1%，社会商品零售价格上涨了21.7%。涨幅超过20%，是改革开放以来物价涨幅最高的一年。从近几年零售物价指数的变动来看①：

| 年　份 | 1988 | 1989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
| 物价指数 | 118.5 | 117.8 | 102.1 | 102.9 | 105.4 | 113.2 | 121.7 |

在1993年年中开始加强宏观调控后，1994年物价仍继续大幅上涨，原因很多。主要有：一是前两年经济过热时投资和消费需求增长过快，货币供应超经济增长的滞后影响。二是持续两年国家政策性调价，包括煤炭、电力、运输、棉、粮、油以及公用服务事业，调价幅度较大，从调整不合理的价格结构来说这是必要的，但时机掌握上考虑不周。三是部分农产品因灾减产，因食品在消费品价格指数构成中所占比重较大，粮价上涨的影响不小。四是由于汇率、工资、利率调整，以及前两年

① 《中国统计提要1995年》，第122页。

投资膨胀引起生产资料价格猛涨的影响传导至下游产品，造成巨大的成本推动。据测算，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上涨21.7%中有14个百分点为成本推动，占65%；7.7个百分点为需求推动，占35%。这与1988年的情况很不相同。五是市场物价管理没有跟上，乱涨价，垄断涨价等情况未能制止。

还有一个情况不同于1988年。去年物价涨幅虽高，但国内市场和社会生活基本稳定。其原因，一是多数居民实际收入增加，承受能力增强；二是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供求基本正常；三是涨幅高的，主要集中于少数服务收费等，消费弹性小，不是保值产品，难以形成抢购对象；四是抑制通胀、平抑价格的政策信号明确，消费者的预期比较稳定。

**第二，农业基础薄弱问题。**1994年物价上涨的重要因素是农产品价格上涨幅度较大，这是我国农业基础薄弱的表现。农业基础落后于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已非一日之寒。应该说，中央是一贯重视农业的，近几年多次召开农村工作会议，讨论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但是一到下面，往往是灾年重视，来年就不大重视，抓的很不一贯，不很落实。农业有这么几个隐患：一是农业投入严重不足，国家对农业投资比重下降，农民自身投入有限，还有比较利益不合算的问题。农业投资占国有单位投资比重，80年代初是5%，80年代中后期是3%，1994年不到2%。今年注意了这个问题，国家对农业投资比去年增加了1/4。二是耕地面积萎缩，有的是农民撂荒，有的是各地乱搞开发，挤占耕地，1978年到1993年我国人口净增2.2亿人，而耕地面积减少6432万亩，相当一个四川省的面积。人均耕地1978年为1.6亩，1993年为1.2亩。特别是传统粮食高产的东南沿海地区，已从粮食有余转为大量调

入。此外，还有农村流通体制不顺，工农产品比价及农产品内部比价不合理等，不利于某些农产品的比较成本、比较效益，以及农民负担重，等等，影响了农民的积极性，也是拖农业后腿的重要原因。

**第三，部分国有企业经营困难活力不足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在支持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作出了贡献。但由于种种原因，相对于蓬勃发展的非国有经济来说，国有成分发展比较缓慢，活力不足的问题比较突出。1994 年全国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18%，其中国有企业只增长 5.5%，如加上国有控股企业，也只增长 6.8%。而集体企业增长 21.4%，其中乡办企业增长 27.3%；中外合资、合作和外资企业增长 28%，增幅都大大高于国有企业。虽然下半年比上半年情况有所改善，但从总体上看，不少企业仍未摆脱困境，产品库存积压增多，企业亏损面较大，相互拖欠严重。不仅企业之间相互拖欠，而且拖欠银行贷款本息，拖欠国家税金。这种现象不仅加剧了企业资金和国家财政的短缺程度，而且，与之相伴而生的虚假需求，进一步助长了企业盲目生产，重复投资的现象。

造成部分国企生产经营困难的原因很复杂，有历史因素，也有现实因素；有企业外部因素，也有企业内部因素。从根本上说，国有企业不活，主要是机制问题。政企不分，只生不死，社会负担重，历史债务沉重等传统体制弊病，削弱了国有企业活力的发挥。

**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中出现的问题，不只上述三个。此外还有，收入差距不合理的扩大，腐败现象的蔓延，等等。**这些问题的产生，有些是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进程加快，新旧体

制转轨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有的是政策措施不到位、不落实，经济调控手段不健全，以及工作中某些失误造成的。对这些问题不能等闲视之。从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今年最近召开的八届人大三次会议，都在研究这些问题，并将采取措施逐步解决这些问题。

## 1995年经济发展形势展望

1995年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仍然是继续把握“二十字方针”（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进一步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根据这样的指导思想，确立了今年经济工作的几项主要任务。**一是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抑制通货膨胀，保持国民经济发展的好势头；二是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为重点，推进各项配套改革，完善宏观管理体制；三是增加农业投入，确保农副产品供应，全面发展和繁荣农村经济；四是加大结构调整力度，强化管理和推动技术进步，提高经济的整体素质和效益。**可以看出，这几条任务都是针对当前经济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的。这里我着重讲讲抑制通货膨胀的问题。

抑制通货膨胀和保持发展势头，就是说，既要把过高的物价上涨率压下来，又不能使经济发展失去势头，也就是说要继续实行“软着陆”。这是一个很不容易解决的两难问题。高增长往往带来高通胀。我国近几年的高通胀尽管原因复杂，但是与增长速度过高是有关系的。要把物价涨势压下来，就得适当控制经济增长速度。但我们又不能把速度压得过低，速

度过低也不利于改革和稳定。那么，今后宏观经济走势究竟如何呢？

根据去年年末今年年初，国内各方面的议论和分析，今年经济走势有三种可能：

**一是"软着陆"不到位经济就再度出现过热，物价继续攀高。**目前各地方、部门、企业上速度、铺摊子、争贷款的劲头依然强烈，在发展不平衡中要求缩小差距、"倾斜"发展的压力不小。理论界也有"通胀不可怕，失业才可怕"推波助浪的议论，附和这种压力。如果顺从这种压力而放松调控，或者调控力度不够，我国经济将有可能继续以 10% 以上的速度加快增长，从而加剧资源紧张，推动物价继续上涨，引发更严重的通货膨胀和更大范围的社会矛盾，重复大起大落的故事，这是很危险的，应该努力避免的。

**第二个可能是经济增长急速回落，出现市场疲软，企业停工半停工增多，而物价则回落缓慢，或者仍然居高不下，使经济运行趋向"滞胀"的局面。**这种前景可能在下述情况中发生，就是调控物价的手段过多地采用限制性和行政性措施，特别是过多地在压缩最终需求上作文章，从而使紧缩力度过大，而对导致当前物价涨幅高的成本因素、结构因素、管理因素等却认识不足，措施不力，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出现"滞胀"。

**第三个可能是成功地实行"软着陆"，经济增长幅度在继续回落中仍保持适度的增长速度，同时物价上涨幅度则明显回落。**这是多数经济界和经济学界人士的主张，也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来确立的宏观调控的正确方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抑制通胀保持国民经济发展好势头放在 1995 年经济工作主要任务的首位，全国计划工作会议继而指出要把抑制

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尽快地把过高的物价涨幅降下来，以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其目标都是既要降低物价上涨指数，又要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根据各方面的测算，今年我国 GDP 增长率由去年的 11.8% 降到 9% ~ 10%，物价上涨率由去年的 20% 以上降到 15% 左右，明年再进一步降到 10% 以下，是比较适宜、可靠的。

为了有效地抑制通货膨胀，去年 9 月国务院根据全国物价工作会议提出的七条措施，今年重申要继续实行，同时强调了以下几条。一是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银行信贷规模的增长幅度要低于去年，货币供应的增长幅度也要低于去年；二是继续控制投资规模，集中有限的财力先保在建的重点工程，减少新开工项目；三是增加对农业的投入，解决好“米袋子”、“菜篮子”问题，增加农产品供应；四是控制消费基金增长，一方面要保证农民和广大城镇职工的收入水平继续适当增加，另一方面要严格控制社会集团消费，特别要刹住公款消费之风。

今年经济发展有不少有利因素。**一是全党全国重视和加强农业；二是各项改革进一步深入；三是政府治理通胀的宏观调控目标明确；四是前些年开工的一批重点建设相继投产，某些短缺产品瓶颈制约有所缓解（能源、交通、生产资料）；五是居民储蓄继续大幅增长；六是对外开放和国际经济技术交流继续扩大；等等。**这些都将为完成 1995 年国民经济发展任务创造了有利条件。只要宏观调控决心坚持，措施完善，力度适当，把零售物价指数降到 15% ~ 13% 左右，并保持 9% ~ 10% 的经济增长速度，继续实现经济的软着陆，是有可能的。

# 12　当前中国经济的走向*

## （1995年6月13日）

## 一

中国自实行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十多年来，经济体制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单一的公有制在向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经济转化；传统的计划经济在向市场经济转化；过去封闭半封闭状态在向全方位开放转化。改革和开放的进展，把中国经济推入了一个快速增长时期。1979～1993年，GDP年增长率为9.3%。特别是1992年以来，GDP增长率连续三年超过10%。这与邓小平1992年初南巡讲话提出加快发展的号召有关，但也与中国经济周期的走势吻合。

当前，中国经济处于改革开放以来第四个经济周期的中后期。前一周期的高峰年（1988年）出现经济过热，引发抢购商品，挤兑存款；下半年开始紧缩，进行治理整顿；1990年到达低谷，1991年开始回升，1992年进入新一轮的高速增长。这一轮高速增长于1993年年中达到高峰，此时重新出现经济过热，特别是金融秩序紊乱，于是6～7月间开始实行加强宏

---

* 本文系作者1995年6月13日在日本东京三井物产贸易经济研究所的讲演，发表于《财贸经济》1995年第9期。

观经济调控的(十六条)措施;同时在财政税收、金融外汇等领域,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并取得成效。既避免了经济进一步发烧,又避免了用"急刹车"和全面紧缩的办法带来经济大滑坡,使1994年中国经济增长在平稳回落中仍然保持了较快的速度(11.8%,低于1992年的13.4%,1993年的13.2%)。

但中国经济在前进中存在着不少困难。其中突出的有:高通货膨胀;农业基础脆弱;国有企业活力不足。下面着重谈谈有关治理通货膨胀和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前一问题属宏观经济调控领域,关系着中国经济近期的稳定发展。后一问题属经济体制改革领域,关系着中国经济更为长期的健康发展。两者都是国内外广泛关注的问题。

## 二

通货膨胀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周期波动已出现过几次。上次高峰在1988年,当时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上升幅度为18.5%。1990年上升幅度降到2.1%。1992年重新攀升。1993年初物价涨幅开始突破两位数,这年年中开始加强宏观调控,全年物价上升幅度为13.2%。1994年初,政府提出要把物价涨幅控制在10%以内,但实际达到21.7%,使这次物价上涨成为改革以来涨幅最高、持续时间最长(连续24个月涨幅超过两位数)、范围最广(由沿海向内陆推进)、最严重的一次通货膨胀,尽管还没有发展到恶性通货膨胀的程度,社会对物价上涨的承受能力也比1988年有所增强,但物价涨幅这么大,已成为影响经济全局的突出矛盾。有鉴于此,中国

政府已决定将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首要任务。

为什么从1993年6～7月间开始的加强宏观经济调控，经过一年半，物价还在不断攀升，而且涨幅这么大？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前两年（1992、1993年）固定资产投资等引发的社会总需求增长过快，货币投放过多的滞后影响，以及这几年对市场和物价的管理有所放松（明显的例子是1993年取消了全国物价管理总局）等因素外，主要的有以下几点：

一是持续两年出台的调整价格的项目比较多，包括煤、电、石油、运输、粮食、棉花等重要商品以及公用服务调价幅度较大，这对于理顺不合理的价格结构是必要的，但调价时机选择不怎么合适，本来应当选在前几年经济没有过热，物价比较平稳时出台较为合适，但选在1993年1994年经济再度过热时出台，却是火上加油。同时，对于其联带物价总水平上涨的影响估计不足。

二是部分农产品特别是粮食减产，供应偏紧，加上农业生产成本高，导致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价格大幅上涨，带动了占居民消费构成比重50%以上的食品价格的普遍上涨，成为推动物价总水平上升的突出因素。

三是1994年出台的税制改革和汇率并轨，其本身是非常必要的和相当成功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物价总水平。加上1994年工资、利率调整幅度比较大，以及前几年投资膨胀引起的生产资料价格猛涨的影响，1994年传导到下游产品，造成巨大的成本推动。1994年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上升中有65%属于成本推动、35%属于需求拉动，这与1988年那次通货膨胀情况不同，那次主要是过度需求的拉动。

四是这次加强宏观调控有双重任务，一方面要抑制物价

上涨幅度，一方面又要保持经济增长在回落中仍有较快的速度。为此，对连续几年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增长过快以及货币投放过多，没有采取像过去那样的“急刹车”全面紧缩的办法，避免了经济的大起大落，但却增加了抑制物价上涨的难度。1994 年外汇储备激增，增长了一倍多，外汇占款成为基础货币发放的主要渠道，增发了相当数量的人民币（约 2800 亿元），也影响了信贷紧缩与宏观调控措施的效果，这也是始料不及的。

根据对 1994 年经济和物价形势的分析，中国政府提出的 1994 年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是：GDP 增长率，由 1994 年的 11.8%继续回落，1995 年为 8% ~ 9%；商品零售物价上涨幅度，由 1994 年的 21.7%，力争在 1995 年回落在 15%左右。为了实现控制物价的目标，提出了大力发展农业，增加有效供给；实行偏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抑制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以及整顿流通秩序、加强市场与物价管理（包括恢复 1993 年已经撤消的物价管理总局）；并规定 1995 年一般不再出新的调价项目等措施。

近几个月来中国经济走势表明，争取经济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率双回落的努力已经开始见效。第一季度 GDP 增长率为 11.2%，比上年同期 GDP 增长率回落 1.5 个百分点。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预测研究小组的预测，如果今后几个月继续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方向和力度，全年 GDP 增长率有可能回落到 10% ~ 10.2%，接近预定的调控目标。物价方面，与上年同期相比的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的涨幅，从 1994 年第 4 季度起逐月回落：10 月—27.7%，11 月—27.5%，12 月—25.5%，1995 年 1 月—21.2%，2 月—19.7%，3 月—18.7%，

4月—18%，5月—17.6%。按照目前的物价走势与调控力度，预计全年物价涨幅将被控制到接近预定目标。

近几个月物价涨幅回落，无疑得益于1994年9月全国物价工作电话会议以来强化控制通货膨胀的努力，这一努力同中国目前正处于改革开放以来第四个经济周期中后期的收缩机制相吻合。物价涨势趋缓还得益于行政性限价和财政性补贴等控价因素的加强，和前期推动物价高涨因素的减弱。前者如除北京、天津、南京、西安、福州、广州外，35个大城市中有29个实行凭证售粮等，这是不得已采取的措施，将是暂时的。后者如结构性调价引起的物价上涨、外汇占款激增引起货币增发等，将不会在1995年产生明显影响。目前存在着这样几个抑制物价涨势的有利条件：(1) 多数商品供求基本平衡(据内贸部对605种主要商品上半年供求状况分析，供过于求和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占85.6%，其中轻工商品多数处于买方市场。从全社会角度观察，粮食棉花食油糖等供应偏紧的商品大都是紧而不缺)。(2) 1995年农业生产情况有所好转，上半年收成不错。(3) 外汇储备高，一季度末达到580亿美元；调剂余地较大。(4) 政府多次重申实行偏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5) 各地政府表示要加强市场和物价管理等等。这些都将有利于物价涨幅的回落。

但对物价形势也不可盲目乐观。物价涨幅虽然有所下降，但仍在高价位上运行，回落的基础并不牢固。1～5月间新涨价已超过5个百分点。靠行政性限价和财政补贴来压价，难以持久。地方与企业要求放松银根追加投资的呼声很高，各方面期望下半年出台新涨价的政策冲动很强劲。特别是农业隐忧仍多，下半年气候收成难保证。所以抑制通货膨

胀的工作稍有闪失，物价走势就可能出现反弹，那不是我们所期望的。

总之，如果1995年农业收成好，各方面不出台新的上调物价的动作，按照目前宏观调控的方向和力度，全年把物价涨幅控制在接近15%的预定目标是可能的。再经过努力，1996年控制在10%左右，以后再降到8%以下，这样就可以为本世纪最后几年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一个比较良好的运行环境。

从发展趋势看，短期内把中国物价上涨率控制在接近目前发达国家通货膨胀的水平，是难做到的。中国经济正处在转轨的过渡时期，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尚未完成，由外延（粗放）式发展向内涵（集约）式发展的转轨刚刚起步。在这样的过渡时期，结构性的物价上涨是难以避免的。但是基于加快发展的期望和努力造成的通货膨胀压力，一定要控制在经济和社会能够承受的限度以内，否则，在持续的严重通货膨胀压力下，经济改革和发展都难以正常进行，只能是“欲速则不达”。为了防止严重通货膨胀干扰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一方面要完善宏观调控体系，一方面要健全微观经济基础，其中国有企业改革，无论当前或长远来看，都是非常关键的。

## 三

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中国国有企业经过十多年改革，企业活力有所增强，尽管非国有成分迅速扩大，国有成分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持续下降，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在国民经济中仍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993年在乡及乡以上全部

工业中，国有工业企业工业产值占53%，固定资产净值占75%，实现利润和税收占66%，负担城镇就业人数占68%。国有企业为支持中国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总的来说，国有企业活力不足、效益低下的问题还未得到根本解决。不少企业严重亏损（三分之一明亏、三分之一暗亏、三分之一盈利），在竞争能力、效益水平和增长速度等方面，与非国有企业的差距逐渐拉大。1994年，中国在财政金融等宏观经济管理领域出台了不少改革措施。经验证明，宏观领域改革的深化，要遇到微观经济领域特别是国有企业传统体制的制约。例如国家专业银行要改造为商业银行，就遇到国有企业欠银行大量呆帐烂帐不能偿还而且这种坏帐还在增长的问题。据报导，1995年初在中国大陆专业银行和信用合作社的3万亿元贷款中，有20%的总数约6000亿元的呆帐、烂帐，这个问题不解决，并仍要向欠债的亏损国有企业贷款，专业银行的商业化改造将遇到巨大障碍。同时，为抑制通货膨胀而采取偏紧的货币金融政策，加重了国有企业的资金困难，企业间相互拖欠严重，停产半停产企业增多。国有企业改革关系到中国整个经济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和成败，已经到了非动大手术不可的关键时刻。故而从1995年起中国政府将国有企业改革置于整个经济改革重中之重的地位。

造成国有企业目前困难问题的诸多原因中，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1）过去计划经济赋予国有企业过于广泛的产业经营领域，其中许多业务不适宜国有企业去经营，如一般竞争性行业、轻纺日用化工、零售商业饮食服务业等。（2）传统体制造成的政企不分、产权不清、软预算约束等弊端尚未解决，投资决策者不怕收不回投资，企业不怕亏损，反正有国家

财政或者银行来弥补。(3) 国有企业长期承担着远比非国有企业要重得多或者非国有企业所没有的国家财政税收负担和各种社会负担,在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总之,目前国有企业的困难,乃是国有经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中深层次矛盾的集中体现。

对于中国国有企业如何摆脱困境、深化改革,国内外曾有一些人士提出私有化的主张。其中大体又分两种观点:一种是主张把现有国有企业的产权分散化,"落实"或者"量化"到每个国民个人,就像俄罗斯和东欧某些国家在私有化过程中所做的那样;另一种是主张不触动或者绕开现有国有企业,用迅速大力发展各种类型非国有企业的办法,最终把国有企业挤到无足轻重的地位,就像台湾地区和韩国所曾做过的那样。从国有企业目前在中国经济中占有的重要分量看,从中国国内民间资金力量看,特别是从中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看,私有化方案不符合目前中国国情,因而从来没有被官方所认可。但是,在反对私有化的讨论中,也有一种观点不适当地扩大"私有化"的涵盖面,把一些可以研究探讨的产权改革措施和设想如股份制等,统统划入"私有化"思潮加以批判,我以为这也不符合中国改革方向。

中国对所有制结构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方针是:一方面要继续发展包括集体、个体、私营、外资经营等在内的各种类型的非国有企业,一方面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根据这一方针,国有企业改革不是着眼于一个一个的企业,而是着眼于整个国有经济,使其更好地发挥主导作用。这一意义的国有企业改革,我认为至少包括以下几点内容:(1) 对国有经济

经营范围进行战略性调整，使国有企业从一般竞争性行业中退出，转让给各种类型的民有或民营企业去经营，国有资产营运范围收缩集中于自然垄断性部门、公益性部门和国家经济命脉部门，如邮政、电讯、铁路、港口、武器制造、航天、银行、高新技术产业等等。但也有一种意见把国有资产经营领域划得比较宽，把一些带有竞争性的行业如能源、主要原材料、机械电子、汽车、建筑业等产业中的骨干企业都包括进来。(2) 对国有大中型企业，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通行规范，结合企业的具体情况，分类进行公司化的改造。除了极少数特殊产品和服务的供应，可以按照《公司法》的规定，采取国有独资公司形式外，其他一般采取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形式，吸收机构投资、个人投资、外商投资以及企业相互参股等，实行投资主体或产权主体多元化，其中骨干企业要保持国家控股地位。(3) 通过企业产权整体或部分出售、兼并、折股合作等方式，实行国有资产产权的转让和流动，以盘活国有资产存量，优化资源配置。对长期亏损、扭亏无望，不能偿还到期债务的企业，实行破产一批、出售一批、兼并一批。大量国有小企业改组和调整的步子可以迈得更大一些，但也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加以规范，除租赁、承包、拍卖外，也可以进行联合，实行合伙、股份合作制、有限责任公司等组织形式。(4) 由于非企业本身原因形成的历史债务负担、冗员负担，以及企业“办社会”的种种负担，必须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加以解决，否则企业机制难以转化和向现代企业制度过渡。企业的历史债务很大程度是由国家财政调整造成的。例如，本属于国家投资兴办的建设项目和由财政拨款的企业流动资金，1983 年起采取用银行贷款来代替。此后企业生产经营资金得不到应

有的补充，加上税负偏重等原因，致使企业负债累累。有必要通过财政—银行—企业之间的债务重组，建立三者间的良性关系。企业的冗员负担和其他“办社会”负担，要通过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剥离企业办的辅助性机构和服务单位，分流多余人员等途径，逐步解决。

国有企业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当然不止以上所举几点，这些都是难度较大的问题。1993 年末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后，1994 年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做了一些如清产核资等基础性、试验性的工作。1995 年国有企业改革分量加重。除继续一些已在进行的基础性实验性工作外，要着重进行国务院批准的四项大的改革试点：(1) 对一百户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其中工业企业占 80%，其余 20%为外贸商业建筑业等，外加各省市和主管部门自选试点总共 2000 户)。(2) 对三个全国性工业总公司(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中国石油化工工业总公司、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改建为国家控股公司的试点。(3) 55 家企业集团的试点。(4) 18 个城市企业优化资本结构、进行综合性改革的试点。这几项改革试点，牵动着中国经济的方方面面，当然不可能孤军突进，而要同时处理好以下几重关系：一是要把企业的体制改革同结构改组、技术改造和加强企业管理结合起来；二是要把四项大的改革试点工作同面上广大企业的改革工作结合起来；三是要处理好企业改革与其他配套改革的关系，特别是围绕企业改革，大力进行以养老和失业保险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抓紧市场体系特别是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的培育，并继续完善金融等宏观管理体制改革和法制建设。

国有企业改革是中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最重的重点，最难的难点，因此不可能期望旦夕完成，而需要比较长期艰苦的努力的探索。现在看来，经过今明两年的改革试点，总结经验，在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1996～2000年）加以推广并不断完善，在本世纪内初步完成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基本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可能的。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将是一个很可观的成就。它对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促进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成功，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 四

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展望。如果中国在宏观经济调控上今后能够有效地抑制高通货膨胀并防止再现大起大落，在经济体制上能够在改革国有企业的基础上稳步地转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并不断完善，中国经济以较快速度增长的势头今后二三十年可望继续保持下去。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预测研究课题组参照IMF用的两种方法测算，未来二三十年中国GDP在国际上的位次，按实际汇率折算：由1991年占第10位，2000年上升到第7位，2010年上升到第4位，2020年上升到第3位。按购买力平价折算：1991年占第3位，2000年略微超过日本，占第二位，2020年略微超过美国，占第一位。

这两种折算方法各有缺点。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的评估来说，用实际汇率折算法，往往被低估；而用购买力平价折算法，则往往被高估。所以这些测算只能有参考意义。而且估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发展水平，不能光看经济总量（如

GDP、DNP),还要看人均水平和经济发展的结构和质量。中国经济总量增长尽管很快,但人均水平低,发展质量也还很差。

在人均水平上,未来二三十年内中国不可能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预测研究课题组测算,即使用估算结果往往夸大发展中国家相对地位的购买力平价折算法,中国人均 GDP2020 年将近 10 570 美元,仍属上中等收入国家范围,与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差距仍然很大(届时美国人均 GDP 为中国的 3.4 倍,日本人均 GDP 为中国的 5.4 倍)。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最近有一个测算:2040 ~ 2050 年中国人均 GDP 只能达到发达国家本世纪末的水平。再从发展质量看,中国在产业结构、城乡结构、管理水平、技术水平、基础设施、环境质量等等方面,从全国范围来看,离现代发达国家的差距仍然很远。所以,对中国经济迅速增长这一事实,必须实事求是,全面考虑,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

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实力的增强,为世界经济发达国家扩大商品出口和对外投资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和宽阔的场所。中国占世界贸易总额的位次,1979 年为第 32 位,1993 年提升到第 11 位。中国已成为全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国家。现在全世界都在看好中国市场。根据预测,2000 年中国的年进出口贸易总额将达 4 000 亿美元,从现在到 2000 年进口订货累计将达 1 万亿美元。这个大市场的吸引力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投资环境的改善,将为亚太地区和世界经济发达国家特别是从我们近邻日本吸纳更多的商品和投资,提供更广阔的市场,从而有利于亚太地区的繁荣,有利于包括日本在内的经济发达国家景气的上升。

# 13　对当前经济形势与宏观调控取向的一些看法*

（1995 年 11 月 5 日）

1995 年就要过去了，今年经济形势如何？明年经济走向如何？“九五”时期～2010 年经济展望前景如何？这是大家关心的问题。

首先谈谈当前经济形势。

当前，中国经济处于改革开放以来第四个经济周期的中后期。这一轮经济周期从 1990 年底 1991 年初开始回升，1993 年中达到高峰，此时重新出现经济过热，特别是金融秩序紊乱，于是六七月间开始实行加强宏观调控措施，同时在财政税收、金融外汇等领域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逐步取得了成效，既避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烧，又避免了用急刹车和全面紧缩的办法带来经济大滑坡，使 1994 年中国经济在平稳回落中仍然保持了较快速度，今年 1995 年继续保持了平稳的发展，宏观经济进一步降温，趋向预定的调控目标。两个主要指标如下：

---

* 本文系作者 1995 年 11 月 5 日在湖北省荆州市召开的第八次全国中等城市经济发展研讨会上的讲话第一部分。主要内容曾在 1995 年 11 月 28 日《亚太经济时报》，《沿海新潮》1996 年第 1 期等处发表。

(1) 增长速度，1992 年 13.4%，1993 年 13.2%，1994 年 11.8%，1995 年一季度 11.2%，上半年 10.3%，1～3 季度 9.8%。

(2) 零售物价指数：

1992 年 5.4%，1993 年 13.2%，1994 年目标为 10%以内，实际达到 21.7%。1994 年 10 月以后指数逐月下降，10 月 27%，11 月 26.4%，12 月 23.2%，1995 年 1 月 21.2%，2 月 19.7%，3 月 18.7%，4 月 18%，5 月 17.6%，6 月 16%，上半年平均为 18.5%。7 月 14.6%，8 月 12.3%，9 月 11.4%，1～3 季度 16.6%。

1995 年全年趋向 15%的调控目标。

这样看来，1993 年中以来采取经济“软着陆”的政策，逐步取得成功。从加强宏观调控政策开始到现在，将近 30 个月，改革开放以来第四个经济周期(从 1991 年初开始)也已 5 年。中国经济逐步降温，是否已达到谷底？另外，今年我们完成了第八个五年计划，提前实现了比 1980 年翻两番的目标。明年开始第九个五年计划，向新的目标迈进，这样今明两年，我们既处在两个五年计划之交，又可能是两个经济周期之交。但后一个交叉要依存于我们对谷底的判断，究竟何时达到谷底？此次谷底的特点又如何？这些判断对今后宏观政策的取向都很有关系。

对于这一轮经济周期何时达到谷底，有不同的说法，10 月 5 日社科院经济预测讨论会上，至少有 6 种说法：

1. 今年底，明年一季度到谷底；

2. 明年二季度到谷底；

3. 明年下半年到谷底；

4. 明年年底到谷底；

5. 1997 年到谷底；

6. 不明显，很难判断，这是因为目前经济走势是在高位平底上平稳运行，没有明显形成传统形状的谷底。

按照初步预测，明年经济增长率将进一步降到 8% ~ 9% 之间，物价上涨率下降到 10% 左右，如果说谷底在 1996 年前后形成，那么此次谷底与过去经济周期有两个显著不同的特点。第一是谷底的位置即谷位比较高，过去谷底有时出现负增长或 3% ~ 4% 的低增长率。而此次谷底增长率比较高，接近 10%。过去谷底物价指数接近零增长，而这次商品零售物价指数处于 15%（1995 年）与 10%（1996 年）之间，仍然不低。

第二是，此次经济周期从高峰到谷底的落差，小于过去的经济周期。改革以来前三个周期的落差大约是 6 ~ 7 个百分点，这一次，从 1992 年的 13% 降到今年 10% 左右，明年 9% 左右，只下降了 3 个到 4 个百分点。之所以出现这两个特点，是由于机制和政策两个方面的原因。在机制方面，由于改革的结果，微观上市场主体增多，适应性比过去增强；宏观上 1994 年以来，财税金融体制的改革，市场手段部分地替代了行政手段，也有助于熨平波动。在政策方面，过去遇到经济过热往往在瓶颈制约难以为继以后进行调整，采取急刹车，一刀切的办法，大起之后继之以大落。而这次调整，则在尚未发生大震动以前及时切入，而且采取了微调软着陆的办法，力度也比较适当。因此，这次经济调整使谷底出现了上述新的特征。当然，也要看到，由于微观机制上特别是国有经济政企不分，预算软约束的弱点，不能在经济走向低谷的阶段像市场经济国家那样进行淘汰清理，使经济机体健全。加上宏调中旧的行政手

段不时复出，一刀切的毛病难以完全避免，引起微观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某些困难加剧，这个问题现在还在发展，不可忽视。

分析和认识当前经济谷底的特点，是有其政策含义的，就是说：下一轮经济周期回升和向新的高峰推进阶段，经济上升的空间余地都不是很大，因为谷底起点高，接近 10% 的增长率，10% 左右物价上涨率，都不是低速度或是低通胀。在此高位的出发点上，如果我们期望下一轮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上升幅度很高，经济过快增长会带来严重的通货膨胀后果，这个问题下面还要谈。现在回到明年和今后五年经济走势的预测和宏观调控政策把握问题，很显然，明年经济发展有着不同可能的走势，这在相当程度上要取决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取向。中国社科院预测课题组分析了三种不同的政策取向和宏观经济走势。

第一种可能的经济走势和政策取向是：鉴于 1995 年经济增长率仍将高达 10% 左右，物价上涨率仍将高达 15% 左右，二者均处于高位水平，为了继续压低物价上涨率，控制经济的过快增长，1996 年经济增长率应有一个较为明显的下降。为此，1996 年宏观调控继续从紧的方向不变，但力度上要加大，要“更紧一些”。

第二种可能的经济走势和政策取向是：经过几年来的偏紧的宏观调控，经济增长率，投资增长率连续回落，物价上涨率年末将回落到今年调控目标，交通运输，能源，主要原材料等，瓶颈制约已经缓解，某些生产资料已有积压，特别是国有企业目前面临的困难很大。因此 1996 年宏观调控的方向应改变，货币政策应由从紧转为“放松”，以启动投资消费需求，

刺激经济增长率重新回升，进入新一轮的高速增长。

第三种可能的经济走势和政策取向是：为了巩固几年来“软着陆”的成果，继续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使经济增长速度既不反弹也不过度下降，而保持经济增长率和物价上涨率继续平稳回落的势头。为此，宏观调控应继续坚持“适度从紧”的政策，坚持现有的方向和力度，根据新的情况进行微调，把控制需求与改善供给，控制总量与调整结构结合起来。

以上三种政策取向和发展的可能性，目前都有人主张。但第一种进一步加大紧缩力度的主张，实行起来有使经济失速滑坡与企业困难加大之危险，目前赞成的人不多。持第二种主张，要求全面放松银根，启动经济增速的人，目前似乎正在增加，特别是地方和企业方面呼声甚高，前几年经济过热中起泡沫的有些地方有人问新闻记者，明年房地产市场、证券市场，会不会又要火爆一场？反映了这种迫切的心情，理论界也有人附和这种倾向。但这种主张在当前宏观形势之下实行起来有使经济迅速反弹，物价重新猛升，近 30 个月软着陆政策措施取得的成效功亏一篑，全功尽弃的危险。我们认为 1986 到 1988 年软着陆不到位经济就一再腾空而起，最后被迫掉下来，不得不进行治理整顿的教训，是不能忘记的，因此，我们倾向于第三种政策取向，实现第三种可能的经济走向，主要的根据是：

虽然两年多来特别是今年三个季度以来宏观经济形势好转，但好转的基础不稳固。首先是固定资产投资回落的基础不稳固，在建规模仍然很大，一些地方，上项目铺摊子的投资冲力依然很大，稍有放松，投资需求就可能出现反弹。第二是

物价回落的基础不稳固，前一阶段物价涨幅的回落，在相当程度上，是靠行政性限价、财政补贴压价和延缓出台价格改革措施来取得的。任何一方面有变动，都会使物价再度爬高。第三是尽管今年农业取得较好收成，但农业基础依然脆弱，农产品供求仍处于紧张平衡状态，特别是食品涨价，对物价上涨压力仍然较大。第四是微观经济基础困难，问题重重，特别是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比较高，资金紧张与资金使用效益低并存，因此仅靠注入资金和增加总量投入，无助于解决这些矛盾，反会导致通胀的再度反弹。第五是货币供应量虽然前三季度广义货币(M3)的增幅比上年同期回落 6.5 个百分点，但比去年同期仍提高 30.6%，高于经济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率之和(9.8 + 16.6)%，从全年来看，今年经济增长率回落到 10%以内，物价上涨率回落到 15%左右的预定目标，但是整个经济仍在高位上运行，总需求膨胀危险依然强大，通货膨胀的压力仍然不小。

在此形势下，为了巩固几年来宏调政策取得的成果，争取“软着陆”的踏实到位，使我国经济发展由改革开放以来的第四周期平稳地过渡到第五周期，由第八个五年计划健康地进入第九个五年计划，采取上述第三种政策取向，争取第三种发展可能，我以为是比较明智的。这就是说，从今年年末到明年，我们要继续坚持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保持现有的宏观调控的方向和力度，同时，把控制需求面与改善供给面两个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争取明年经济增长率回落到 9%，物价上涨率回落到 10%左右，进一步向“九五”的目标前进。

继续坚持适度从紧的宏观调控方针，已经由有关方面认定并公布，从五中全会关于“九五”到 2010 年发展目标的建议

内容来看，实行适度从紧的方针，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这不仅仅是今明年的任务，而且是整个“九五”期间货币政策的主旨。在众说纷纭的情况下，我赞成把这条适度从紧方针再次加以明确，这将有利于我们平稳地由第四个周期向第五个周期过渡，健康地进入第九个五年计划。之所以不仅在短期，而且在中长期选择适度从紧的方针，我以为有两方面的原因：机制方面和运行方面。机制方面我们的旧体制，特别是国有经济中政企不分，预算约束软弱的传统弊病仍未根治，很容易发生投资膨胀和经济过热。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要获得较快的速度是比较容易的，政府干预有很大的作用。历史经验证明，一放开，一号召，就能上去，但是在快速发展的情况下要使财政基本没有赤字，不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那就难了。真正的本事在于既有一个比较高的增长速度，又能保持财政的基本平衡；通货膨胀保持在老百姓可以承受的程度以内。这就一方面要靠科技，走内涵集约发展的路子；一方面要靠在财政货币政策上适度从紧，把住货币和信贷两个闸门。我们常讲要有适当的速度，太低了不行，太高了也不行，其实不必怕太低，因为很容易上去；倒是怕太高，下来损失太大。所以要保持健康的发展，中长期也要适度从紧。其次是从下一个周期的走势看，前面分析此次周期谷位较高的特征时，就指出下一次回升及向新的高峰走的阶段，经济增幅上升的空间余地不是太大，GDP 增长速度为 10% 的起点上，按照过去落差，六、七个百分点加上去，那么经济增长率就有可能达到 16% ~ 17%，我们的经济肯定承受不了。所以从周期运行的轨迹看，今后五年采取适度从紧的方针，把抑制通货膨胀放在宏调任务的首位，也是必要的。

当然对于近期特别是今后五年中长期是否要采取适度从紧的方针，是有不同意见的。有的同志认为，中长期不能老是从紧，只能时松时紧，这松那紧，因时因势而宜。当然，要随时调整政策进行微调，但只能在总的适度从紧的前提下，进行时松时紧、这松那紧的微调，不能没有一个总的政策方向，好比开汽车方向盘要不断的调来调去，但总方向要循着路径与目标前进。

宏观经济调控不能单纯在需求的松与紧上做文章，不能单纯地在总量上做文章，而必须在控制需求总量的同时，努力改善供给面，从而增加有效供给。从明后年转入新一轮经济周期和进入"九五"时期的中长期发展来说，改善供给面的任务更为重要。由于此次经济低谷如前所述起点水平较高，新一轮回升增长幅度空间余地不大，更要改变过去宏观调控的一贯做法，即每逢进入新一轮周期，总是采取全面放松的政策，以投资膨胀为先导，刺激总需求，推动经济超高速增长，这样导致经济过热遇到瓶颈障碍，不得不走调整、紧缩的老路。要把这条老路转变为：把控制需求与改善供给相结合，通过适当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促进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调整和发展，促使科技进步，促进生产效率和整个国民经济素质的提高，这样来扩大社会有效供给，真正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

# 14　我赞成继续“适度从紧”*

## （1996 年 1 月）

“八五”的最后一年——1995 年已经过去。“八五”期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总的来说是不错的，提前实现了 GNP 比 1980 年翻两番的目标，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整个“八五”是在从 1991 年开始回升的一轮经济周期中渡过的，这一轮周期于 1993 年年中达到过热的高峰，此后通过加强宏观调控和实施宏观体制改革的措施，各项宏观指标错落有致地趋于降温，1995 年 GDP 增长速度回落到 10.2%，零售物价指数回落到 14.8%左右，接近预定的调控目标。以抑制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适度从紧”的宏观调控政策，正在逐步取得“软着陆”的成效。当然也要看到，由于微观机制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滞后，不能乘经济走向低谷的机会进行有效的淘汰清理和结构调整，再加上宏调中旧的行政手段不时复出，一刀切的毛病难以完全避免，于是导致了微观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某些困难加剧，这是不能忽视的。

在此情况下，1996 年和整个“九五”期间，宏观调控的方向应如何把握？这个问题关系到今后的经济走势和改革环境，人们十分关注。十四届五中全会的《建议》提出，“九五”期

---

* 本文发表于《上海改革》1996 年第 1 期。

间要继续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继续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此，并不是大家普遍理解的。现在有一种正在产生并在滋长的情绪：期望放松宏观调控。从开始加强宏观调控到现在已满30个月了。这一轮经济周期从1991年初开始回升算起，也有5年了。经过两年半以来实行偏紧的宏调政策，经济增长率、投资增长率连续回落，物价上涨率1995年也回落到预定调控目标。交通运输、能源、主要原材料等瓶颈制约已经缓解。特别是国有企业面临的困难还在加大。因此，一些人士认为，1996年宏观调控政策的方向应予改变，不少地方和企业要求松动银根、以启动经济增速的呼声很高。前几年经济过热中起过泡沫的有些地方有些人士问，证券市场、房地产市场会不会又要火爆一场？反映了这种情绪。附和这种情绪的“理论”杂音也时现时隐。他们实际上不赞成继续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今后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对继续采取“适度从紧”的政策持怀疑观望态度。

我认为，上述要求放松银根以刺激经济增速的意见是不可取的。在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下，按照这种意见去做，必然使经济迅速反弹，物价重新猛升，已经进行了30个月的“软着陆”制动措施取得的成效将有功亏一篑，前功尽弃的危险。1988年前几年屡次“软着陆”尚未到位就重新腾空而起，最后被迫摔下来，不得不进行急刹车式的“治理整顿”的教训，是不能忘记的。当前宏观调控政策的唯一正确的取向，是五中全会《建议》中提出来的，继续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继续坚持“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且根据新的情况进行微调，把控制需求与改善供给、控制总量与

调整结构结合起来。我体会，采取此项方针的主要根据是：

虽然两年半来特别是1995年以来宏观经济形势好转，但好转的基础并不稳固。首先是固定资产投资回落的基础不稳固，在建规模仍然很大，一些地方上项目铺摊子的投资冲力依然很大，特别是“九五”新五年计划的伊始，不少地方有一种大干快上的劲头，稍有放松，投资需求可能出现猛烈反弹。第二是，物价回落的基础不稳固，前一阶段物价涨幅的回落，在相当程度上，是靠行政性限价、财政补贴压价，和延缓出台价格改革措施来取得的。任何一方面有变动，都会使物价涨幅再度爬高。第三是，尽管1995年农业收成较好，但农业基础依然薄弱，农产品供求仍处于紧张平衡状态，特别是食品涨价对物价上涨压力仍然较大。第四是，微观经济基础困难较多，问题重重，特别是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较高，资金紧张与资金使用效率低和大量体外游资并存，因此仅靠注入资金和增加总量投入，无助于解决这些矛盾，反会导致通胀的再度反弹。第五是，货币供应量的增幅虽然比上年减少，预计全年广义货币(M3)的增幅比上年同期回落6.5个百分点，但货币供应量仍比上年同期增长30%，高于经济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率之和(10.2+14.8)%。从全年看，1995年经济增长率虽回落到10%左右，物价上涨率回落到15%以下，但整个经济仍在高位上运行，总需求膨胀的危险依然强大，通货膨胀的压力仍然不小。

从五中全会《建议》内容来看，实行“适度从紧”的方针，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这不仅仅是1996年的事情，而且是整个“九五”期间宏观调控政策的主旨。在众说纷纭的情况下，我赞成把这条“适度从紧”方针再次加以明

确，这将有利于我们平稳地由改革以来的第四个经济周期向第五个周期过渡，为“九五”时期进一步的改革和发展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之所以不仅在1996年，而且在整个“九五”的中长期也要选择“适度从紧”的方针，我以为有两方面的原因：机制方面和运行方面。

机制方面，目前我们还处在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阶段，旧体制的一些弊病，特别是国有经济中政企不分、预算约束软弱的弊病仍未根治，很容易发生投资膨胀和经济过热。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要获得一时的较快速度是比较容易的，政府干预有很大的作用。历史经验证明，一放开，一号召，就能上去，因为主观上有大干快上的愿望，客观上有外延膨胀的机制。但是，在快速发展的情况下要使财政基本没有赤字，不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那就难了。既要有一个比较实在、比较高的增长速度，又能保持财政的基本平衡，把通货膨胀抑制到老百姓可以承受的最低限度，那就要一方面靠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内涵集约的发展路子；一方面要靠在财政货币政策上适度从紧，把住货币和信贷两个闸门。我们常讲要有适当的速度，太低了不行，太高了也不行。但正如经济学界一位老前辈曾经说过，对这两点，不能各打五十板。其实我们不必怕太低，因为很容易上去；倒是怕太高，跌下来损失太大。所以要保持继续健康的发展，中长期也要“适度从紧”。

再从经济运行方面，看看下一个经济周期可能的走势。当前周期谷底的位置是比较高的。假定1996年为谷底，经济增长率将达9%左右，物价上涨率将达10%左右，都不能看作低速度或低通胀。在如此高的谷位起点上，下一个经济周期

上升的空间余地不是太大。如果宏观调控放松，并让经济增长率按照过去周期峰谷落差（改革开放以来前三个周期峰谷落差为6到7个百分点）回升上去，那将势必导致猛烈的过热增长和更加严重的通货膨胀，我们的经济肯定承受不了。所以从经济周期运行的轨迹看，今后五年采取“适度从紧”的方针，把抑制通货膨胀放在宏观调控任务的首要地位，也是必要的。

当然，宏观调控不能单纯在需求的松与紧上做文章，不能单纯地在总量控制上做文章，而必须在控制需求总量的同时，努力改善供给面，从而增加有效供给。从今明两年转入新一轮经济周期和进入“九五”时期的中长期发展来说，改善供给面的任务更为重要。由于此次周期低谷起点水平较高，新一轮增长幅度上升的空间余地不大，更要改变过去宏观调控的一贯做法，即每逢进入新一轮周期，总是采取全面放松的政策，以投资膨胀为先导，刺激总需求膨胀，推动经济高速增长，这样导致经济过热，遇到瓶颈障碍，于是不得不调整、紧缩。要把这条老路转变为：把控制需求面与改善供给面结合起来，通过适当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收入政策等配合运作，促进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调整，促使科技进步，促进生产效率和整个国民经济素质的提高，这样来扩大社会有效供给，真正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 15　经济形势分析与宏观调控对策*

（1996年5月3日）

## 一

关于对1996年经济形势的分析，主要有两大问题：一是，1993年年中以来的“软着陆”是否已经到位？这一轮的经济波动何时到达谷底，何时转入新一轮周期的回升？二是，宏观调控应采取何种对策，方向与力度如何把握？

就第一个问题来说，各方面的意见不尽一致。有的认为，1996年上半年到达谷底，下半年转入回升；有的认为，1996年底到达谷底，1997年转入回升；还有的认为，1997年是谷底，1998年转入回升。不论是哪种可能，关键的问题归结于宏观调控政策的取向。

在1996年宏观调控政策的取向上，也有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应该停止从紧政策，转向放松政策。也就是说，宏观调控的方向应该改变。主要理由是：目前我们面临着就业压力大、国有企业困难大的问题；同时，经过近三

---

* 本文系作者1996年5月3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1996年春季座谈会上的开幕词（摘要），发表于1996年5月13日《经济日报》。

年的紧缩，能源、交通、原材料等“瓶颈”制约已趋缓解，一些生产资料已处于闲置状态或出现积压。

第二种意见认为，应该继续采取“适度从紧”的政策，不能放松。主要理由是：“软着陆”尚未到位，各方面要求大开快上的势头强劲，物价形势依然严峻，通货膨胀率反弹的压力还很大。

第三种意见认为，兼顾以上两种意见所提出的理由，应该考虑在坚持总量上“适度从紧”的原则下，根据经济波动的态势和物价上涨的态势，审时度势地进行微调，该紧的还是要继续紧，该松的可以有重点地、结构性地、适度地和逐步地有所放松。

所谓“该紧的还是要继续紧”是指，对于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的控制，对于新开工项目的控制，对于房地产、开发区建设的控制，对于贷款总规模和新增货币发行量的控制，对于财政支出和赤字的控制，对于物价上涨幅度的控制，等等，还是要从紧。

所谓“有重点地放松”是指，对于经济效益好、产品有市场的国有企业，在流动资金方面应该给予支持，以促进有效供给的增加。

所谓“结构性地放松”是指，对于农业、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等“瓶颈”部门，对于国家重点投资项目，要给予一定的倾斜政策，保证资金到位，以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

所谓“适度地放松”是指，在方向和力度的把握上，要加以控制，避免激起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的强烈反弹。

所谓“逐步地放松”是指，在时间的操作上，要随着波动态势的推移而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

以上对于1996年宏观调控政策取向的三种意见，目前都有人主张，各自也都有其道理。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主张第一种意见的人正在增加，特别是各地方以及企业方面。我个人是同意以上第三种意见的。

## 二

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关于使物价上涨率低于经济增长率的问题。这里，我想说这样几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如果不去追问物价上涨率与经济增长率这两者的挂钩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存在着含糊不清的问题，而仅从近几年来我国的物价上涨率高于经济增长率的实际情况出发，强调首先要把过高的物价上涨率降低到经济增长率以下，我认为，这是可以暂时接受的。因为这是针对我国近几年来的特殊情况而言的。

第二层意思，如果把物价上涨率低于经济增长率作为物价上涨可以被接受的标准，作为经济运行状况良好的标准，那么我认为，这个提法是欠妥当的。之所以欠妥当，首先是因为，物价上涨率能否被接受，是由一定时期内居民收入的增长状况、不同居民间收入分配的差距、居民的心理承受程度、商品生产者成本的承受程度等多种经济、社会因素所综合决定的，而并非与经济增长率的高低相挂钩的。其次，把物价上涨率的能否被接受，与经济增长率挂起钩来，在这里，一个重要的前提还没有被认定，那就是，被挂钩的经济增长率是否是一个合理的、正常的、适度的经济增长率。如果经济增长率是一个处于过热状态下的增长率，那么低于这个经济增长率的物

价上涨率是否就是可以被接受的呢？比如，就个别年份的情况来说，1993年，物价上涨率为13.2%，低于13.5%的经济增长率，是否可以认为这是宏观经济运行状况良好的一年呢？事实是：这一年是经济过热、经济秩序混乱达到顶峰，不得不转而采取加强宏观调控、整顿经济秩序的从紧政策的一年。

第三层意思，按照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物价上涨率挂钩的，不是现实的实际经济增长率，而是实际经济增长率与潜在经济增长率之间的缺口，或者说，是实际经济增长率偏离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程度。所谓"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指，在一定时期内，社会的物力、财力、人力这些资源在正常的、充分利用的条件下，所可能达到的增长率。如果实际经济增长率超过了潜在经济增长率，物价就会上涨；反之，则不会上涨。在这里，判断实际经济增长率是否正常、是否适度，就有了一个客观标准。这个标准就是一定时期内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同时，我们要注意的是，物价上涨率同"实际经济增长率与潜在经济增长率缺口"的挂钩，也只是用来说明它们之间的数量变动关系，而不是用来说明物价上涨率是否可以被社会所承受的问题。

第四层意思，从我国目前正处于体制转型时期的情况出发，影响物价上涨率的因素除了"实际经济增长率与潜在经济增长率之间的缺口"这一因素之外，还有价格的结构性调整与价格形成机制、价格管理机制的改革因素。由于价格调整与改革而带来的物价上涨，与一般意义上的通货膨胀还不是同一个概念。我们在考虑控制物价上涨率的时候，还要为合理的、正常的、适度的价格调整和改革留出一定的余地。这个余

地可以构成控制物价上涨率的下限。那么，控制物价上涨率的上限，我认为，应该是银行利率。当然，银行利率也要随整个经济形势的变动以及物价的变动而变动。

# 16　对当前经济形势与若干流行观点的一些看法*

（1996 年 8 月 21 日）

从 1993 年年中开始实行的加强宏观调控和适度从紧的方针，到现在已经三年多了，实行的效果如何？当前经济形势如何？这一方针政策是否需要改变或者调整？各方面人士都很关注这些问题。

对于当前中国经济运行状态，我国经济学界和经济界人士似乎普遍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宏观经济运行基本正常，但以企业生产经营状况为主的微观经济形势不怎么好。这种看来不合逻辑、相互矛盾的判断，有着事实的支持。

从宏观经济运行来看，(1) 在继续实行适度从紧政策的情况下，国民经济总体上保持适度增长，今年上半年 GDP 比上年同期增长 9.8%，与 1993 年以来各年增长速度相比，呈持续回落态势，但仍保持了较高的速度。上半年农业生产形势不错，夏粮创历史最高纪录，总产量达 1 100 余亿公斤。工业

---

* 本文系作者 1996 年 8 月 21 日在鞍山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系统研究会第八届年会上的发言，曾在《经济学动态》1996 年第 9 期，《开放潮》1996 年第 6 期，《价格理论与实践》1996 年第 10 期，《宏观经济管理》1996 年第 11 期，《沿海经济》1997 年第 1 期等处全文或摘要刊载。

生产保持了稳定增长，全国乡及乡以上工业完成增加值比上年同期增长了13.3%，7月份与上年同月比增长12.2%，1～7月与上年同期比增长13.1%，这个速度不能算低。(2) 市场物价涨幅进一步减弱。自1994年10月市场物价增幅达到峰顶(比上年同月增长25%)以来，到今年7月末的月同比上涨5.8%，已持续21个月呈逐月回落态势。今年上半年商品零售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7.1%，比去年同期上涨率18.5%回落11.9个百分点，比去年全年上涨率14.8%回落7.7个百分点。1～7月份物价涨幅进一步降到6.9%。自去年11月以来，零售价格月同比涨幅已连续9个月低于10%，落到一位数，5月为6.5%，6月为5.9%，7月为5.8%。(3) 财政收入增长较快，金融形势保持稳定。上半年国内财政收入(不含债务收入)同比增长17.7%，增长幅度高于去年同期11个百分点。金融机构存贷款稳定增加，货币增长得到控制，狭义货币供应量 $M_1$ 的增幅，今年上半年已由去年同期的21.2%降到15%。(4) 外贸方面，虽然上半年出口额比上年同期下降了8.2%，进口额比上年同期增长了11.6%，但是，1～5月份曾经出现的进出口贸易逆差430亿美元，到6月份被克服，上半年仍出现了8.8亿美元顺差。7月份出口降幅比上半年有所减小，进口增幅比上半年进一步回落，1～7月外贸顺差累计20亿美元。利用外资继续增加，上半年外商实际投资比上年同期增长20.18%。国际收支情况良好，截止7月末，国家外汇储备达到近900亿美元，比去年末增加130亿美元。美元人民币汇率稳定在1$ = 8.32元人民币左右。

由上可见，上半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基本上是正常的，有人说是1993年以来最好的一年，相对来说，也不为过。

这是1993年开始实行的加强宏观调控政策和1994年以来对财政、金融、外贸等体制改革取得成效的表现。这为实现1996年全年和整个"九五"期间的宏观调控目标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当然，对宏观经济形势不可盲目乐观。一些国民经济综合性指标，包括结构、效率、失业率、收入分配等情况都不太好，财政、金融、外贸情势也存在一些问题，潜伏着一些隐患。物价涨幅的回落，在相当程度上是用行政手段、财政补贴限价压价的结果，不很牢靠。经济总量关系很难说已经协调。这些都严重制约着经济的发展。尤为突出的是，相当一部分工业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不太好，特别是部分国有企业面临很多困难。据对全国38万户乡级以上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统计，上半年实现利润总额与去年同期比，下降了36.3%，亏损企业亏损额比去年同期上升了50.5%。其中，国有企业利润同期比下降88%，亏损额上升50.7%。企业占压资金多，使用效率差，以及企业间相互拖欠继续增加，也增大了银行的金融风险。停产半停产的企业和下岗待岗人员增多，约有5%～7%国有企业长期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涉及职工750万人，6月末城镇登记失业人员达到525万人，登记失业率为2.9%。以上两类人员（下岗待岗、登记失业），再加上一部分离退休费标准偏低人员和其他城镇优抚救济对象，生活都比较困难。由此引发一些社会不安定问题比过去增多，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对于当前经济运行中宏观微观的反差和矛盾，应当如何认识和对待，这是目前一个热点问题。中国经济改革前几年在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进入了改革的

新阶段后，很快又遇到经济过热经济秩序混乱的局面，于是自1993年年中开始，从加强宏观调控入手进行整顿，几年来逐步取得成效。尽管宏观调控体制距离完善的程度仍然遥远，可是它的微观基础特别是企业改革则更迟步缓进，不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特别是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的要求。企业效益滑坡、部分国有企业困难加大，就是这种不适应的重要表现。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如何治理？有各种不同意见，其中有一种越来越流行的意见，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周期已经处在经济萧条后期阶段，这一轮经济周期已到谷底，目前已经出现需求不足，资金紧缺，物价过跌，故而产生国有企业困难加剧，失业压力加大的问题。由此提出主张，要改变目前宏观调控政策的大方向，停止执行适度从紧的政策，不再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原定整个"九五"期间都要实行这一方针），而要把解决失业和刺激增长作为首要任务；为此应采取放松银根的政策，使经济周期迅速从低谷转向回升。

上述观点并不是占统治地位的观点。但目前有一些人士（包括经济理论界人士）中颇为流行，其影响也不能小视。正确的观点和政策要在不断与上述观点和主张的研讨和交锋中形成和贯彻。这次研讨涉及的问题很多，下面谈几点主要的。

## 一个是总量平衡问题，当前是不是出现了严重的需求不足？

今年上半年，全国工业产销率比去年同期曾有所下降，产成品库存比去年同期上升。同时，工业开工率不足，停产半停

产现象比较严重。能不能由此得出结论，当前总量平衡关系处于总需求不足的状态？因而宏观调控政策的取向，应当由适度从紧的控制需求，转变为从松的刺激需求的方针？

回答是：不能得出这个结论。首先，今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幅虽然继续回落，但这是在前些年投资增长过快基础上出现的回落，上半年投资增加幅度达到18.6%，扣除物价因素也有12%左右，比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幅度9.8%高2.2个百分点，占GDP的比重为22.5%，比上年同期提高0.2个百分点。由此看来，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比较适度，保持了对经济增长的适当拉力，不能说投资不足。从今后一段时间看，投资扩张的冲动仍很大，光是"八五"结存到"九五"的国家计划内在建大中项目规模就不小，加上计划外以及非国有投资的在建项目，建设摊子就已经过大，又普遍大幅度地超预算，不少在建工程项目资金缺口很大，要消化这些缺口至少还需要两三年时间。"九五"规划规定全国经济增长目标是年增8%，但是各省市上报的规划都超过8%，普遍存在大干快上的劲头。所以对投资需求决不是刺激扩张而是继续防止扩张失控的问题，否则就会重复过去投资过度膨胀引起经济过热的后果。

从消费需求看，今年上半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同期增长21.2%，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13.2%，大大高于经济增长率(9.8%)，也高于以往正常年度增长幅度为8%～9%的水平。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和消费品市场增长的趋势看，今后一段时间也不存在消费需求不足问题。但是随着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消费需求的结构将发生变化，如供给结构不能适应，有可能影响总量平衡。

工业产销率低、库存增加，部分企业开工不足等情况，从宏观上看，主要是前些年经济过热时投资规模急剧膨胀，盲目上了许多低水平重复建设项目，以致生产能力明显超过市场正常需求，而在加强宏观调控后需求总量逐步走向正常的过程中，结构调整又跟不上宏观调控要求的结果。目前产销率低，开工不足的，主要是那些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严重，生产能力明显超过市场正常需要的行业和产品，如纺织、平板玻璃、一般机电以及某些日用消费品等。必须根据国内外市场需求和竞争条件的变化，对这些行业和产品实施战略性调整、改组和改造，加大结构调整力度，才能解决。

关于国外需求是否不足的问题。今年上半年进口贸易顺差由上年同期131.7亿美元降为8.8亿美元，减少了120多亿美元，从这一点来看，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力确实大大减弱。但今年上半年进出口形势的变化（出口减少，进口增加），主要与国家实行降低进口关税同时取消进口减免税优惠、下调出口退税率以及出口退税缓滞等政策因素有关。近两个月随着企业逐步适应税收政策的调整和出口退税加快，月度出口逐月增加，逐步恢复稳定增长。进入第二季度以来，一些企业突击进口的情况已经消除，上半年已实现扭逆为顺。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增长4%，国际贸易总量增长7%，所以国际市场也不存在需求不足的问题。关键在于我国产品是否有竞争能力，能够出去（上半年我国出口额下降8.2%，国有外贸企业出口下降幅度较大，负26.6%，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则快速增长，正38%，这个情况值得注意）。

## 第二个问题：资金供应是否过紧？银根到底紧不紧？

这个问题与前一个问题即需求是否不足问题相连。如果目前总量平衡关系中的主要问题是需求不足，逻辑的结论当然是与资金供应过紧有关。主张改变当前宏观调控方向由紧变松的人士，无不认为当前国有企业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资金紧张、银根太紧。

由于我国经济体制转轨尚未完成，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依然存在，负盈不负亏的机制依然存在，因此企业资金紧张是一种恒常现象，即使在银根宽松时，也是这样。

我国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已经两三年，但是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的好转，从去年第四季度起在总体上继续适度从紧的前提下，以微调方法开始放松调控力度；今年上半年加大了在总体从紧情况下对有市场、有效益的生产经营和重点建设的支持力度。去年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比上年增长约26%，大大超过去年的经济增长率（10.2%）和工业增加值增长幅度（14%），银根并非过紧。今年上半年6月底全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达54381亿元，比年初余额增长23.4%。1～6月新增贷款比上年同期增长36%，其中国家银行新增贷款比上年同期多增1007亿元，增长幅度达62.5%，也大大超过上半年的GDP增长幅度和工业增加值的增长幅度。再从货币供应来看，代表货币供应总量的广义货币M2上半年增长幅度达28.2%，既超过经济增长率，也超过计划控制指标（25%）3.2个百分点。这表明货币供应总量仍然偏

高。

总之，从总体看，当前资金供应总量并不少。为何呼紧之声不绝于耳？其原因在于资金不合理地占用和使用效率低下。(1) 被挪用于固定资产投资；(2) 产成品库存积压占用增多；(3) 企业间拖欠债款幅度增加；(4) 弥补企业亏损占用；(5) 贷款漏损严重。由于企业经营效益低，企业得到贷款后，真正用于投入生产的资金相对减少，转向利高的定期存款，挪用于非生产性投机，将贷款违法高息拆出，或大量投入股市和期货交易，冲击金融市场，等等；(6) 增加固定资产投资的贷款，在目前我国工业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迟滞的情况下，往往只能刺激进口设备，不能刺激国内生产。

由此可见，现在的问题，并不在于资金供应不足，而在于银行发放大量的钱，被不合理地占用和低效率地使用。不着眼于这些问题的解决，资金供应再放松多少也不行，只能助长结构和效率的进一步恶化，并导致经济再度过热膨胀。

总之，当务之急，主要不在总量扩张，而在结构调整，包括产品结构，产业结构和企业结构的调整。所以，当前仍有必要继续适度从紧，控制贷款规模，在此前提下，通过微调手段，着重调整资金配置结构，加快资金周转，提高资金效益。今年计划安排国家银行贷款规模 6 500 亿元，根据上半年经济和金融营运情况，下半年还将追加国家银行贷款，用于支持国内外有市场的，接近投产的重点建设项目，支持有市场(能扩大最终消费的)和有效益的生产需要。这是在继续适度从紧前提下有利于调整结构提高效益的微调，不能把它看成是宏观调控方向的改变。

第三个问题是物价问题，我想着重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今年上半年宏观调控进一步取得的成效，最明显地表现在市场物价上涨幅度继续回落上，在从1994年上涨21.7%降到1995年上涨14.8%的基础上，今年上半年又降到上涨7.1%，前7个月平均降到上涨6.9%。从去年11月起已连续九个月物价上涨率在一位数上运行，并且，上半年物价上涨率还落到经济增长率(9.8%)以下。这样，前些时我国经济学界部分人士和"九五规划"文件中一再提出的"首先要把物价上涨率降到经济增长率以下"的目标，刚一提出就提前实现了。在讨论"九五规划"时，我曾经指出：以前者低于后者作为优先争取的目标，这种提法有许多缺点。理论上的道理这里不去多说了。从实际来看，物价上涨率低于经济增长率这种关系反映的经济状况，有好有坏，不很确定。例如"八五"期间，年经济增长率为12%，年物价上涨率为11.4%；虽然"八五"期间物价上涨率低于经济增长率，但物价情况很不理想，这种关系掩盖了"八五"时期是建国以来物价上涨幅度最高的时期，也掩盖了有两年(1994～1995年)物价上涨率高于经济增长率的不正常情况。这是就一段时间"八五"来说的。再举一个个别年份的例子。1993年经济增长率为13.5%，物价上涨率为13.2%，低于经济增长率。照坚持这一提法的理解，1993年应该是很不错的了。但大家知道，1993年是经济过热，经济秩序混乱达到顶峰的一年，那年我们不得不采取加强宏观调控，整顿经济秩序措施。今年我们很快达到了原定"九五"

期间的物价调控的一个目标，一下子就实现了物价上涨率降到经济增长率以下的要求。但是今年经济运行情况正好与1993年相反，宏观经济形势是1993年以来相对最好的一年。所以，物价上涨率低于经济增长率本身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我们不能满足于这样的提法，不能满足于达到这样的关系。姑且不说现在已经达到的6%～7%的物价涨幅，虽然比过去百分之十几、二十几的物价涨幅低了不少，但它只是抑制通货膨胀的阶段性成果，它本身还是通货膨胀的产物，6%～7%上涨率的水平也不算低；而且，这一阶段性成果主要是依靠行政手段、财政补贴、金融抑制等一些办法来达到的，基础并不牢固。目前，需求拉动的潜在压力仍然不小；由前几年需求拉动起来的最近的成本推动的潜在压力仍在积累；货币供应总量M2在去年增长29.5%的基础上，今年上半年又比去年同期增长28.5%；农业基础仍然脆弱；工业企业效益不佳等一系列因素，都会对物价走势产生不利影响。所以，抑制通货膨胀作为"九五"期间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这一方针，我认为丝毫也不能放松。但是，如果我们满足于上半年物价涨幅趋缓的局势，满足于物价上涨率已经低于经济增长率，我们就有可能向放弃抑制通货膨胀的主张让步。最近以来，以"适度通胀"来缓解失业，刺激增长的论点再度抬头，"用足10%的物价调控目标"的舆论反复出现，都是这种主张的体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在获得高速增长的同时，反复面临通货膨胀的困扰。在这种背景下，通货膨胀与失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引起人们的关注。在各种见解中，一部分人士主张对通货膨胀采取宽容态度，主张用较高的通货膨胀率来换取较低的失业率和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所谓"两位数的通胀

不可怕，两位数的增长才过瘾”的说法，就是这么出来的。这种用通货膨胀去刺激经济增长，替换失业的观点，不仅理论界有人提倡，而且地方、部门、企业都有一些人响应。

其实，经济学者特别是接触过西方经济学的都知道，所谓通货膨胀与失业替换论是从哪里来的？这种主张的理论依据是所谓失业与通胀存在负相关关系的菲利普曲线理论。但是这个理论后来对西方经济出现的滞胀即停滞膨胀的现象不能解释，对解决问题无能为力。理论和实践都表明：用通货膨胀来扩张总需求，至多只会在短时期内提高经济增长率，降低失业率，但这要付出很高的代价。用通胀替换失业的结果，只能是使通胀越来越严重，使经济关系越来越扭曲，最终反过来在治理高通胀时将会带来更加严重的失业。所以，通货膨胀不会提高长期平均的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决定长期平均增长率的是人力资本的投资与效益，是科技进步的速度。通胀替换失业的理论就是在西方，也存在很大分歧，用它来影响我国的宏观经济决策，是很成问题的。

主张对通货膨胀采取容忍态度的人士还有一个退一步的说法，说通货膨胀虽然有害，但由于它们对所有的人造成的损害是相同的，因此人们虽然会发牢骚，但不会有人闹事。失业则不同，它会造成社会不安全。“两害相权取其轻”，用通货膨胀来替换失业是值得的。我个人认为，所谓“通货膨胀对所有人造成的损害是相同的”，这句话是绝对错误的。凡有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通货膨胀是最坏的再分配，是最坏的税收，它只对少数富者、有办法取得贷款者、投机倒把者、混水摸鱼者有利，而对广大工薪阶层和其他固定收入者不利。我曾经在不只一个场合讲过，为什么每一次关于通货膨胀问题出来，

尽管遭到多数人的反对，但主张对通货膨胀宽容的总是大有人在，这种观点总是要顽强地表现出来，为什么呢？我想这里既有理论认识问题，如前面讲的套用西方某种理论来解释中国现象；但确实也有利益问题，就是说，通货膨胀对某些社会集团和成员确实有利，他们是很赞成维持甚至加剧通货膨胀的局面的。对此我们必须头脑清醒。

当然，解决失业问题不是不重要，但是靠放松银根是不能解决当前中国的失业问题的。在目前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格局下，只有“大水漫灌”方式放松银根，才能使所有经营不下去的国有企业能够发放工资和各种补贴；或者继续用外延铺摊子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办法来扩大生产规模，也不是不可能增加一些就业。但是这种不通过改革、改造和改组，实行两个根本性转变来搞活国有经济，而是用放松银根的办法，对搞不下去的企业进行变相补贴，只能暂时缓解一些失业，是不可能持久的。况且，这种办法只适用于城市工商业，对于广大农村需要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的大量剩余劳动力，是没有用处的。而这恰恰是中国就业问题最重头的一块，中国失业人口最广泛的发源地。农村失业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说到底也还是在于城市工商业等非农产业效率低，既无力为城镇待业人员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又不能吸收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解决中国失业问题要从提高企业效率和在结构调整中适当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才能从根本上找到出路。全面放松银根，不但对解决失业问题无济于事，而且推动通货膨胀和物价猛涨，只能使城乡失业者的处境更加困难。

鉴于今年上半年物价形势继续好转，今年开年以来物价涨幅月同比指数和半年同比指数都落到一位数以内，而且大

大低于10%，也就是大大低于今年计划控制目标；并且，物价上涨率还超前实现了低于经济增长率的期望，因此，一些地方提出要用足今年物价调控目标10%的意见。现在，7月份物价上涨率已降到5.8%，1～7月平均物价上涨率已降到6.9%，这与10%的今年物价调控目标的差距不小，如何用足呢？办法是扩大投资需求，放松信贷控制，换句话说，就是把适度从紧的宏调方针转变为扩张性从松方针；再就是多出台一些上调物价的项目。这个意见是不可取的。按照目前的经济形势，如果今后几个月农业不发生特大问题，调价没有特大的动作，物价涨幅可能在微降微升中保持相对平稳的水平。但是如果我们硬要人为地用足10%的调控目标，把物价上涨率由目前的6.9%拉上去，以填足全年上涨10%的差距，那么，今年剩余几个月的物价平均上涨率将达13%～14%以上；如果分解到月份逐月上拉，那么到12月份月同比物价上涨幅度将再度向20%迈步。这样，不但要毁掉几年来辛辛苦苦抑制通胀的成果，而且还会给明年（1997年）留下相当大的翘尾巴因素，大大增加明、后年调控物价的难度，使国民经济重新面临恶劣的物价环境，从而影响整个"九五"期间的经济运行，有可能再次陷入要不断灭火（通货膨胀之火）的困境。所以，用足今年计划调价目标的意见，实在是不可取的。

事后来看，今年计划的物价涨幅调控目标是否订得过松，以致实际执行结果大大低于预期，这有点类似1990年的情况。在1988、1989两年物价大幅上涨（18.5%，17.8%）之后，人们预期1990年物价涨幅不会低于10%，但实际这一年物价只上涨了2.1%，这里面的经验，机理，需要研究，总结。当然，由于这次调控比较适度，今年物价涨幅不致像1990年那

样暴跌。但只要不去"用足",也不发生意外,今年物价涨幅将相当程度地低于计划调控目标并低于经济增长率,看来问题应该不大。因此,我们不能满足于把物价上涨幅度控制在10%以内或者今年预计的经济增长率9%以内,就算万事大吉了,更不可以人为地"用足"计划调控指标,而应在抑制通货膨胀已经获得成果的基础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继续努力降低物价上涨幅度,为明年和整个"九五"期间的物价调控打下更坚实的基础,为实现"九五"规划创造一个有利的宏观经济环境。当然,也应当抓紧物价形势好转的机会,适当进行一些结构性的物价调整,这是我一贯的主张,但要注意避免物价涨幅的再次大幅度上扬。这种结构性的物价调整,如果做得适时适度,对于改善整个宏观经济环境也是必要的,有利的。

上面,我们从供求关系、资金供应、物价走势等角度,分析了当前广泛流行要改变现行宏观调控政策方向的意见,就是由适度从紧转向扩张性从松政策的意见。我以为这是当前宏观调控工作中极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中共五中全会和人大八届四次会议关于"九五"规划的《建议》和《纲要》中,刚刚提出了在整个"九五"期间,都要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并实行适度从紧的政策,是不是因为今年上半年宏观形势继续好转,就要改变政策方向?就我个人的感觉来说,似乎经济界和经济理论界的多数人士并不赞成这种意见,我认为中央决策者也不会同意这种意见。这是因为,当前我国经济的主要症结,在于结构不合理、效益低下、运行质量不好,这些问题也制约着总量平衡问题,但是这些问题不是靠放松银根就能解决的。根本出路还在于中央提出的两个根本性转变,即:在经济体制上,从原来的计划经济,现在的双轨

体制，进一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在增长方式上，从重数量、重速度的外延粗放为主的增长方式向重质量、重效益的内涵、集约为主的增长方式转变。当然，由于中国经济中存在的制约质量、效益、结构的深层次积弊，不是一日之寒，所以，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亦不可能是朝夕之功，需要较长时期的努力，并需要一个比较稳定、宽松、良好的宏观环境。如果国民经济反复发热发烧，波动起伏很大，那就不可能顺利实现和完成两个转变。经过几年来实行比较正确的政策和上上下下的努力，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确实大为改善，但还很不牢固，需要我们继续采取适度从紧的政策，为两个根本性转变创造一个比较良好的宏观环境。在坚持适度从紧的原则下，根据经济周期运行的具体态势，审时度势地进行微调，该紧的继续紧，该松的，可以有重点地、结构性地、适度地和逐步地有所放松。所谓该紧的继续紧是指：对于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的控制，对于新开工项目的控制，对于贷款总规模和货币供应总量的控制，对于财政赤字和债务的控制，对于物价上涨幅度的控制等等，还是要从紧。所谓有重点地放松是指：对于经济效益好，产品有市场的产业、企业，应该给予资金支持，以促进有效供给的增加。所谓结构性地放松是指：对于农业、基础设施以及基础产业中的瓶颈部门，对于国家重点投资项目，要给予一定的倾斜政策，保证资金到位，以保证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所谓适度地放松是指：在方向和力度的把握上，要加以控制，避免激化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的强烈反弹。所谓逐步地放松是指：在时间的操作上，要随着周期波动态势的转移而有步骤地进行。只要我们把握好宏观调控政策，我们就能为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提供一个比较稳定良好的经济

环境，加快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的经济体制的转变和以技术进步为中心的增长方式的转变，使我国经济以更加健康的体质迎接21世纪的挑战。

# 17　当前我国经济形势的特点与问题*

（1996年10月）

自1990年召开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会以来，今天的会议是每年召开春、秋季会的第13次座谈会了。利用这个机会，我想就当前经济形势谈谈个人的一点看法。仅供大家参考。我想简要地谈两个问题：一、1996年经济形势的两个突出特点和一个突出问题；二、适度从紧的基本方针和抑制通货膨胀的首要任务是否需要改变。

## 一、1996年经济形势的两个突出特点和一个突出问题

1996年的经济形势有两个突出的特点，这就是：经济增长率和物价涨幅继续双回落。

**从经济增长率的情况来看，自1993年年中开始实行加强宏观调控和适度从紧的方针以来，我国的经济运行由“过热”**

---

* 本文系作者1996年10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1996年秋季座谈会上的开幕词。发表于《环球市场》1996年第11期，《市场经济导报》1997年第1期等处。

**和秩序混乱的状态，逐步走向平稳，并在平稳的回落中，保持了适度的、较高的增长速度。**以 GDP 增长率看，1993 年与 1992 年相比，平稳回落了 0.7 个百分点；1994 年与 1993 年相比，平稳回落了 0.9 个百分点；1995 年与 1994 年相比，平稳回落了 2.1 个百分点；1996 年上半年，GDP 增长率为 9.8%，继续呈回落之势，如果全年为 10%左右的话，那么与 1995 年的 10.5%相比，又将平稳回落 0.5 个百分点左右。这样，4 年来，共平稳回落了 4 个百分点左右。这是建国以来历次经济周期波动中，经济增长率回落的振幅最小的一次。可以说，自 1993 年年中以来的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取得了重大成绩。这表明，我们党和政府驾驭经济发展的能力有了增强。加强宏观调控，抑制通货膨胀，实行适度从紧方针，并没有以牺牲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为代价，相反，还促进了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健康地发展。

**再从物价涨幅的情况来看，随着经济增长率的回落，物价涨幅滞后地明显回落。**以全国商品零售价格上涨率看，1995 年与 1994 年相比，回落了 6.9 个百分点；1996 年 1～8 月与上年同期比，物价涨幅为 6.8%，如果全年为 7%左右，那么与 1995 年相比，又将回落 7.8 个百分点左右。两年中共回落 14.7 个百分点。这是一个显著的成绩。

上述两个特点，说明我国当前宏观经济运行基本正常。有人说，是 1993 年以来最好的一年。相对来说，也不为过。但是，对宏观经济形势不可盲目乐观。一些国民经济综合性指标，如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经济效率、经济效益、失业率、收入分配等情况，都不太好；财政、金融、外贸等情况，也存在一些问题，潜伏着一些隐患；物价涨幅的回落，在相当程度上是

用行政手段、用财政补贴、用金融抑制来限价压价的结果，不很牢靠。总之，经济总量关系很难说已经协调。这些都内在地、严重地制约着经济的持续与健康发展。

除了这些宏观总量问题之外，最为突出的一个问题是，在以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为主的微观方面所存在的问题。相当一部分工业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不太好，特别是部分国有企业面临很多困难。据对全国38万户乡级以上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统计，1996年上半年，实现利润总额比上年同期下降了36.3%；企业亏损额比上年同期上升了50.5%。企业占压资金多，使用效率差，相互间拖欠继续增加，也增大了银行的金融风险。停产半停产企业和下岗待业人员增多，再加上一部分收入偏低的离退休人员、其他城镇优抚救济对象，以及城镇流动人口，他们的生活都比较困难。由此引发一些社会不安定问题比过去增多，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 二、适度从紧的基本方针和抑制通货膨胀的首要任务是否需要改变

目前，有关“回升”的议论越来越多。1997年经济增长率的实际运行结果有可能比1996年略有一点上升。问题不在于是不是可以回升，而在于怎样回升，以及对回升力度的把握。有的同志提出主张，当前是总需求严重不足，因此要求改变适度从紧的基本方针和政策，转而采取全面放松银根的政策；要求不再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转而把解决失业和刺激经济增长作为首要任务。我的看法是：当前并不是出现了总需求严重不足的问题，而是需要改善与提

高供给面的问题。因此，适度从紧的基本方针和抑制通货膨胀的首要任务不应改变。在此前提下，宏观调控的着力点应该是：一、改善与提高供给面，这包括：调整供给结构（如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企业结构等），提高供给质量，降低供给成本，提高供给效率；二、防止出现盲目的"强回升"与"强扩张"，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熨平经济的周期波动，实现经济的持续与稳定增长。之所以这样认识，是因为：

**第一，从投资需求看。**

1996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幅虽然继续回落，但这是在前些年投资增长过猛基础上的回落。上半年，投资增加幅度达到18.6%，扣除物价因素也有12%左右，比上半年GDP增长率9.8%高出2.2个百分点。可以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比较适度，保持了对经济增长的适当拉力，不能说投资严重不足。

从今后一段时间看，投资扩张的冲力仍很大。光是"八五"时期结存到"九五"时期的国家计划内在建大中型项目的规模就不小，加上计划外和非国有投资的在建项目，建设摊子就已经过大。同时，各种工程项目普遍大幅度地超预算，不少在建工程资金缺口很大，要消化这些缺口至少还需要两三年时间。建设摊子大、资金缺口大。所以，对投资需求绝不是需要进一步去刺激扩张的问题，而是要继续防止扩张过度而失控的问题。

**第二，从消费需求看。**

1996年上半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同期增长21.2%，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13.2%，大大高于9.8%的GDP增长速度。

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和消费品市场发展趋势看，今后一段时间也不存在消费需求不足问题。但是，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档次的提高，消费结构的变化，消费需求的多样化、个性化和高质量化，如果供给结构和供给质量不能适应，不仅会影响结构平衡，而且将可能影响总量平衡。

**第三，从国外需求看。**

1996年上半年，进出口贸易顺差由上年同期的131.7亿美元，降为8.8亿美元，减少了120多亿美元。从这一点来看，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力确实大大减弱。这主要与国家下调出口退税率和出口退税滞缓等政策因素有关。近来，随着企业逐步适应税收政策的调整以及出口退税的加快，出口在逐月增加。上半年已实现扭逆为顺。另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1996年全球经济增长4%，国际贸易总量增长7%。所以，国际市场也不存在需求不足的问题。关键在于，我国的产品是否具有高质量，是否具有竞争力，是否能够打得出去。

**第四，从资金供应看。**

我国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已经三年了，但是，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的好转，从1995年第四季度起，在总体上继续适度从紧的前提下，以微调方法开始放松调控力度。1996年上半年，在总体从紧下，更加大了对有市场、有效益的生产企业与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支持力度。1～6月，新增贷款比上年同期增长36%，其中国家银行新增贷款比上年同期多增1007亿元，增幅达62.5%；同时，广义货币M2比上年同期增长28.2%。这表明，货币供应总量仍然偏高。但为何呼紧之声不断？其原因在于，资金被不合理地占用，以及资金使用效率低下。不着眼于这些问题的解决，资金供应再放松多

少也不行。

**第五，从经济波动与物价波动的态势看。**

1996年GDP增长率预计为10%左右。从如此高的基点上回升，经济增长率上升的回旋余地很小，稍有不慎，就会冲向"过热"局面。过去，在我国的经济周期波动中，急升急降的情况很多。今后，应向缓升缓降发展，缩小经济波动的振幅，保持持续、稳定增长的态势。

1996年物价涨幅有望降至7%左右。由于遗留给1997年的翘尾巴因素不太大，如果经济增长保持平稳，1997年物价涨幅亦好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但如果经济回升过猛，1997年，乃至1998年，物价涨幅又会强烈地反弹上去，这是需要努力避免的。

**第六，从重大政治事件的影响看。**

过去，我国经济的运行总是在大起大落中进行，这其中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重大政治事件的影响。1997年，我们党将召开十五大，我国将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这两件重大政治事件，应成为进一步改善宏观调控的契机与动力，而不能成为推动经济盲目扩张的冲力。香港工商界的大多数人士，都希望大陆出现经济稳定、物价稳定的局面，而并不希望出现"大起大落"和"泡沫经济"那样的剧烈波动的局面。

**第七，从实现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这两个根本转变，以及解决企业的根本困难看。**

目前企业所遇到的困难，从根本上说，并不是总需求不足，而是企业改革的迟步缓进，不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特别是不适应加强与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的要求，不适应市场变化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这是长期积累下来的

深层次矛盾在经济增长率波动的收缩期的进一步突出反映。这不能靠放松银根来根本解决。根本的解决办法是推进和加快企业改革的步伐。

总之，当前的主要问题不在于推动总需求的扩张和推动经济总量的扩张，而在于改善与提高供给面，包括调整供给结构（如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企业结构等），提高供给质量，降低供给成本，提高供给效率。在继续执行适度从紧的基本方针和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首要目标的前提下，以改善和提高供给面来对1997年的经济走势进行导向，这完全符合实现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这两个根本转变的要求，符合迎接党的十五大召开和迎接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要求，符合国内外两个大市场的要求。

# 18　论“软着陆”*

## （1997 年 1 月 7 日）

### 什么是“软着陆”

1993 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实施了以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宏观调控。到现在，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宏观调控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目标，国民经济的运行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

什么是“软着陆”呢？“软着陆”是对经济运行状态的一种形象性比喻，即好比飞机经过一段飞行之后，平稳地降落到陆地上。“软着陆”的经济含义则是：国民经济的运行经过一段过度扩张之后，平稳地回落到适度增长区间。所谓“适度增长区间”是指：在一定时期内，由社会的物力、财力、人力即综合国力所能支撑的潜在的经济增长幅度。国民经济的运行是一

---

* 与刘树成合作。1997 年 1 月 7 日《人民日报》在发表此文时，特地加了予以高度评价的编者按：1993 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实施了以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宏观调控。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到 1996 年底，宏观调控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目标，国民经济的运行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到底什么是“软着陆”，为什么要“软着陆”，怎么样“软着陆”，“软着陆”提供了哪些宝贵的启示，《论“软着陆”》一文深刻而通俗地回答了这些问题。这是迄今为止总结宏观调控经验的一篇最好的文章，值得认真一读。

个动态的过程，各年度间经济增长率的运动轨迹不是一条直线，而是围绕潜在增长能力上下波动、形成扩张与回落相交替的一条曲线。国民经济的扩张，在部门之间、地区之间、企业之间具有连锁扩散效应，在投资与生产之间具有累积放大效应。当国民经济的运行经过一段过度扩张之后，超出了其潜在增长能力，打破了正常的均衡，于是经济增长率将回落。"软着陆"即是一种回落方式。

"软着陆"是相对于"硬着陆"而言的，即"大起大落"方式。"大起大落"由过度的"大起"而造成。国民经济的过度扩张，导致极大地超越了其潜在增长能力，严重地破坏了经济生活中的各种均衡关系，于是用"急刹车"的办法进行"全面紧缩"，最终导致经济增长率的大幅度降落。

成功的"软着陆"是相对于不成功的"软着陆"而言的。当国民经济过度扩张之后，为了避免"硬着陆"带来的损失，曾试图用"软着陆"的办法使经济降温，但经济增长率的回落尚未在适度区间落稳，在各种压力下，就重新快速起飞，最终还要导致"硬着陆"。

这次"软着陆"，是一次成功的"软着陆"。之所以说"成功"，是因为：经济增长率逐步平稳地回落到适度区间，物价上涨率亦回落到适度水平；在显著地降低物价涨幅的同时，又保持了经济的适度快速增长。经济增长率的适度区间和物价上涨率的适度水平，在不同的具体经济背景下，可以有不同的数量标准。从我国当前的国情出发，经济增长率实际运行的适度区间（不是指计划目标）可把握在 8% ~ 10% 之间，物价上涨率的适度水平可把握在 6% 以下。1993 年下半年以来所实施的宏观调控，使经济增长率由 1992 年峰顶时的 14.2%，

一年年逐步平稳地回落到1996年的10%左右，每年平均回落约1个百分点；物价上涨率（商品零售价格）由1994年的21.7%，回落到1996年的6.5%左右，共回落了15.2个百分点（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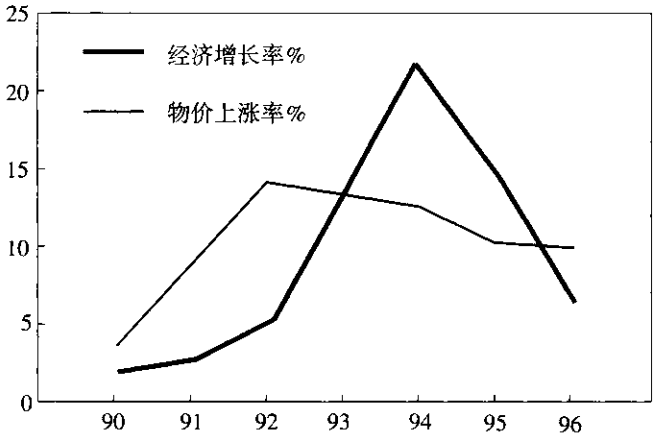


**图1　1990～1996年经济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率波动曲线**

这次"软着陆"的成功有重大意义。首先，避免了重蹈历史上"大起大落"和"软着陆"不成功的覆辙，在我国建国以来的经济发展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它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逐步在深化，领导和驾驭经济工作的水平提高了。其次，为我国今后的经济运行开辟了一条适度快速和相对平稳发展的新轨道，为我国经济的跨世纪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奠定了良好的开端。三者，既大幅度地降低物价涨幅又保持了经济的较快增长，这在二次大战后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史上也是罕见的。

与西方主要国家经济陷入滞胀困境相比，改革开放的中国充分显示出其增长的活力。

我们要充分认识这次“软着陆”的意义，但是，也绝不可盲目乐观，掉以轻心。目前，经济增长率虽已回落到适度区间，但是处于适度区间的上限边缘；物价上涨率虽已回落到适度水平，但也处于适度水平的上限位置。因此，仍要谨防经济增长率和物价上涨率的强烈反弹。

## 为什么要“软着陆”

“硬着陆”是有害的。“硬着陆”或“大起大落”的诱因在于盲目地求快。过度地扩张会导致资源的极度紧张、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结构的扭曲、经济效益的低下、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的混乱、人民生活的不安定。建国以来，屡屡出现“大起大落”的情况，每次都带来不小的损失。其中，以 1958～1962 年的波动最为典型。在这次“大起大落”中，经济增长率的峰顶是 1958 年，为 22%；在其后 1960～1962 年连续三年的负增长中，经济增长率的谷底是 1961 年，为 -29.7%。经济增长率的峰顶与谷底之间的落差为 51.7 个百分点（见表 1）。这次“大起”导致随后国民收入绝对量的下降，直至 1964 年才恢复到 1957 年的水平，使国民经济的发展延误了 7 年。这次“大起大落”，总的算下账来，国民收入的净损失是 1780 亿元（以 1957 年为基年，以 1952 年不变价格和“一五”时期的平均增长率计算），相当于 1957 年全年国民收入的 2 倍。这深刻表明：欲速则不达，欲快反而慢。

**表 1　中国经济增长率波动的峰谷落差**

| 历次波动（起止年份） | 峰谷落差（百分点） |
|---|---|
| 1. 1953～1957 | 9.6* |
| 2. 1958～1962 | 51.7* |
| 3. 1963～1968 | 24.2* |
| 4. 1969～1972 | 20.4* |
| 5. 1973～1976 | 11.0* |
| 6. 1977～1981 | 6.5 |
| 7. 1982～1986 | 6.4 |
| 8. 1987～1990 | 7.8 |
| 9. 1991～1996 | 4.2 |

注：带* 者为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峰谷落差，不带* 者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峰谷落差。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1993》、《中国统计年鉴 1996》各年度经济增长率数据计算。

不成功的“软着陆”也是有害的。比如，1986 年就是一次不成功的“软着陆”。当时，在经过 1982～1985 年连续的快速增长后，已采取一定的“软着陆”措施来进行适当的调整。但是，调整尚未完成，1987～1988 年又进入了新的快速扩张，导致 1989～1991 年的三年大调整。1987～1990 年的一上一下波动，经济增长率的峰谷落差为 7.8 个百分点，虽低于改革开放前的历次波动，但也为改革开放以来回落幅度最大的一次波动（见表 1）。1986 年的“软着陆”之所以不成功，原因还在于想快。当经济增长率刚一回落，企业遇到一些困难，就顶不住惊呼“滑坡”、要求放松的压力，又放弃了“软着陆”。重新起飞的结果是，又不得不再次扑救通货膨胀之火，再次进行大调

整。

“硬着陆”有害，“软着陆”不成功亦有害，因此，遇到经济过度扩张，必须要“软着陆”，并且要成功。在1991年到1993年上半年，伴随着快速增长，国民经济的运行超越了其潜在增长能力，打破了各种经济均衡关系，突出地表现为经济生活中出现了“四热、四高、四紧、一乱”的问题。“四热”是：房地产热、开发区热、集资热、股票热。“四高”是：高投资膨胀、高工业增长、高货币发行和信贷投放、高物价上涨。“四紧”是：交通运输紧张、能源紧张、重要原材料紧张、资金紧张。“一乱”是：经济秩序混乱，特别是金融秩序混乱。如不及时采取措施，任这些问题发展下去，必将再度导致“大起大落”。在这种情况下，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正确、积极贯彻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果断决策，推出一系列加强宏观调控的措施，国民经济的运行开始了“软着陆”。在“软着陆”的过程中，排除了种种干扰，经过三年多坚定不移的努力，终于取得了成功。1991～1996年，经济增长率的峰谷落差约为4.2个百分点，成为建国以来回落幅度最小的一次波动(见表1)。

## 怎么样“软着陆”

**首先，及时削峰。**以往的“大起大落”，要害在于“大起”。过去，在经济的快速扩张中，经常是直到实在难以为继时方才被迫调整。因此，及时地削峰是成功地实现“软着陆”的关键和先导。1993年6月出台的宏观调控措施，决策果断，时机成熟，方向正确，有效地控制住了扩张的强度与峰位，从而取

得了“软着陆”的主动权。

**第二，适度从紧。**所谓适度从紧，不是全面紧缩，而是指：一、在总量上，首先要从紧控制货币与信贷总规模、财政支出总规模、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严格把住货币关和财政预算关，以有效地抑制通货膨胀；在此前提下，还要保证经济的适度增长。二、在结构上，有紧有松。该紧的紧，该松的适度地松。对于低水平重复建设部分、对于单纯外延型扩张和低效益甚至无效益的部分、对于“泡沫经济”部分，一定要从紧；而对于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对于有利于调整和优化结构，加强农业、交通通讯、能源以及重要原材料等“瓶颈”部门的发展，增强有效供给的部分，对于有效益、有市场、有利于培育和扶持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内涵型发展的部分，则给予支持。适度从紧，把握调控力度，是成功地实现“软着陆”的重要政策保证。

**第三，适时微调。**为了“软着陆”的成功，在适度从紧的总原则下，根据各年度内经济运行的具体状况，审时度势地进行微调和预调，以缓解“降温”中的实际困难，防止出现过度滑坡。比如，适时调整信贷结构，增加对农业的贷款，保证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收购需要，增加对效益好、销路好的企业的流动资金贷款，保持生产与市场的活力。再比如，适时停办保值储蓄，适时降低利率。1996年，两次调低利率，使企业每年可减少利息负担1000多亿元，有利于缓解企业的困难。

**第四，抓住主线。**在加强宏观调控中，自始至终紧紧地抓住了“软着陆”的主线：**治理通货膨胀和在“降温”中保持经济的相对快速增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的变动是经济运行状况的晴雨表。经济过度扩张、超越潜在增长能力，其后果

会集中表现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在这种情况下，要治理通货膨胀，就需要相应地降低和控制经济增长率。宏观调控是以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还是以继续加快经济增长、扩大就业为先，曾一度成为经济学界争论的焦点。实践表明，由于党中央、国务院明确地提出和坚持了以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采取了综合治理的种种措施，同时，又很好地把握了宏观调控的力度，所以，能够在"软着陆"中，既有效地抑制了通货膨胀，又保持了经济的适度快速增长。

## "软着陆"的宝贵启示

这次"软着陆"的成功，给予我们许多新的启示，重要的有以下几点：

**其一，在整个体制转轨完成之前，都要坚持"总量平衡、适度从紧、适时微调"的方针。**这一方针并不等于短期性的紧缩政策，而是针对传统体制内在的"软约束"、"超分配"的膨胀机制和强烈的扩张冲动所应采取的一项具有中长期战略意义的发展政策，是彻底摆脱传统的"大起大落"、使国民经济走上适度快速和相对平稳发展轨道的一个充分、必要条件。所以，我们认为，这一方针不仅适用于1993年下半年以来的"软着陆"过程，也不仅适用于1997年和整个"九五"时期，而是直到21世纪初期，在新的有效制约机制尚未形成之前，都是适用的。只有坚持这一方针，才能使宏观经济政策既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又具有必要的灵活性，总的做到稳中求进。

**其二，无论是从我国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出发，还是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教训出发，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应该始**

**终坚持以抑制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与此同时，保持经济的适度快速增长。**在严重的通货膨胀下，无论是改革还是发展，无论是总量平衡还是结构调整，什么都谈不上。即使经济一时起飞，又要马上扑灭通货膨胀之火。我们已几经“起火”又“灭火”的情况。反复受到通货膨胀威胁、反复“灭火”的局面不宜再度重演。当然，在机制转轨时期，要为合理的、适度的价格结构调整留出必要的空间。由价格结构调整所带来的物价上涨，与一般意义上的通货膨胀不是同一个概念。我们要努力消除超发货币和“超分配”所引发的通货膨胀，同时留出价格结构调整的空间，但这个调整也要逐年进行，而不可能一步完成。目前，物价涨幅6%的水平并不算低，还应进一步控制。经过努力，逐步使价格形成机制和价格水平走向正常。由此，我们不能满足于“使物价上涨率低于经济增长率”这一目标。因为在“低于经济增长率”的范围内，可以容纳不同的物价水平。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率在10%左右；到21世纪初，也可能保持在7%～8%左右。那么，“低于经济增长率”的物价涨幅在6%～9%之间是否就是可接受的呢？显然这仍是较高的物价涨幅。针对近几年我国物价涨幅高于经济增长率的实际情况，强调首先要把物价涨幅降到经济增长率以下，这是可以接受的近期要求。现在，这一要求已经实现，需要为控制通货膨胀的任务提出更为积极的目标。因此，党中央、国务院又及时提出1997年的物价涨幅要控制在1996年的实际水平(6%)以下的目标。

**其三，一方面，在整个机制转轨完成之前，都要坚持“总量平衡、适度从紧、适时微调”的方针；另一方面，要抓住稳定、宽松的经济环境，积极推进“两个根本转变”。**在这次“软着陆”

中，一些国有企业处境困难，这并非根源于宏观调控，而是根源于旧体制。在市场经济下，当经济增长率处于回落阶段时，在经济关系的调整中，企业的优胜劣汰本是题中之义。然而，我国目前还缺乏应有的淘汰机制。在这种情况下，大水漫灌式地放松银根不仅与事无补，反而会贻误国有企业的改革进程。以往，我国经济增长一再出现“大起大落”，其根源亦在于原有体制。抓紧实现“两个根本转变”，是医治大起大落、抑制通货膨胀、搞好总量平衡和结构调整的治本之路。

# 19　关于就业问题及其他*

## （1997 年 4 月 25 日）

### 一、关于就业问题

最近以来，随着我国经济运行“软着陆”的成功，特别是物价涨幅的明显回落，就业问题突出起来，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个热点。这一问题，关系到维护社会安定，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并积极妥善地去解决。在这种背景下，有人提出：宏观调控应该把解决失业问题放在首位。还有人从菲利普斯曲线关系出发，要求放松银根，刺激经济增长。类似这种呼声，最近以来又不绝于耳。

这就向我们提出如下问题：首先要弄清，当前在我国，就业问题是怎样产生的？

就业问题，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城镇就业问题，另一部分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城镇就业问题，当前突出的是国有企业的职工下岗失业，有的虽然没有完全下岗，但由

---

× 本文系作者 1997 年 4 月 25 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 1997 年春季座谈会上的开幕词摘要。本文原题《当前经济形势的三个问题》，曾发表于《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7 年第 6 期；《宏观经济管理》1997 年第 6 期；《价格理论与实践》1997 年第 7 期；《中国改革报》，《中华工商时报》，《经济参考报》等处。

于开工不足而处于不充分就业状态;城镇里还有集体企业、其他企业的职工下岗或不充分就业问题,还有社会上其他人员的就业问题,等等。就业问题的产生,是由多方面的原因引起的:

**第一,总量性原因。**从劳动供给总量看,80年代以来,我国进入了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的高峰期。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明显上升。1953年、1964年第一、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大约为50%;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和1995年抽样调查时,这一比重上升为60%左右。

**第二,结构性原因。**当前,我国正处于结构调整时期,在劳动力的需求结构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总从业人员的比重,1978~1995年平均每年下降1个百分点,这1个百分点,大体上由第二产业吸收0.3个百分点,由第三产业吸收0.7个百分点。产业结构的这种调整,使第一产业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就给第二、三产业的就业、给城镇的就业,产生了很大的压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家电工业、轻工业、纺织业、食品业等行业曾得到迅速发展。这其中,也带来不少重复建设、重复引进、盲目追求"大而全"、"小而全"的问题。在当前的结构调整中,这些行业便出现生产能力相对过剩、市场容量相对缩小,从而经营困难、职工下岗或就业不充分等现象。

另外,在一些老工业基地和在一些老传统行业,如黑色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采选业等,还有军工行业,企业亏损严重,旧体制的包袱也沉重,从而也带来企业经营困难、职工下岗或就业不充分等问题。

**第三，技术性原因。**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进程，我国正处于科技进步、有机构成提高时期。同量产出所吸纳的资本份额呈上升趋势，而所吸纳的劳动份额呈下降趋势。同量投资所创造的就业机会也在减少。这就使劳动需求总量的增长受到一定的限制。

**第四，体制性原因。**我国正处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在原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的是低工资、高就业、国家包分配的劳动就业政策，缺乏就业的竞争机制与淘汰机制。这样，长期以来形成了国有企业人浮于事、大量冗员存在、经济效率低下的状况。随着改革的深化，必然会产生削减冗员的问题。与此同时，在体制转轨中，一些国有企业面对乡镇企业、三资企业等非国有企业的竞争局面，不适应新的市场环境。由此，造成经营困难、亏损严重，影响到职工的就业与收入。

**第五，周期性原因。**在1991～1996年这一轮的经济周期波动中，从1993年下半年到1996年，正处于经济增长率的回落期，或收缩期。正是考虑到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考虑到就业问题，采取了"软着陆"政策，使经济增长仍然保持了较高的速度。但经济增长率毕竟是在缓慢地回落。在经济周期波动的收缩期，劳动需求总量的增长必然要受到限制。

综合以上五个方面的原因，可以看出，当前，我国正处于劳动供给总量增长的高峰期，处于产业结构和行业结构的调整时期，处于技术进步、有机构成提高时期，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近几年又处于经济周期波动的收缩期。这几种"时期"交织在一起，或者说这几种原因交织在一起，使得我国的就业问题突出起来。在以上五个方面的原因中，前四个方面

的原因是主要的，是基本性的、较长期性的；第五个方面的原因，即周期性原因并不排除，但它是短期性的，不是主要原因。

在我国这种特殊的背景下，仅仅着眼于短期的周期性原因，简单地从菲利普斯曲线关系出发，单纯用放松银根、刺激增长的办法，是解决不了当前我国的就业问题的。早期的、简单的菲利普斯曲线只是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诸如劳动供给条件不变、物质资源供给和技术条件不变、产业结构比较稳定、体制条件不变、不存在通货膨胀预期等等情况下，当社会总需求在短期波动时，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比较平缓的替代关系。而当上面假定中的种种条件发生了变化时，菲利普斯曲线将会变形。而我国现在的就业问题，并非只是一个简单的、短期性的社会总需求波动问题。如果我们以失业率为横轴、以通货膨胀率为纵轴，在这个坐标图上画一条菲利普斯曲线的话，那么，这条曲线比起早期的、教科书上的菲利普斯曲线，既陡峭得多，又向右上方推移。这条陡峭的、向右上方推移的曲线所包括的含义是：要想把失业率降到原来的同一个水平，那么就需要付出更高的通货膨胀代价，要求更高的经济增长率。所以，简单地用放松银根、刺激总需求扩张、刺激经济增长的办法，不但不能解决就业问题，反而会使严重的通货膨胀卷土重来。当重新治理卷土重来的严重的通货膨胀时，失业问题也将会变得更加严重。同时，经济增长也不是没有限度的。我国现在的经济增长率已经不低，若经济增长率过度地超越其潜在增长能力时，菲利普斯曲线将随着“瓶颈”制约的一一出现而进一步变形，最终陡峭得成为一条垂直线。这时，再以放松银根去刺激经济，经济增长率也不会再提高，就业也不会再增加，剩下的只是高通胀

了。

我以为，当前我国经济的主要问题，不是速度问题，不是总量问题，而是结构问题、质量问题、效益问题。这要靠积极推进“两个根本性转变”、加大结构调整力度来解决。对于就业问题，要根据不同原因，采取不同的对策，进行综合治理。如实施再就业工程，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发展乡镇企业，发展第三产业，不断地向生产的广度和深度、向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拓宽就业领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通过教育培训改变人们的就业观念，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等等。这才是解决我国就业问题的正确途径。

## 二、关于“发展是硬道理”

大家知道，邓小平同志从“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出发，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这句话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我们应该完整地理解邓小平同志这句话的精神。邓小平同志讲的“发展是硬道理”，是有其制约和限制条件的，这就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的发展；这就是“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但是，这几年，有些同志不顾这些限制条件，片面理解这句话，把它挂在口头上乱用。有的用它来为片面追求产值速度、争项目铺摊子、盲目建设重复建设做旗帜；有的用它来为“先污染后治理”，破坏生态环境作借口；有的用它来掩盖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还有人用它来反对适度从紧的宏观调控政策，实际上在指责这一政策“妨碍”了“发展”，等等。这些观点都是

不负责任的，或者是局部利益驱动的，是不可取的。我认为，应该明确：不顾质量、不讲效益、片面追求产值速度的发展，不是硬道理；盲目重复争项目、铺摊子，搞“大而全”、“小而全”的建设，不是硬道理；破坏环境、破坏子孙后代生存权利的发展，不是硬道理；靠发票子、用通货膨胀的办法来发展，不是硬道理。所有这类观点都不是硬道理，而是歪道理。因为，照这些观点做下去，尽管会有局部的、短期的“正”效应，但就全局和长远来看，必然对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莫大的损害。

最近，又出现一种所谓“自行车”理论。说经济发展像骑自行车一样，如果没有一定的速度，就会倒下来。问题在于，什么是一定的、合理的速度呢？是5%合理，还是10%合理，或是15%、20%合理？有没有一个标准呢？应该说标准是有的。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就是围绕“潜在增长能力线”或处于“适度增长区间”的速度。过度超越适度增长区间，或过度低于适度增长区间，都会“倒下来”。如果我们从我国当前的具体国情出发，以8%～10%作为既较快又相对平稳的适度增长区间，那么，我们现在的增长速度已经不算低了。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正如我前面所讲的，不是速度问题，不是总量问题，而是结构问题、效益问题、质量问题，是实现“两个根本转变”问题。在这个时候，提出“自行车”理论，无非是说，现在的速度不够，太低，车子要倒，应当加速。加到哪里去呢？是不是“两位数的通胀率不可怕，两位数的增长率才过瘾”呢？这将把我国经济带向何处去呢？！

## 三、再谈“使物价上涨率低于经济增长率”的问题

记得去年春季会时，我在这里谈过这个问题。我不大赞成把宏观调控的目标定位于“使物价上涨率低于经济增长率”。那时刚开过人大会，“九五”纲要中有这个提法。鉴于前几年我国物价上涨率大大高于经济增长率，在抑制通货膨胀的过程中强调首先要把物价涨幅降到经济增长率以下，这是可以暂时接受的、第一步的措施，是针对特殊情况而言的。现在，这一要求已经实现，去年全年物价上涨率降到6.1%，低于GDP增长率(9.7%)。在这以后，应当为“适度从紧”的宏观调控提出更为积极的目标。但是一些政策性讲话或文件中，仍然把“使物价上涨率低于经济增长率”说成是“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目标之一，那就需要商榷了。特别是“适度从紧”方针不仅是“九五”的方针，而且适用于中国经济体制转轨完成前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已成为越来越多的人们的共识。在此情况下，再把“物价上涨率低于经济增长率”作为宏观调控长期目标，就很不恰当了。

**“物价上涨率低于经济增长率”这一提法可以容纳高低很不相同的经济增长率和物价上涨率。给宏观调控中通胀指标的伸缩弹性太大，而约束力太小，很容易引起认识上和实践上的混乱。**从实际情况看，比如，以一个时期来说，“八五”时期，每年平均的经济增长率是12%，每年平均的物价上涨率为11.4%，它虽然低于经济增长率，但却是建国以来物价上涨最高的时期，成为当时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大严重问题。再比

如，就一个年份来说，1993 年，经济增长率为 13.5%，物价上涨率是 13.2%，它也低于经济增长率，但这一年是经济增长过热、经济秩序混乱达到顶峰的一年。所以，把这一比率关系作为宏观调控目标，很不理想。**再从理论上说，将物价上涨率简单地与经济增长率相比较、相挂钩，来作为判断物价上涨率是否适度、是否可以被社会所接受的标准，也是不科学的。**按照经济学基本原理，首先应该确定经济增长率是否是适度的经济增长率。在经济增长率过度地超越其潜在增长能力时，物价就会迅速地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物价上涨率还低于经济增长率，也不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标准，不是一种良好的经济运行状态。而物价上涨率能否被社会所承受，有其独立的标准，这是由一定时期内居民收入的增长状况、不同居民间收入分配的差距、居民的心理承受程度、商品生产者成本的承受程度等多种经济、社会因素所综合决定的，而不能简单地与经济增长率相比较、相挂钩。

# 20　略论当前经济形势*

## （1997 年 7 月 17 日）

我国经济去年成功实现“软着陆”后，今年形势究竟如何？是偏冷，还是适中？是总需求不足，还是总供求基本平衡？对经济形势的不同认识，关系到宏观调控政策的选择。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目前经济总的形势“偏冷”，出现“总需求不足”，其结论显然是要实行扩张性政策，刺激经济增长。这种观点，需要商榷。

**这次“软着陆”成功后我国经济的走势，与过去经济周期回落到低谷时的情况不同。**过去经济周期处于低谷时，一般是增长速度很低甚至出现负增长，然后接着是回升转热。这次“软着陆”由于坚持了适度从紧和适时微调的方针，在治理通货膨胀和降温过程中保持了经济的相对快速增长，经济增

---

* 本文系作者 1997 年 7 月 17 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员会讨论上半年经济形势时的发言摘要。1997 年 9 月 26 日《人民日报》在发表此文时加了编者按，指出：成功实现“软着陆”后，有人认为我国总体经济形势“偏冷”，出现“需求不足”，需要“刺激”和“启动”。本文从实际出发，以事实为依据，从不同方面证明上述观点是错误的，不符合客观实际，从而得出如下结论：当前我国经济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不是刺激需求总量、加快增长速度的问题，而是调整和改善结构，提高素质和效益的问题。

长率在缓缓下降中仍然保持了高位。上次经济周期转折时，经济增长率由 1988 年的 11.3%，骤降到 1989 年的 4.1%，1990 年的 3.8%，出现了滑坡，可以说是“偏冷”。这次“软着陆”前后的经济增长率，1995 年是 10.5%，1996 年是 9.7%，1997 年上半年是 9.5%，预计今年全年接近 10%。今年经济增长率高于宏观调控预期的全年目标(8%)，处于我国目前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合理区间(8%～10%左右)，排在世界各国的前茅。这一速度并不低，不能说是“偏冷”。在此高位增速的基础上，不宜提出“加温”、“刺激”之类的口号。

**从需求拉动来看，如果说的是供需总量平衡，那就不能用个别商品的供求状况来衡量。**而要从宏观整体的角度，用构成社会总需求的消费、投资和出口三大最终需求同总供给的增长对比来判断。扣除物价增长因素，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上年同期相比实际增长 12.1%，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长 9.7%。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的实际增幅，都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幅，继续保持了对经济的适度拉动。外贸出口回升，上半年同比增长 26.2%，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也明显增强。总之，三大需求拉力不低，从总体看不能说“需求不足”。

**现在，确实出现了“供给大于需求”的“买方市场”。这是我们过去多年梦寐以求的。**市场取向的改革使人们实现了这个愿望。市场经济是一种竞争性经济，它需要造就一个生产和供给略大于有效需求的买方市场。应当指出，使生产和供给能力略大于直接的需求，这是实现市场竞争和消费者选择权的基本要求，它本身就是供求总量基本平衡的一个构成要素。比起“求大于供”的“短缺经济”或“卖方市场”，更便于进

行调节。在这种买方市场中，竞争性行业生产能力的适度闲置和某些产品的适度过剩，乃是总量平衡中的一种常态，而不是失衡的异态。或者借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种过剩本身并不是什么祸害，而是利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526页）。所以，我们不能“叶公好龙”，当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化之际，一见某些产品和生产能力出现过剩，就惊呼“需求不足”。

**当然，在现实生活中出现的供大于求，并不限于上述“适度”过剩的产品和“适度”闲置的生产能力，也有供给“过度”超过需求。**表现为某些产品库存的“过度”积压和某些生产能力利用率的“过度”下降，从而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但这种现象既与正常的买方市场无关，亦非需求总量不足之过。其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供给结构扭曲，不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在于多年来盲目追求粗放扩张和重复建设，超过了正常需求；在于优胜劣汰机制还不健全，在新的生产能力不断增长的同时，那些本该淘汰、不符合市场需求的生产能力却得不到及时调整。特别是前几年经济过热时，结构不合理的扭曲为需求不合理的扩张所掩盖，在需求扩张的假象拉动下，生产能力迅猛上去了，一旦需求膨胀假象消失，社会总供求回复基本平衡，种种结构性矛盾便会突出地显露出来。有人提出用放松银根扩大投资的办法来刺激需求，实际上现在投资已相当高，全年的投资率预计要达到36%。在目前体制条件下，进一步扩大投资很可能形成新一轮的粗放扩张和重复建设，加剧产品积压和资金占用，进一步扭曲供给结构。

**目前部分企业经营存在困难，是否因为资金紧缺？**部分企业产品积压和生产能力利用率低的困难，如果是由于上述

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原因造成的，那就不是单纯增加资金供应所能解决的。从总体上看，当前社会资金供应并不那么紧缺。第一，今年以来注入经济的贷款和投资增幅并不小，当然不可以也不应当是大水漫灌式地普降甘霖，只能是重点支持有市场有效益有前景的生产和建设项目；第二，随着外贸出口回升，出口结汇增加不少人民币资金；第三，企业直接融资发展加快，上市公司通过发行股票在股市上吸收不少资金；第四，一些实质生产部门的资金转向虚拟资本领域，以及银行资金违规流入股市，在股市上反复折腾（对此国家已采取措施制止），证明资金不那么紧缺；第五，反映现实需求状况的、流动性较高的货币 M0、M1，今年计划调控增幅目标分别为 13.6% 和 18%，上半年实际执行增幅达 19% 和 19.1%，都超过了调控目标。在前几年货币供应过量增加尚未完全消解的基础上，全年上半年货币供应增幅不能算低，它支持了需求的正常增长，满足了经济适度增长的需要。所以，从货币形态上，也反映了社会供求总量的大体平衡。

有些认为目前需求不足的同志，不反对在货币政策上继续适度从紧，但主张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以防止经济趋“冷”。尽管财政状况好转，但到 2000 年基本消除赤字的任务仍然艰巨，目前财政的债务依存度仍然偏高，在此情况下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只能进一步扩大赤字和提高债务依存度，动摇得来不易的财经稳定的局面。

**目前，就业与再就业问题日益突出，成为大好形势下各界极为关注的热点。**就业问题关系到群众生活和社会安定，必须高度重视，并探究原因，予以妥善解决。把目前就业压力增大归之于“需求不足”，是一种过于简单的说法。中国就业压

力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总量上的原因，即劳动人口众多，供给增长迅速；二是结构上的原因，包括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的转移，以及轻、纺工业等传统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就业问题；三是技术性原因，即由于技术进步，同量资本和产出所吸纳的劳动份额减少；四是体制性原因，即传统体制中的人浮于事效率低下，随着改革深入和优胜劣汰竞争机制的形成，必然要解决富余人员的安置和再就业问题；五是周期性原因，即由于遏制经济过热采取的收缩性措施，如为制止房地产热、开发区热而收缩银根，会带来需求和就业的削减。目前的就业压力，前四方面是主要的，基本性的，长期的；第五方面的原因也有，但它是短期的，不是主要的。解决就业问题，必须根据不同的原因，采取不同的对策，进行综合治理。当前，尤其要采取积极措施，依靠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关心和安排好下岗职工的生活，搞好职业培训，拓宽就业门路，推进再就业工程，并完善最低生活保障方面的工作。这决不单纯是“放松银根、刺激需求”所能奏效的。

**物价涨幅回落到较低水平，是好还是不好？** 今年以来，物价涨幅继续下降。1～8月，商品零售价格和居民消费价格同比分别上涨1.4%和3.6%。物价涨幅回落到较低水平，我们说好，因为它是在经济保持快速增长和继续推进价格改革的情况下实现的，是以社会供求总量保持基本平衡和国家调控市场实力增强为基础的。物价涨幅的持续下降，还主要得益于农业连续丰收和粮食、蔬菜等农副产品价格回落，从这一方面看，它又是不稳固的，不能掉以轻心的。但有人认为，现在物价涨幅太低，妨碍了经济增长，甚至有经济增长和物价指数“双低”的说法，提出要实行“适度的”物价上涨，以刺激经济增

长。我认为，对通货膨胀，绝对不能开口子，只能收口子。就是说，必须坚持“抑制”的方针（当然，抑制到什么程度要看当时主客观条件）和稳定物价的方针，而决不能采取“适度膨胀”的方针。口子一开，收不了，只能刺激新一轮严重的通货膨胀。这是各国经验充分证明了的真理。

**总之，当前我国的经济问题，主要不是刺激需求总量，加快增长速度的问题，而是改进结构，提高素质和效益的问题。**这要靠两个根本性转变来实现，在宏观环境上要以适度从紧、适时微调的方针来保证。现在，买方市场已初步形成，一个相对宽松的宏观环境已经出现。我们要抓住这个良好机遇，加大结构调整和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的力度，落实十五大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的各项任务。这才是当务之急。

# 21　从短缺到宽松*

## （1997 年 9 月 15 日）

我国过去是长期存在产品供不应求的短缺经济。许多消费品实行定量配给或凭票证供应，生产资料由国家统一调拨分配。改革开放后，经过近 20 年的努力，这种情况已基本改变。供不应求的紧缺局面已转变为供求基本平衡，或供大于求的相对宽松局面。我们已经初步“告别”了短缺经济。现在市场商品供应丰富多彩，琳琅满目，使人民生活的改善有了可靠的物质保证。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一个极其显著的变化。

### 一

这一变化是怎样发生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短缺经济是怎样形成的。对于这个问题，过去中外学者有许多讨论。归结为一句话：短缺经济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中产生的，或者说它是传统计划经济的一个特征。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在生产目的上，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实行工业化主

* 本文发表于 1997 年 9 月 15 日《光明日报》。

要服务于国防战备和巩固政权的政治目的，而发展生产的真正目标即满足人民生活需要反而降到了次要位置。

——在国民收入分配和积累与消费关系上，着重国家积累，比较忽视人民消费，形成了一方面是国家的高积累、高投资，另一方面是人民的低收入、低消费。

——在产业结构上，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国家的财力物力资源，集中用于发展重工业，使农业、轻工业的发展受到限制，消费品供应严重匮乏。

——在所有制结构上，认为"越大、越公、越纯"越好，实行不断向国有制的方向升级、过渡的政策，使生产者、供应者单一化，垄断化。它们之间缺乏竞争，生产、供应的产品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因而没有任何动力去改善商品和服务的供应。

——在管理体制上，实行大锅饭、供给制、软预算约束的体制，上上下下，无不热衷于争投资、争贷款、争物资、争外汇、争铺摊子、上项目等等，而对其效益则不负责任。这就形成了投资饥饿症，带来了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双膨胀。

总之，传统计划经济的发展战略和经济机制，一方面导致供给不足，一方面引发需求膨胀，其结果必然是供不应求的短缺经济。经济短缺的机制和经济波动的机制结合在一起，往往形成周期性的剧烈震荡，即我们过去很熟悉的大上大下的现象。

## 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波动的振幅比过去大大缩小，供

不应求的短缺经济逐步过渡到供求基本平衡或供略大于求，市场商品供应丰裕的经济。这是传统的计划经济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结果。具体分析，牵牵有以下数项。

——生产目的改变了，从过去为生产而生产或主要为政治目的而生产，回复到为提高和改善人民生活而生产，把人民得到实惠作为发展生产的首要目标。

——在国民收入分配和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上，从过去重国家积累轻人民消费，逐步变为积累和消费协调并重，人民在收入和消费基金大幅度增长的同时，还成为积累和投资的重要主体。

——在产业结构上，由过去片面优先发展重工业，形成重、轻、农严重失调，逐步转向一产（农业为主）、二产（工业为主）、三产（服务为主）协调发展，商品和服务的品类和数量都大大增加的局面。

——在所有制结构上，改变过去"一大二公三纯"的方针，转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市场主体的多样化，促进了市场竞争，有利于商品供应的丰富和服务质量的提高。

——在管理体制上，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扩展和深入，大锅饭、供给制、软预算的体制逐步削弱，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自我约束有所增强，生产者、供应者更多地考虑和适应市场需求了。

实行市场取向改革以来，发展战略与经济体制的上述各项变化，一方面使需求膨胀得到约束，另一方面促进了市场供应。再加上近几年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大大改善了经济总量的供需平衡，使短缺经济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并出现了一个

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

## 三

短缺经济转变为相对宽松的经济，从市场的角度来看，表现为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买方市场的出现，有利于实现消费者选择的权利，有利于促进竞争，并为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提供有利的宽松环境。买方市场和相对宽松的经济格局的形成，来之不易，也不是一了百好。对此不可盲目满足，需要正确认识和对待。

目前，买方市场格局仅仅是初步建立，还不能说巩固了。部分产品（如能源产品、部分化工产品和冶金产品等）还没有达到供求平衡；服务业发展滞后，远远未能满足市场需要；部分产品如城市住房，一方面商品房大量空置，一方面居民住房需求远未满足；部分产品虽然已经实现供求基本平衡或供略大于求，但其生产和供给的基础仍然脆弱，如农业，尽管 1995 年以来连续丰收，但在我们这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对粮食供应形势永远不能盲目乐观。

在买方市场初步形成的同时，目前出现了某些产品供应过多、生产能力过剩、产品积压和开工不足等现象。这些现象不能归之于买方市场范畴，因为我们所讲的买方市场是总体上供求基本平衡和供略大于求的市场，而不是供给过度超过需求的市场。目前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某些商品供应过剩、生产能力利用率过低的现象，既与正常的买方市场无关，亦非“需求不足”之过。其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供给结构扭曲，不适应市场需求变化，以及多年来盲目追求粗放扩张和重

复建设，超过了正常需求的结果。特别是前几年经济过热时，在需求扩张的假象拉动下，生产能力迅猛上去了，一旦需求膨胀假象消除，便会暴露出种种结构性矛盾。

在消除短缺经济和形成买方市场的过程中，之所以仍然存在前述一些市场缺陷和结构性矛盾，其深层原因还是根植于增长方式和经济体制。传统的粗放增长方式和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在我们的经济运行中仍有相当大的影响。经济发展中重数量轻质量、重速度轻效益的倾向依然存在，而这又与经济体制中特别是国有经济中软预算、大锅饭，以及政企不分、条块分割等弊端尚未根除有关。

综上所述，对于我国经济生活中短缺的消失和买方市场的出现，我们应当有清醒的认识。第一，市场供求总体形势的转变，是改革开放取得的一个最重大的成果。第二，这一转变是初步的，不能说已经巩固，还有许多深层次结构性问题亟待解决。第三，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抓住目前相对宽松环境已初步形成的大好机遇，加大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体制转变的步伐。这样，我们才能有把握地说同短缺经济永远告别，才能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建立买方市场已经取得的辉煌成果。

# 22　再谈“买方市场”*

## （1997 年 10 月）

### 一、买方市场问题研究回顾与重提买方市场的现实意义

80 年代初期，我曾提出了要把卖方市场转变成买方市场以实现改革目标的思想。围绕买方市场问题的观点体现在我的几篇文章中①。当时研究买方市场问题，是为了使市场机制和市场调节不只是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发挥其作用，而且能够成为改革后将要建立起来的新经济体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建立买方市场是为了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创造一个宽松的经济环境，为体制改革创造物质基础，其最终目的还是要建立一个市场经济体制。因为，原来的计划经济是以卖方市场为基础的，总量关系总是处于求大于供的状态，经济运行的态势在宏观层次上属于供给制约型，市场关系只能是由供给者或卖方主宰，消费者或买方只能听任作为卖方的生产者、

---

* 本文由作者口述，请社科院财贸所刘力、张群群两位博士协助整理成文，作者修改定稿。发表于《财贸经济》1997 年第 10 期。

① 参见《略论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几个问题》，《经济研究》1980 年第 11 期；《再论买方市场》，1983 年 9 月 23 日《人民日报》等处。

供应者的摆布，没有什么发言权。国家对物质资料的分配采取了配给和调拨体制，在这种体制和市场供求总量格局之下不存在实行正常的市场调节所必须的竞争，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无从实现，消费者权利难以有效行使，人民生活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严重影响。经济体制改革的最终目的还是要改善人民生活，从这个角度来说，要实现改革目标，就应该通过努力把卖方市场转变成买方市场。

把卖方市场转变成为买方市场，这是调整经济结构、消除一系列体制弊端的迫切需要。卖方市场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在经济运行方面的一个特征，并且是国民经济深层次的结构矛盾的一个表现。在传统体制下，生产者的生产活动并不是以满足消费的需要为目的，而只是为生产而生产，强调要为更高的政治层面的目的服务。在当时的特定历史背景中，经济活动的目的主要是服务和服从于国家防务的需要。在这个方面，中国和前苏联的情况有颇多相似之处。历史地看待这个问题，虽然不能完全否定当时采取的发展战略和政策措施的合理性，但不能不看到，由此带来的体制弊端和结构矛盾的影响却是相当深远的。隐藏在卖方市场格局背后的是一个畸型的国民经济结构。当时是强调以重工业为基础，把重工业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上，提出要把一切人力物力和财力集中到发展工业上来。为实现全面的资源动员，满足高积累的需要，在经济调节方式上实行了普遍的全面的严格的计划控制。虽然在政策原则上不时地提出要按照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但在具体的计划执行过程中，却变成了重轻农次序。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是传统体制下以致改革多年后仍然困扰着我们的重大问题。

卖方市场格局和结构失衡问题的根源大致可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在宏观经济层次上的发展战略的选择决定了相应的体制安排和经济增长方式，并由此造成了许多弊端。特定历史环境条件下的战略需要把巩固国防和提高国力放到突出地位。为大力发展军事工业，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人民生活的改善则被放到次要的地位上。为贯彻这种发展战略，在经济体制的安排上实行了计划经济；在宏观经济的运行上，则选择了片面追求高速度，特别是追求重工业高速发展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为实现外延型的扩大再生产实行了高积累政策。由此挤占了发展轻工业和农业的资源，造成了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二是在微观层次上实行了吃"大锅饭"的作法，形成了一种内在的需求扩张机制。在实行指令生产、资金供给制、物资计划调拨、一般消费品统购统销等制度安排之下，处于软预算约束之中的企业和地方都要不断地上规模争项目，它们对于资金、物资、一般商品的需求，都在不断地不可遏制地膨胀起来。难以抑制的投资饥饿症和全面的持续短缺是这种需求扩张机制的典型表现。从根本上讲，建立一个买方市场的想法是从经济结构调整的最终目的和改革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的需要产生出来的。

今天，经过10多年市场取向的改革，我们终于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并正在不断深化改革，努力实现这一改革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是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而建立一个买方市场则有利于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买方市场格局的形成具有一系列好处：消费者在这种局面中才能通过选择行为实现自身权利；买方市场可以促进生产者之间的竞争，提高生产经营活动的效率，改进

经营、技术、管理水平；供略大于求且有适当存货的状态，既可以为市场形势的变动留有回旋余地，又可以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良好的宽松环境；等等。

## 二、目前的买方市场格局及其成因

改革以来，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逐渐告别以供给严重短缺为根本特征的卖方市场结构，逐步走向买方市场结构。至今天，我国已经基本实现了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过渡，初步形成了买方市场的新格局。

买方市场的基本标志是市场供给略大于需求。近年来，我国的大多数商品已经实现了供求基本平衡且供给略大于需求。根据国内贸易部对直接关系人民生活、生产的600多种主要商品供求总量的排队分析所得出的资料，到1995年上半年，已经有95%的消费品保持供求基本平衡和供给略大于需求，投资品种多数供大于求，有的产品库存已出现积压现象。1996年上半年供求基本平衡和供给略大于需求的商品比重达90.6%，下半年这一指标达到了93.8%。1997年上半年，市场格局继续沿着买方市场的方向发展。在进行排队分析的609种主要商品中，供不应求的商品只有32种，占5.3%，与上年下半年相比减少0.9个百分点；供求基本平衡和供给略大于需求的商品有577种，占94.7%，比上年下半年增加0.9个百分点。另外，农业持续丰收，1995～1997年上半年粮食产量连续增产，1995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46657万吨，1996年达到49000万吨，1997年夏粮产量又创历史最高记录。国际收支状况明显改善，外贸由1993年的巨额逆差转为1994～

1997年上半年的连续顺差，国家外汇储备大幅度上升，1996年达到1050亿美元，比1992年增加856亿美元。上述状况表明，我国已经出现了供求总量基本平衡和供略大于求的局面，在总体上基本形成了买方市场格局。

目前的买方市场格局是怎样走过来的呢？应该说，这一转变过程是与体制上和战略上的两大转变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首先，买方市场的实现应该归功于市场取向的改革。市场取向的改革使中国经济摆脱了传统计划经济的羁绊，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在所有制上打破了"一大二公"的禁区，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大力发展了非国有经济。改革以来，国有制以外的经济部门发展很快，成为经济发展和市场供应的重要力量。表1、表2表明，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经济单位的比重由1980年的81.9%下降为1996年的52.2%，而非国有经济单位的比重则由1980年的18.1%上升到1996年的47.8%。在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工业的比重由1980年的76.0%下降为1996年的28.8%，而非国有工业的比重则由1980年的24.0%上升为1996年的71.2%。非国有经济的迅速发展，多元化竞争主体的形成，大大增加了商品供给和促进了市场繁荣。同时，通过改革，国有经济也达到了一定的发展，例如家电等行业，国有企业也为经济发展和市场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另一方面，市场取向的改革，也使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有了一些转换，软预算问题有了一些弱化，面对市场的约束和竞争，企业增加了调整产品结构的能动性，生产出更多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买方市场格局的形成。

**表1　1980～1996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经济类型结构的变化**

单位：%

| 经济类型 | 1980年 | 1985年 | 1990年 | 1995年 | 1996年 |
|---|---|---|---|---|---|
| 国有单位 | 81.9 | 66.1 | 65.6 | 54.4 | 52.2 |
| 集体单位 | 5.0 | 12.9 | 11.9 | 16.4 | 14.8 |
| 个　体 | 13.1 | 21.0 | 22.5 | 12.8 | 14.1 |
| 其他经济单位 | | | | 16.4 | 18.9 |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1997年》，第6页。

**表2　1980～1996年我国工业总产值经济类型结构的变化**

单位：%

| 经济类型 | 1980年 | 1985年 | 1990年 | 1995年 | 1996年 |
|---|---|---|---|---|---|
| 国有工业 | 76.0 | 64.9 | 54.6 | 32.6 | 28.8 |
| 集体工业 | 23.5 | 32.1 | 35.6 | 35.5 | 40.4 |
| 城乡个体工业 | – | 1.8 | 5.4 | 14.5 | 16.5 |
| 其他经济类型工业 | 0.5 | 1.2 | 4.4 | 17.3 | 14.3 |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1997年》，第7页。

其次，买方市场的实现还应该归功于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70年代末以来，我国逐步摒弃了以片面追求生产速度、重积累轻消费和重工业倾斜发展的传统发展战略，努力实行以提高人民生活为目的、积累和消费并重和农轻重并重的发展战略，以求得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使我国的市场供应状况日益好转，商品供应不断增加，买方市场格局逐步实现。

回顾我国买方市场实现的过程，我们可以深刻地认识到，我国买方市场的实现是来之不易的，是10多年来艰苦努力的结果。同时，我们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买方市场的格局仅仅初步建立了起来，还很不巩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1) 部分商品(如能源产品、部分化工产品和个别冶金、轻工产品等)还没有达到供求基本平衡，更没有达到供大于求。(2) 市场供应不仅包括产品供应，而且也包括服务供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市场对后者的需求将越来越大，而我国的服务业的发展相对滞后，远远无法满足市场的需要。(3) 部分商品如城市住房，虽然远远未能满足居民需求，但是由于体制、结构、价格等方面的原因，却出现了大量闲置现象。(4) 部分产品实现了供求基本平衡或供大于求，但其生产供给基础仍然很脆弱，不稳固。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农业，尽管 1995 年以来粮食连续丰收，但将来能否持续下去，尚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因素。对于我国这样一个 12 亿多人的人口大国来说，粮食的供应形势永远是不容盲目乐观的。

针对目前我国已经基本实现买方市场但很不巩固的情况，我们在指导思想上必须克服认为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化已经大功告成的观念。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尽管过去片面追求生产速度、经济结构失衡和积累率过高的情况已有很大改变，但整个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战略并没有彻底转变过来。由于经济体制上政企职责不分，条块分割盛行，预算约束软弱，投资责任不明等弊端远未消除，在增长方式上盲目追求外延粗放式的扩展，追求“大而全”、“小而全”的重复建设和重复引进依然存在，这种情况导致经济结构的进一步扭曲和经济效益的下降，并反复引发经济过热和严重的通货膨胀，这些都不利于买方市场的巩固和发展。特别当经济过热和严重通货膨胀再度出现，还会从总体上破坏买方市场的格局。对此我们千万不能疏忽大意。

## 三、实行有利于维持买方市场格局的经济政策

现在我们再次谈论买方市场问题，是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的。随着经济运行“软着陆”的成功，今年上半年仍有着相对快速的经济增长，而且物价增幅下降了。面对如此的经济形势，有人却认为经济偏冷了，主张加温。一些地方和企业要求更高速度的经济增长，这种愿望是可以理解的。目前部分职工下岗、在岗人员就业不充分，商品积压增加、在三角债困扰下企业资金运转困难等问题确实存在，需要认真对待，切实解决。但把这些问题归结为需求不足，认为与买方市场有关，则是需要商榷的。理论界有人提出，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了经济增长和物价指数“双低”的势头，主张在宏观调控上不能继续从紧和“消极求稳”，而应该刺激需求，加快增长速度。这种看法和主张是否符合实际呢？

首先，这次“软着陆”后与上次“硬着陆”后的情况不同。上次周期转折时，经济增长率由 1988 年的 11.3% 骤降到 1989 年的 4.1% 和 1990 年的 3.8%，出现滑坡，可以说“偏冷”。这次“软着陆”前后的增长率，1995 年是 10.5%，1996 年为 9.7%，1997 年上半年仍达到 9.5%。今年上半年的经济增长率，高于宏观调控预期的全年目标(8%)，处于我国目前经济增长的合理区间(8% ~ 10%)，仍排在世界各国的前列。总之，今年上半年的增长速度并不低，怎能说经济运行“偏冷”呢？

其次，从需求拉动来看，今年上半年消费稳中有升，全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13006亿元，同比增长14.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2.1%。投资需求适度增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城乡集体和个体投资）同比增长13.8%，实际增幅9.7%。外贸需求明显回升，同比增长26.2%。总之，消费、投资和出口三大最终需求，今年上半年的增长幅度都高于GDP的增长幅度（9.5%），拉力并不低。从总体上看，不能说需求不足。

再次，货币政策适度从紧的"度"把握得比较好。从今年上半年金融运行形势看，中央银行适度增加了货币供应量，积极支持了合理的资金需求。（1）今年上半年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共增加3944亿元，比去年同期多84亿元。（2）随着资金供应渠道的多元化，上市公司在股市吸收了不少资金。上半年共有100多家企业发行各种股票，筹集资金达500亿元。（3）出口结汇增加了不少人民币资金。（4）在货币供应量方面，反映现实需求状况的，流动性较高的货币M0、M1，上半年增幅分别为19%、19.1%，两个指标的增长幅度都超过了原定全年调控目标（13.6%和18%）。而且，到6月末金融机构中企业存款余额25674亿元，同比增长27.6%。企业存款上升幅度的提高表明企业自身支付能力增强，资金紧张状况得到进一步缓解。此外，股市相当活跃，实质生产部门的资金转向虚拟资本部门，在股市上反复翻腾，证明资金并不那么缺。总之，实施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并没有采取"一刀切"的做法，而是保证了货币供应的适度增加，并促进了整个市场流动性的增强。

可见，就目前形势而言，不存在经济偏冷的问题，也看不出有改变适度从紧政策的理由。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确存在一

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如供给过度增多，商品供应过剩，生产能力过剩，产品积压，开工不足等，这些问题不属于“买方市场”的范围，因为我们讲的和要的“买方市场”，是总体供给“略大于”需求的市场，而不是供给“过度超过”需求的市场。目前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某些商品供应过剩，生产能力利用不足现象，这既与买方市场无关，亦非“需求不足”之过，而主要在于供给结构扭曲，不适应市场需求变化；在于多年来盲目追求粗放扩张，重复建设超过正常需求；在于优胜劣汰机制还不健全，在新的生产能力不能增长的同时，那些本该淘汰不符合市场需求的生产能力却得不到及时调整。特别是在经济过热时，在需求扩张假象拉动下，生产能力一下子上去了，一旦需求膨胀消除，便会暴露出来深层次的结构矛盾。这种结构矛盾的原因归根到底还在于前面所说的体制缺陷，包括投资体制还处于无人负责的状态，等等。有人提出用扩大投资的办法来刺激需求，这在当前资源供应的“瓶颈”有所松动的情况下，不是不可以有选择有重点地适当增加某些投资，以促进闲置资源的有效利用。但应注意，在目前体制条件下，全面放松对投资的控制，这只能继续鼓励粗放扩张和重复建设，加剧产品积压和资金占用，进一步扭曲供给结构，应该努力避免。

另一例子是就业问题。在中国，简单地套用“物价高失业率低，物价低失业率高”的公式，一定会碰壁。对于就业问题的分析不能简单化。目前我国就业压力的原因十分复杂，有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上升的供给总量原因，有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第二、三产业和城镇就业压力增大的结构原因，有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技术上的原因，有企业转制减人增效的体制上的原因，等等。当然，还有周期性原因，经济增

长率的回落限制了劳动需求总量的增长，但这个原因是短期性的，不是主要原因。前几个原因是基本性的、较长期性的，不是一时经济景气与否的问题，也不是银根松紧程度的问题。因此，对于就业问题，要根据不同原因，采取不同的对策，进行综合治理。如实施再就业工程，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发展乡镇企业，发展第三产业，不断地向生产的广度和深度、向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推进，拓宽就业领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增加适应市场需求的有效供给而不是无效供给，这也是有利于买方市场的发展和巩固的。单纯用放松银根、刺激增长的办法，解决不了当前我国的就业问题。

另外，在若干年来市场取向改革和卖方市场转化为买方市场的过程中，我国绝大多数商品价格形成已走上市场定价的轨道。但每逢经济过热，物价涨幅过高时，这种转化都要受到阻碍。近几年来随着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物价涨幅逐年回落，今年在国民经济保持适度快速增长的同时，物价涨幅又进一步下降。这是一件好事，是买方市场得到进一步健康发展的体现。占居民消费比重较大的食品价格下降，这主要得益于农业丰收，基础并不稳固，而居住和服务项目价格涨幅仍高，还不能掉以轻心。有人认为现在物价涨幅太低，提出要实行适度的物价上涨，以刺激经济增长。我认为，对通货膨胀绝对不能开口子，只能收口子，就是说，只能采取“抑制”通货膨胀和稳定物价的方针（当然抑制到什么程度，要看当时主客观条件），而决不能采取“适度通胀”和“刺激涨价”的方针。口子一开，收不了，只能引发新一轮的严重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从而破坏得来不易的买方市场良好局面。

总之，在确定当前经济政策的指导方针时，我认为应实行

有利于巩固和发展买方市场格局的宏观经济政策。当前我国的经济问题，主要不是刺激需求总量，加快增长速度的问题，而是改进结构、提高素质和效益的问题，这要靠两个根本性转变来实现，在宏观环境上要以适度从紧的方针来保证。现在我们已经初步实现买方市场的格局，有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宏观环境和市场环境。我们应充分利用这个大好时机，加大体制改革、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的力度，以促进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和健康的发展。

# 23　“软着陆”成功后的经济形势和对策*

（1997 年 10 月 11 日）

关于当前的经济形势，以及今年全年的经济走势和明年的预测，是我们大家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软着陆”成功之后，我们又面临着各种可能的选择。在有多种选择存在的时候，就容易产生各种不同的意见。对于“软着陆”成功之后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宏观调控政策，我国今后的经济运行会呈现出怎样的特点，经济学界存在着各种不同观点，这是自然的，正常的。正确的选择只有在各种不同意见的讨论中，方能产生出来。关于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看法，我已在 9 月 26 日《人民日报》的文章中谈了，本文将就几个有关问题进一步谈谈个人的一些看法。

## 为什么“软着陆”成功后，我们还要坚持“适度从紧”的政策

“适度从紧”政策是在 1993 年 6、7 月份，中央针对当时经

---

× 本文系作者 1997 年 10 月 11 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 1997 年秋季座谈会上的开幕词摘要。发表于 1997 年 10 月 13 日《经济日报》，原题为《再论当前经济形势的几个问题》。

济过热而及时果断地采取的措施，加强宏观调控后，实际上已开始实行。到1996年，“适度从紧”写进了《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这样，“适度从紧”就由短期政策上升为今后一段时期内的调控的重要指导方针。在刚刚结束的党的十五大上，又把“实施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正式写进了江泽民总书记的报告。就是说，在成功地实现“软着陆”后，还要在跨世纪的较长时期继续坚持“适度从紧”的政策。我体会，之所以将“适度从紧”由短期政策上升为今后一段时期内的中长期政策方针，是有其重要原因的。首先，从理论上说，这是建国以来我们党在认识、探索和把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及其运行规律方面，从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中所得出的深刻总结。其次，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现状来说，原有体制所固有的盲目扩张冲动的倾向尚未根除，为避免一次又一次地扑救通货膨胀之火，给改革发展一个较为稳定的宏观环境，有必要坚持适度从紧的政策。第三，从我国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来说，在我们已开始告别短缺，买方市场已初步形成的情况下，我们迫切面临着产业结构、行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优化升级的艰巨任务。只有坚持“适度从紧”，保持总量平衡，才能在市场导向下有效地调整结构，才能在适度快速增长的同时，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第四，从经济波动的当前态势来说，经过几年的努力，我国经济增长率已回落至适度增长区间。1996年GDP增长率为9.7%，预计今年全年为9%左右，这个增长位势不低。若放弃“适度从紧”的政策方针，则经济增长率又很容易地一下子冲出适度增长区间。几年来“软着陆”的成果将会失去，过后又要进行长时间的大

调整。第五，从国际上看，80年代以来，世界上一些主要国家，针对世界经济以及各国经济发展的新形势，都注重采取了稳定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这种稳定性政策，是可持续发展和增长的政策，也有助于防范各种外在冲击所带来的风险。“适度从紧”正是从我国国情出发的一种稳定性政策，有利于我国经济在跨世纪的发展中既适度快速又相对平稳地增长。目前，国际学术界已提出经济周期波动正在走向“微波(Ripple)”化的问题，也就是经济周期波动在新形势下呈现出一种缓升缓降、平稳增长的变形趋势。我们应该注意国际学术界的最新前沿研究动向，结合考虑我国的问题。

## 关于在“适度从紧”下适时适度地微调问题

大家都知道，所谓适度从紧并不意味全面紧缩。十五大报告在“实施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后面，紧接着写了“注意掌握调控力度”。这就是说，“适度从紧”有机地包含着“适时微调”。“适度”二字也要通过“适时微调”体现出来。因此，坚持“适度从紧”的政策方针，并不排除而且必须要在年度间和年度内审时度势地进行适时与适度地微调，这也就是注意掌握宏观调控的力度。1993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率一直处于平稳的回落中，1994年10月以后物价上涨率也逐月不断地回落。前者已延续了4年余，后者也延续了34个多月。应该注意的是，在保持宏观调控的一定力度情况下，经济增长率和物价上涨率的变动趋势，都会有一定的惯性。这是由部门间的产业关联效应、生产与需求间的关联效应所决定

的。这种关联效应也使政策具有滞后效应。因此，当前为了防止经济回落的惯性可能带来后续经济增长的持续下滑，需要适时适度地及时作些必要的松动微调。但是，应当指出的是：第一，这种微调是在“适度从紧”总方针下的微调，而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扩张性政策。第二，这种微调，绝不是用通货膨胀的办法去刺激经济增长。抑制通胀和稳定物价的方针不能放弃。当然，稳定物价不是绝对的稳定，而是基本稳定和相对稳定。第三，适时适度的松动微调，也不是像目前有人主张的在货币政策上继续从紧，而在财政上实行扩张性政策。或者相反，实行所谓“紧财政松货币”的政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从总体上说都还要坚持适度从紧。在进行适时适度的微调时，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可以配合交替运用。第四，这种微调要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要支持有市场、效益好的企业的发展，而绝不是鼓励简单的外延扩张和重复建设。总之，微调的目的是熨平或弱化经济的波动，而不是放大或激化经济的波动。

## 关于就业问题

目前，就业与再就业问题比较突出，成为大好形势下各界极为关注的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群众生活和社会安定，必须高度重视和妥善解决。把目前就业压力大的原因归之于需求不足，是一种过于简单的说法。在今年春季会上，我曾从总量供给、结构调整、体制转换、技术进步和周期紧缩等五个方面分析过我国就业压力大的原因，并指出解决就业问题，应采取多种对策、综合治理。从大思路、大方向来说，以下一些途

径，是可以考虑的：一是从我国国情出发，加强第一产业，发展高产、优势、高效农业，大力推进科教兴农，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促进乡镇企业的新发展，这有利于在高水平上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缓解城镇就业压力。二是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发展第三产业。从世界各国的情况看，第三产业是最能吸纳劳动力就业的产业。我国目前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仅为26%，在美国，50年代，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已经达50%，到90年代中期，更上升到80%。三是就第二产业来说，要把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结合起来。四是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以扩大就业规模。五是调整工时制度，缩短在岗劳动时间，增加学习、培训和闲暇时间，以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并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技能和生活质量。六是转变就业方式，即由固定性、终身就业的旧模式，向时段性、灵活性就业的新模式转变，这也是90年代以来，在世界上一些主要国家就业的新趋势。比如在美国，近几年来，就业增加，失业率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种新的就业方式提供了许多新的就业岗位。特别是在一些技术性、专业性领域，如会计事务、计算机服务、医疗卫生服务等方面，这种新的就业方式发展得更快。近3年来，美国时段性就业的人数增长了19%，这种新式就业的人数占美国总劳动力的比重已达十分之一。而且，这种新的就业方式越来越成为体面的、受人尊敬的就业选择。七是积极扶持城镇集体经济、私营个体经济的发展，这是吸纳就业的一条重要渠道。八是加大劳动力市场的培育与发展力度，加大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力度。这有利于劳动力供求双方的信息沟通，缩短再就业过程，扫除劳动力流动的各种障碍。这些是对解决我国

就业压力问题长期思路和对策的考虑。就近期来说，要采取积极措施，依靠社会各方面力量，关心和安排好下岗职工的生活，搞好职业培训，拓宽就业门路，实施再就业工程，并完善最低生活保障方面的工作。这决不单纯是“放松银根、刺激需求”所能奏效的。

最后，我想再次强调：当前我国的经济问题，主要不是刺激需求总量、加快增长速度的问题，而是调整结构、提高素质和效益的问题，这要靠两个根本性转变来实现，在宏观环境上要以适度从紧、适时微调的方针保证。我们要充分利用当前买方市场初步形成，相对宽松的宏观环境已经出现的大好形势，加大结构调整、机制转换和增长方式转变的力度，按照党的十五大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 24　增长速度·宏观调控·供求关系*

## （1998年4月27日）

### 增长速度

1993年加强宏观调控以来，经济增长速度逐年、有时是逐季下降，到今年第一季度还未停止。从1992年14.2%的高峰，降到1996年的9.6%，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这是大家公认的。

“软着陆”成功后的1997年，人们以为经济运行已经到了“谷底”，速度该稳住了，或者重新启动、回升。但这一年GDP增幅降到8.8%。这虽然是仍居世界首位的高速度，但逐月下降的势头，迅速向着当今我国经济增长适度区间（8%～10%）的下限逼近，不能不引起人们注意。对此，我们在去年

---

* 本文系作者1998年4月27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春季座谈会上的开幕词摘要。1998年6月2日《人民日报》在发表此文时特地加了编者的话，指出：在成功实现经济“软着陆”的基础上，1997年中国经济又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好成绩。国民经济发展呈现出“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态势。为了使这一良好态势得以保持下去，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增长速度、宏观调控和供求关系等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顾问刘国光研究员撰文，对这三个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文章很有说服力，值得认真一读。

10月初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形势分析会上曾经指出："在保持宏观调控的一定力度时，经济增长率和物价上涨率的变动趋势，都会有一定的惯性。这是由部门间的产业关联效应、生产与需求间的关联效应所决定的。这种关联效应也使政策具有滞后效应。"那时，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尚未显露，我们提出了"当前为了防止经济回落的惯性可能带来后续经济增长持续下滑，需要适时适度地及时作些必要的松动微调"。

此后，东南亚金融危机扩展到东南亚许多国家和地区，并影响到全世界，其对我国的影响也逐渐显露，这种松动微调就更是必要的了。事实上，在实施"软着陆"的后期和"软着陆"成功之后，已经陆续采取了一些金融微调措施。去年10月以后，经过对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的深化认识，特别是金融工作会议、经济工作会议以来，这些微调措施一步步强化，除了取消银行贷款指令限额、进一步降低利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等外，还特别针对东南亚金融危机带来的外需减少和国内需求增幅有所放缓的趋势，推出增加固定资产投资、扩大内需等重要措施。但是由于这些措施发挥作用有一个时滞的问题，而且有些措施（如增加固定资产投资）的到位和落实还需要一个过程，再加上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更加表面化，所以，上述措施未能即时阻止速度下降的趋势。1998年第一季度GDP比上年同期增长7.2%，增幅比上年同期进一步下降了2.2个百分点。看来，今年全年要达到8%的速度目标，还要付出很大的努力。但目前支撑8%增长的客观条件还是比较充裕的。交通、能源、原材料、农业、外汇储备、通胀率等，都是多年来最为宽松的，可以支持8%以上的经济增

长。有理由认为，随着适度松动微调措施的逐步到位和发挥作用，速度下降的趋势将会逐渐稳下来，今年下半年和明年上半年将出现回升。

问题是已采取的微调措施力度上是否够。比如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加大到15%能否落实？是否足以保证今年经济增长速度达到8%？是否还需要也可能再加一点力度？如果提高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幅，在投资动力、项目准备和资金渠道上有无保证？等等。这些问题需要及时研究解决。当然，固定资产投资的乘数作用对经济发展的后续影响很大，不宜跨步过大，并且要防止重复建设造成新的结构扭曲、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所以应十分谨慎。

## 宏观调控

针对"软着陆"成功以来国内经济运行走势出现的新问题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新情况，在宏观调控政策上进行某些措施和力度的调整是完全必要的。对于这些调整的意义应当怎样认识呢？采取某些金融松动、增加投资、扩大内需的措施，是不是意味着放弃适度从紧的中长期宏观调控政策，转而采取我们过去曾经用过的那种扩张性政策，或者转而采取传统凯恩斯主义式的扩张性政策呢？还是意味着这仍是在继续坚持适度从紧方针的前提下所作的适时适度的、调控力度的调整呢？

前一种观点事实上把我国增长速度的某些下降看成是典型经济周期谷底延伸的停滞衰退，需要强扩张性的调控政策才能启动。因此，不必再提什么适度从紧了。应当看到，我国

经济运行的周期形态已发生变化，经过“软着陆”出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局面。在这样一种位势较高的“谷底”，虽然出现了某些供给大于需求、企业经营困难、职工下岗等问题，对此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并且已经开始采取措施逐步解决；但接近并环绕8%的经济增长率目前仍是居于世界前列的速度，从整体经济运行来看，还不能说我国经济已经处于类似西方典型经济周期的停滞衰退阶段而需要实行全面扩张的宏观调控政策。

从短期来看，为对付目前经济运行中的一些困难问题，必须加大一些松动金融和增加投资的力度和幅度，但这仍属适时适度微调的范围。事实上，我们已经和正在采取的宏观调控政策调整的措施与力度都是审慎的、有选择的和有分寸的，而不是全面放松的扩张性宏观调控政策。

从中长期来看，在体制转轨尚未完成、旧体制惯性尚未根除以前，我们仍然需要坚持适度从紧的宏观调控政策，把宏观调控措施在力度上的短期调整置于中长期政策之下。其理由除了去年10月初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形势分析会上的发言中对为什么“软着陆”成功后还要坚持适度从紧的政策所讲的五条（经济蓝皮书《1998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第6页）外，这里还要指出以下几点：

一是保持宏观调控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和灵活性。适度从紧、适时微调，从十四届五中全会到十五大都是作为中长期宏观调控政策提出来的。现在虽然企业、金融、政府机构三大改革步子加快，但整个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转轨的完成还要有一个过程，原有体制所固有的约束软弱和盲目扩张的机制仍未消失，“适度从紧”作为中长期方针，仍有继续坚持之必

要。

二是在宏观调控措施力度的短期调整中，不能忽视短期调整对中长期的后续影响。近期通货膨胀的危险虽然暂时有所削弱，但潜在反弹因素始终存在，初步形成的买方市场还不能说已经巩固。所以要警钟长鸣。这有利于防止搞盲目投资、重复建设、一哄而起、重蹈覆辙。

三是坚持这一中长期宏观调控政策，通过政策措施和力度的适时掌握、适度调整，既可以为刺激经济增长、扩大就业留有充分的空间和余地，又可以为把扩大内需同结构调整、深化改革结合起来提供一个比较稳定的良好的宏观环境，从而有利于两个根本性转变的顺利推进。

## 供求关系

最近一段时期，在社会商品总供求关系上，面临着供给大于需求的问题，表现为有些商品卖不出去，库存积压增多，一些生产能力多余而开不了工，等等。为了解释这一现象以便找出解决途径，在社会上的讨论中频频出现和使用需求不足、生产过剩、买方市场等概念。这些概念看来相似，其实是有差别的。有些论者把供大于求等同于或归结为“需求不足”，这不免失于简单化。其实并不是所有供大于求都源于“需求不足”。比如，正在压缩掉的一千万个纺织锭子，是需求不足造成的吗？又比如，前次经济过热以来就出现并且几年来还在增加的已达到六七千万平方米的闲置商品房，是需求不足造成的吗？回答显然是否定的。例子举不胜举。此类“供大于求”的原因只能从结构和体制上去找。近一时期以来出现的

供大于求，不宜简单地归之于“需求不足”，而是蕴含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来由或组成部分：

第一个组成部分是初步形成的买方市场。这是市场取向改革的一项伟大成果，是不容否定的。这里所说的“买方市场”，指的是正常的买方市场。我在1983年《再论买方市场》（1983年9月23日《人民日报》；《财贸经济》1983年第9期）一文中曾把它界定为“供给略大于直接需求的买方市场”，以区别于“供给过剩的买方市场”。“略大”多少才合适呢？当时提出，供给略大于直接需求的差额应满足三项需要：（1）正常的周转存货（生产和流通环节）增长的需要；（2）预防不测事故（自然、社会）的储备增长的需要；（3）为实现消费者选择权利和造成生产者竞争环境必须淘汰一部分落后陈旧商品和生产能力的需要。在上述合理界限内形成的供给略大于直接需求，特别是为保护消费者正常权益和促进生产者正常经营的剩余是开展合理竞争所必需的生产剩余，是健康的市场经济所绝对需要的，既不应视为“需求不足”，也不宜叫作“生产过剩”。如果勉强借用“生产过剩”的概念，那则如马克思所说：“这种过剩本身并不是什么祸害，而是利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526页）

第二个组成部分：超过上述正常买方市场合理界限的供给，是真正的生产过剩。这其中有一部分也不是由于“需求不足”所形成的，而是盲目投资、重复建设，以及经济过热时期的过度膨胀、泡沫经济所带来的结构扭曲、资源浪费等恶果造成的。

第三个组成部分，即除了上述第一和第二个组成部分以外剩下来的供给大于需求的部分，才可归于“需求不足”。这

部分不足源于内需或外需，源于投资或消费，或兼而有之。“软着陆”成功后，尤其是去年第四季度以来，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惯性下滑和境外经济风波影响的显露，需求相对不足的问题逐渐突出，包括内需和外需，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其增长势头均有放慢倾向。

我国目前宏观经济中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上述三个组成部分，因其来源和性质不同，所以不宜等同对待。对于正常买方市场应予保护、巩固，使之健康发展。对于生产过剩（不是由于需求不足造成的），应从体制上、结构上探寻根源，压缩陈旧落后的生产能力，挤掉仍然存在的经济泡沫，逐步调整生产供应结构，使之适应有效需求结构，以消除社会资源的浪费。对于需求不足部分，则应从内需外需、消费投资诸方面探寻原因，找出对策，从刺激有效需求着手（我国目前主要从增加投资、扩大内需方面着手），增加和改善有效供给来解决。我国宏观经济供求关系的三个组成部分如何认定和对待，是我国特殊国情中产生的一个特殊问题。它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

# 25　东亚金融危机与中国*

（1998 年 5 月 27 日）

始于去年年中的东亚金融危机，已经对亚洲各主要经济体和世界其他地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中国也不例外。

## 一、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就在东亚一些国家先后暴发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国经济继 1996 年成功实现“软着陆”后，近一年多来继续平稳滑行，出现了“高增长、低通胀”局面，增长速度保持在 8%以上的高位水平，通胀率降至 3%以下。这表明，东亚金融危机并未对中国经济产生重大的直接冲击。然而，这场危机的间接影响、特别是其对中国经济的滞后影响，还是不容忽视的。

**首先，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近年来，中国对东南亚国家和韩国及日本的出口大体占中国出口总额的 30%左右。东亚主要国家暴发金融危机后，经济增长放慢，势必减少从中国的进口。同时，这些国家部分出口产品和主要主市场与中

---

× 本文系作者 1998 年 5 月 27 日在美国波斯顿“中美第二届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研讨会”上的发言。发表于 1998 年 6 月 23 日《经济参考报》。

国相似，其汇率大幅度下调，势必影响中国的出口竞争能力。

**其次，对引进外资的影响。**近20年来，中国实际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80%和大部分海外直接融资来自香港、台湾、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这次金融危机将使这些国家和地区对华投资和融资的规模下降。同时，美欧发达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金融机构由于加大对东亚重灾区的金融援助力度，其对华投融资规模也会受到影响。

**第三，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由于外贸出口和引进外资的增幅下降，国际收支黑字缩减，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对人民币汇率产生下调压力。中国虽然对保持汇率稳定做出过郑重承诺，但是，实际化解人民币汇率下调压力，仍需做巨大努力。

**第四，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东亚金融危机的发生，适逢中国经济运行处于景气循环的"低谷"阶段。这两种因素相互作用将导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从目前情况看，虽然通过采取各种措施，包括扩大内需，仍有可能实现8%或略高一点的经济增长，但不可能超过去年的水平。

## 二、几点经验教训

从中国的角度看，以下几点经验教训是值得总结与汲取的。

**第一，一个国家要保持经济稳定发展，必须重视供求总量的动态均衡，切忌"泡沫经济"。**受这次金融危机沉重打击的东亚经济体，大多是房地产市场和证券市场连年出现"泡沫经济"，最终酿成了以大量房地产闲置、呆坏帐连锁冲击为主要特征的金融危机。有些经济体用牺牲供求动态均衡和国际收

支平衡的办法来满足少数大企业过度扩张的要求，从而为本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埋下了危机的根子。中国前些年也曾出现过“泡沫现象”，但自 1993 年年中起通过加强宏观调控，控制了房地产和开发区的过热发展态势，在东亚金融危机暴发之前已经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为抵御国际金融风波创造了条件。我们要认真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防止泡沫经济以其他形式再次出现。

**第二，健全金融体系，加强金融系统的风险管理与监督，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必要条件。**这次受金融危机沉重打击的经济体，大都重视运用金融手段推动经济发展，但在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由于放松了必要的监督与管理，大量银行信贷资金直接、间接流向高风险部门，导致过度贷款、巨额呆坏帐和金融机构破产倒闭。中国金融领域也存在不稳定因素，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达 1/4，其中逾期两年以上的呆滞贷款和无法收回的呆坏帐达 10% 以上，各类金融违法、违规活动比较严重。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中国政府不久前决定采取措施，深化金融改革，强化金融监管，包括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商业化改革步伐，逐步实行资产负债管理和风险管理，加强金融机构内控制度的建设，等等。这些措施的逐步落实，将更有利于防范和防止可能出现的内外金融风险的袭击。

**第三，对金融业的对外开放，要保持积极和谨慎态度。**在金融体系尚不健全，政府调控能力较弱的情况下，过早过快地全面放开本国资本市场、取消外汇管制、大量引进境外金融机构，助长了国际游资的进入和冲击，造成了投机资本排挤产业资本、短期投资和短期债务规模过大的不稳定局面。这是东亚一些经济体发生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对金融业

的对外开放一直持既积极又谨慎的态度，到目前为止资本市场的放开尚处于初始阶段，资本帐户的人民币自由兑换尚未启动，对资本流动的管制还较严，引进外资的规模和结构比较合理，外国在华直接投资占外资规模的60%以上，中长期借款占外债规模的80%以上等等，这些均对国际投机资本在中国汇市和股市兴风作浪的能力施加了必要限制。这是中国能够抵挡东亚金融危机冲击的一堵厚墙。当然，今后中国仍要坚定地实施既积极又谨慎的金融对外开放方针，其时间顺序和实施步骤要与金融体系的健全和金融监管能力的加强相适应。

**第四，产业政策要符合实际，发挥本国资源比较优势。**东亚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靠增加劳动和资本的投入，这一点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阶段是客观的和必要的。但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以后，如不重视技术创新和高新技术的推动，就会使国民经济的发展失去后劲。东南亚国家在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向集约的转变上，确实存在步履迟滞的问题，但这次金融危机还不能说直接导因于此。其直接导因是这些国家的产业政策好高骛远、不顾国内经济发展水平、资源优势和国内外市场容量，盲目追求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的产业发展，投资过度集中于某些支柱工业，如汽车、电子、化工等，过度发展出口产业，造成严重的产业结构失调和大规模的供给过剩。中国经济发展中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是粗放增长，这不仅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关，而且也与条块分割、市场割据的体制以及地区之间与部门之间追求“大而全”、“小而全”的低水平重复建设，甚至成为一种痼疾，导致生产能力过剩和开工不足等问题有关。中国这几年强调由粗放增长转向集约增长，但考

虑到中国劳动力富余、资金不足和科技落后的资源结构现状，这一转变也只能是以既要积极又要稳妥的方式进行为宜。

**第五，"东亚模式"的一个突出特征是政府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增长。**经验表明这种参与和推动是必不可少的，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成熟和企业的成长，要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否则易于形成政企不分、官商勾结。在这方面，韩国的教训尤其深刻。韩国注重通过发展大企业集团来推动本国经济发展，但政策过度倾斜。由于过度强调企业资本的"低成本扩大"、容忍企业在政府的保护下盲目举债，负债率高达500%、甚至3000%～4000%的畸形水平，结果给韩国带来灾难。从中国的情况来看，市场取向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实现政企分开和转变政府职能。这项改革的阻力和难度较大，今年新组建的政府开始有所突破。当然，我们决不能因此而否定东亚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的历史功绩，更不能否定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必要作用。尤其是处在较低发展阶段和经济转轨时期的中国，政府的作用还要比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更大一些。

## 三、危机阴影下中国经济走势和对策

**1997年以来中国经济在"高增长、低通胀"总形势下出现了逐季缓缓下滑的趋势。**东亚金融危机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趋势。今年第一季度中国GDP增长率降至7.2%，比上年同期下降2.2个百分点。为了扭转速度下滑趋势，把危机的影响降到最低限度，同时对东亚和世界摆脱金融危机后果尽我们的一份国际义务，中国新一届政府已经明确提出"要确保今年

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8%，通货膨胀率小于3%，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另外，切实扭转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也有利于缓解国内就业压力等问题。鉴于今年外需所受影响较大的现实，我们必须从本国国情出发，主要依靠扩大内需，来保证上述目标的实现。

**扩大内需的主要措施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扩大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加大对铁路、公路、通信、环保等公共设施和基础部门的投资力度，以此来带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使今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达到15%以上。**二是引导和扩大居民消费，**当前要尽快实行公有住房的商品化，启动城市居民住宅市场，同时还要努力开发农村消费需求，开拓农村市场。**三是扩大内需要与经济结构的调整结合起来。**目前中国内需不足，产业结构升级严重滞后。因此，这次扩大投资，要向高技术含量、高加工度和高附加值产业倾斜，要在加大基础产业投资的同时，逐步加大机电工业的技术改造投资，以推动产业升级。另外，还要压缩陈旧落后、过剩多余的生产能力（如压缩纺纱能力1000万锭）。**四是扩大内需还要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目前中国的供需矛盾主要是结构性的，同时又是制度性的。例如，条（部门）、块（地方）分割，造成重复投资，带来生产能力过剩和开工不足；福利分房制度造成住房市场销售不旺，等等。因此，要扩大内需，就必须继续深化改革，转换机制。**最后，扩大内需必须在继续坚持适度从紧的中长期宏观调控方针的前提下进行。**目前中国经济虽然遇到一些困难，包括经济增长率下降、职工下岗增加等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运行已经处于类似典型经济周期的停滞衰退阶段，实际上中国经济增长率还处于相当高的位置，同时通货膨胀的潜

在反弹因素还始终存在，因此，不能放弃适度从紧的中长期宏观调控方针、转而采取全面扩张性政策。正确的选择是，在继续坚持适度从紧的中长期宏观调控方针下，对宏观经济调控的措施和力度进行适时、适度松动和调整，以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健康发展。

在外需方面，由于做出了稳定人民币汇率的承诺，因此，在对策上应当主要通过运用非汇率措施来扩大外需。一是进一步降低关税和实行出口退税；二是对外商对华投资进口设备恢复免征关税；三是进一步扩大外贸企业进出口自主经营决策权；四是继续巩固与传统贸易伙伴的关系的同时，大力开拓新的国际市场；五是优化出口产业和产品结构，努力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和档次、降低成本，提高非价格竞争能力；六是进一步加大外贸体制改革力度，理顺关系，推动出口增长。

以上我仅就东亚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中国可以从中汲取的经验教训以及中国的对策措施等等，做了几点简要阐述。我相信，只要我们能够认真实施上述对策措施，顺利克服危机带来的影响，继续实现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健康成长，将是有把握的！

# 26　当前中国经济形势*

## （1998 年 6 月 23 日）

这次研讨会的组织者要我讲讲当前中国的经济形势。因时间有限，只能简短讲点个人的观察和看法。

（一）大家知道，今年 12 月正好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满 20 周年。20 年来，中国经济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GDP 平均每年增长率达 10%左右，提前实现了本世纪末比 1980 年翻两番的目标。这 20 年，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

（二）20 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而是有曲折的，经历了四次较大的起伏。最近一次的经济过热，发生在 1992～1993 年。从 1993 年夏季开始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主要是实行适度从紧与灵活微调相结合的政策措施，使经济逐渐降温。GDP 增长率由 1992 年的 14%，1993 年降为 13.2%，1994 年为 12.6%，1995 年为 10.5%，1996 年回落到增长 9.7%。物价上涨率走势略微滞后。1994 年达到 21.7%，1995 年降为 14.8%，1996 年回落到上涨 6%。这样，一度出现的经

---

* 本文系作者 1998 年 6 月 23 日在北京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国际研讨会上的讲话，发表于 1998 年 7 月 6 日《中国企业报》等处。

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得到了有效控制，到1996年底，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这是大家公认的。

（三）到了去年（1997年），人们起初认为，“软着陆”成功后，经济运行已经到了“谷底”，经济增长率下降的趋势应该稳住了，或者重新启动，回升。可是1997年增长率除了在上半年曾稍有反弹外，一路走低，GDP各季增长速度为：

| 第Ⅰ季度 | Ⅰ—Ⅱ季度 | Ⅰ—Ⅲ季度 | Ⅰ—Ⅳ季度 |
|---|---|---|---|
| 9.4% | 9.5% | 9.0% | 8.8% |

1997年全年GDP增长率回落到8.8%，比上年低0.9个百分点；物价上涨率由上年6%回落到1.2%。进入今年（1998年）第一季度，GDP增长率进一步回落到7.2%，与上年同期增长率相比下降了2.2个百分点；市场物价继续走低，一季度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了1.5%。虽然国民经济在低通胀的情况下仍然实现了较快的增长，而且1998年全年和今年一季度的增长率与当今世界各国包括发展中国家相比，还是比较高的速度，但是增长率持续下降的势头，回落到现在国内经济学界公认的当今我国经济增长的适度区间（8%～10%）以下，并且带来职工下岗增多、企业经营困难和金融风险增大等问题，不能不引起人们关注。

（四）这一年多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为何继续逐季放慢？有四个原因。一是前几年“软着陆”过程中经济增长降速的惯性，不能一下子刹住，仍在继续下滑。二是近年来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力度加大，虽然最终有利于提高效率和促进增长，但近期在企业重组和职工下岗过程中却带来暂时抑制增长的因素。三是东亚金融风波的影响，包括对我国外贸出口

和引进外资的负面影响逐渐显露。四是针对上述现象采取的对策措施，没有及时跟上、到位和发挥作用。

（五）实际上，1996年以来实行"软着陆"过程的后期以及"软着陆"成功以后，就已经陆续采取了一些放松金融的措施，包括几次降低银行利息率，取消银行贷款的额度限制，调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等等。去年第4季度以来，随着对境外经济风波影响和境内经济走势认识的加深，金融松动的措施一步步强化。针对东亚金融危机对我国外需出口负面影响和经济增长率继续下滑的趋势，今年3月九届人大选出的国务院新一届政府成立后，就明确宣布1998年经济工作三项目标，一是确保经济增长率达到8%，二是物价上涨率控制在3%以下，三是稳定人民币汇率。提出这三项目标的目的，一方面是要继续保持国内经济"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态势；一方面要认真履行我国对外承诺的国际义务。

（六）为了实现今年的宏观调控目标，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扩大国内需求。我国目前出现了供大于求的局面，但这一局面并不都是由于需求不足的结果，而是包含着三个方面的来由或组成部分。一是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绝对短缺为市场取向改革中初步形成的买方市场所代替，这是改革的一项成果，在合理界限内供给略大于需求，是为实现消费者的选择权利和造成生产者竞争环境所需要的。二是超过正常买方市场合理界限的供给，是真正的生产过剩，这其中有一部分也不是由于需求不足所形成的，而是我国经济生活中盲目投资、重复建设，以及经济过热时期的过度膨胀，泡沫经济所带来的结构扭曲、无效供给、资源浪费的恶果。三是除上述两个部分以外剩下来的供给大于需求

的部分，才是真正的需求不足造成的。“软着陆”成功后，尤其是去年第四季度以来，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和境外金融风波影响的显露，需求不足的问题逐渐突出。由于国外需求缩减的压力尚在发展，一时难以逆转，因此稳住经济增长的重点放在扩大国内需求方面，是完全必要的。

（七）国内需求中的消费需求部分，随着温饱问题的解决，人民生活向小康水平迈进，消费层次的拉开，使消费市场上过去那种排浪式的消费热点短期内难以形成。由于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由于对就业和收入增长放慢的预期以及对福利保障等方面的个人负担增大的预期，居民储蓄倾向进一步强化。因此近期消费需求将保持平稳增长态势，难以作重大启动。所以，扩大国内需求，首先要扩大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重点是加大对铁路、公路、电信、城建、水利、环保等公共设施和基础部门的投资力度，以此来带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使全年固定资产投资由原拟增长 10%提高到 15%以上。其次，要引导和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当前最迫切的是启动城市居民住房消费和住宅市场，同时要努力开发农村消费需求，开拓农村市场。城乡这两个方面的需求市场潜力很大，特别是占全国人口 70%的 8 亿多农村人口，目前在全国消费品市场的占有额只有 40%，是尚待开发的巨大中国市场中的一大块宝地。

（八）扩大国内需求的政策措施不是孤立的。首先，扩大内需要同经济结构的调整结合起来。目前，中国一方面产业结构升级严重滞后，另一方面劳动力丰富的资源优势尚未充分发挥。因此这次扩大投资，要在加大基础产业设施投资的同时，逐步加大机电工业的技术改造投资，以推动产业升级；在向高技术含量、高加工度和高附加值产业倾斜的同时，加大

对可采用大量新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是中小企业)的投资力度。还要压缩陈旧落后、过剩多余的生产能力和无效供给(如目前正在着手拆掉1000万个纺锭)。其次,扩大内需要同体制改革结合起来。目前中国的供需矛盾主要是结构性的,同时又是制度性的。例如,条(部门)块(地方)分割,造成重复投资,带来生产能力过剩和开工不足。又如,福利分房制度,造成住房市场难以推展,等等。要扩大内需,就必须深化改革,转换机制。最后,扩大内需必须在继续坚持适度从紧的中长期宏观调控方针的前提下进行。目前中国经济虽然遇到一些困难,包括增长率下降,就业问题上升,等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运行已经处于类似典型经济周期的停滞衰退阶段,实际上中国经济增长率仍处于相当高的位势上,同时通货膨胀的潜在反弹压力始终存在。因此,不能放弃适度从紧的中长期宏观调控方针。要在继续坚持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的前提下,对宏观调控的措施和力度进行适时、适度的松动和调整。

(九)今年以来,促进经济增长的各项措施正在陆续出台并开始发挥作用。1~5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2.7%,增幅比一季度和前四个月加强;适当增加了货币供应量,扩大了中长期贷款,并加强运用财政手段进行基础建设。从今年上半年的情况看,GDP增长率在7%~7.5%之间运行,全年完成增长8%的目标看来还有一定的难度。但也存在有利条件:一是目前交通、能源、原材料供应、农业、外汇储备、通胀率等等,是多年来最为宽松的,都可以支撑8%以上的增长。二是政府政策明确由降速转向保速,由限制投资转向鼓励投资,由主要稳定物价转向着重解决就业问题。三是各级地方政府

的积极性大，各省市增长目标都定位在8%以上，只要给予政策，不难启动。目前的问题是，已采取的松动微调措施力度是否够，比如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加大到15%能否落实，是否足以保证今年经济增长达到8%，是否需要也可能再增加一点力度，如果提高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幅，在投资动力、项目准备和资金措施上有无保证，等等，这些问题需要及时研究解决。

我认为，随着扩大内需、松动银根和其他一系列有关政策措施的落实，速度下降的趋势将逐渐稳定下来，今年下半年明年上半年将出现回升。中国经济当前更重要的是结构和效益问题，如果抓紧目前最为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致力于结构调整和效率提高，那么增长速度即使暂时下来一点也没有什么可怕，因为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的发展将置于更加坚实健康的基础之上。所以，认真实行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两个根本性转变（体制：由计划转向市场；增长：由粗放转向集约），仍然是当前中国经济的根本任务。

# 第三篇

## 经济体制改革
## （国企改革为重点）

# 27　关于以国有企业改革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问题*

(1995 年 3 月 17 日)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 16 年。经过 10 多年的改革,经济体制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993 年中共十四大第一次正式确认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此为标志,经济改革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1993 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去年(1994 年)是开始实施这一决定的第一年,也是 10 多年改革开放以来改革措施出台最多的一年。按照"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的原则,去年主要在宏观经济管理领域推出了多项重大改革措施。首先是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包括以推行增值税和统一国企负担为主要内容的税制改革,以及在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职能基础上的分税制代替包干制的财政改革。其次是金融体制改革,包括强化中央银行的稳定货币、监控金融的职能,组建三家政策性银行,以及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变开始起步。三是外汇体制改革,包括汇率并轨,实行结汇售汇制和建立银行间外汇市

* 本文系作者 1995 年 3 月 17 日在伦敦中国驻英大使馆内举行的一次报告会上的讲话第二部分(摘要)。

场。此外，在外贸体制、投资体制、流通和价格体制等方面，也出台了不少改革措施。由于改革方案准备比较充分，组织实施中及时解决遇到的问题，所以，1994 年改革整个进展比较顺利，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在一些重要方面做了我们多年想做而没有能做到的事情。当然，1994 年财政、税收、金融、外汇等宏观管理体制的改革，虽然有了一个良好的起步，但它们离新体制完全到位还有相当一段距离。有些宏观管理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遇到微观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传统机制的障碍，比如国家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的转变，在国有企业政企不分、财务约束软弱的问题未解决前，呆帐坏帐占了银行贷款的相当分额的情况下，专业银行怎样能够商业化呢？在这种情况下，宏观经济管理转向以利用利率、税率等间接调控手段为主，也是难以收到成效的。而且国有企业政企不分，只生不死，社会负担重，历史包袱重等等弊端，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结构合理化以及经济效益、素质提高的一个障碍，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去年宏观改革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一方面向国企改革提出了更迫切的要求，同时也为国企改革提供了一些外部环境。所以，今年（1995 年）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要从宏观领域转到微观领域中来，首先要转到国有企业改革上来。

根据去年 11、12 月全国经济工作会议及此后体改工作会议精神，1995 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任务是：重点推进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的国有企业改革，配套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培育市场体系和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宏观管理体制改革，同时抓好其他方面的改革工作。所以，今年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很丰富，头绪也很纷繁，这里不可能一一

细讲,我想只简单谈谈作为今年改革重点的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的国有企业改革问题。

我国国有企业经过十几年的改革,经过千方百计增加技改投入、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加强和改进企业管理,企业活力有所增强,对市场变化的适应能力有所提高。但由于过去的改革基本是以放权让利为主要内容的政策调整,而没有触动企业产权关系的理顺和企业制度的创新,旧体制的束缚和历史包袱(债务、冗员、"办社会"等)使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在竞争能力、效益水平、发展速度等方面与非国有经济的差距逐步扩大。尽管如此,国有大中型企业依然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在多种经济成分迅速增长的情况下,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在国民经济中仍然占有绝对优势,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承担着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任务;是支持改革、促进发展和保持社会稳定的基本力量,为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和其他类型企业的较快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国内外有些人士看到我国国有企业目前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认为只有私有化才能解决这些问题。这是不了解我国国情,更不了解中国改革的方向。中国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当然要发展包括非国有制在内的多种经济成分,但要以保持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为前提,这是不能动摇的。国有企业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只有靠深化改革来解决。

经过10多年的改革,我们已经初步解决了传统体制遗留给国有企业的许多矛盾和困难,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效益比较好的国有企业。但目前困难企业不少,而且存在的问题几乎

都是难度很大的深层次矛盾，诸如产权不清，政企不分，企业所有者不到位，国有资产管理不顺，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以及企业长期存在的债务、冗员、“企业办社会”的包袱，等等。怎样才能解决这些深层次矛盾？也只有进一步深化改革，从过去的放权让利为主转向理顺产权关系，创新企业制度上来。这正是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要求，它指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是今后我国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的大方向。

简单地说，现代企业制度就是适应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企业制度。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内涵，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已有十六个字的概括，就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其核心内容，一是完善的企业法人制度，二是严格的有限责任制度，三是科学的企业领导体制和组织管理体制。现代企业按财产构成可以有多种组织形式。在我国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情况下，公司制作为一种企业的典型组织形式，将同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和股份合作制企业等企业形式并存。就大型骨干企业而言，公司制将是主要的企业组织形式。不论什么形式，都要求实现“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以最大限度地提高企业的效率，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相一致。要防止把现代企业制度片面理解为股票上市，内部集资，或把企业翻牌为公司而机制依旧，换汤不换药。现在已经有不少这种情况。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由于牵涉面广，难题甚多，去年开始做了一些基础性准备工作，包括清产核资，建立新的会计制度等，在国务院统一领导下，有关部门对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查研究，制定了试点方案，研究了配套

措施。试点工作已正式部署,除了国务院确立的百家试点企业外,各省、市、自治区确定的试点企业已近2000家。《公司法》于去年7月1日开始实施,各地对现有股份制试点企业的规范工作正在加紧进行。行之有效的一些企业改革方式,如发展企业集团,企业兼并、联合或引进外资进行资产重组,企业的结构调整,拍卖,破产等,都在继续试行。

今年国有企业改革要围绕企业制度创新,在改革的重点和难点问题上实行突破。在继续抓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各项基础性工作,继续按《公司法》抓好股份制试点和继续推行各项行之有效的改革方式的同时,要下功夫抓好国务院批准的四项试点:一是抓好100户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以及各省市、主管部门抓好自选企业的试点;二是抓好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中国石化工业总公司、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三家全国性公司改建为国家控股公司的试点;三是抓好国务院确定的55家企业集团试点;四是18个城市企业优化资本结构,进行综合配套改革的试点。通过这些试点,要在国企改革的重点和难点问题上取得经验。所谓重点难点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条。

**一是理顺产权关系,分开政企职责。**这里有三个关系要分清。一是要实现国家资产所有者职能与社会经济管理者职能的分开;二是实现国有资产行政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运营职能的分开;三是实现出资者所有权与企业法人财产权的分开。为此,要抓紧研究探索建立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以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二是明确国有资产投资主体,即由什么机构来代表国家所有者持有国有股权。**现在的试点方案初步明确国家授权投

资的机构，主要是国家投资公司、控股公司、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具备条件的国有独资公司和企业集团的集团公司等等。在上述机构未建立或不健全的情况下，国家可授权某个部门机构暂时代行国有投资主体的权利，但对所持股企业不行使任何行政管理职能。

**三是投资主体多元化问题。**除了少数生产特殊产品和属于特定行业的企业可以采取国有独资公司形式外，多数改制企业应通过吸收各类法人、外资及国内自然人资金的方式，和互相参股方式，实现股权多元化，以促进政企分开。多数采取有限责任公司形式。对竞争性行业中的企业，国家可以参股；对支柱产业和基础产业中的骨干企业，国家必须控股。

**四是进行国有资产的战略调整。**国有经济无需掌握所有产业部门，只要掌握战略产业部门即可。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和地区产业结构，确定发展、支持、调整、淘汰等不同企业类型，根据国家和地方财力，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国有企业的战略重组。国家直接掌握的应是控制经济命脉的大型企业、集团和少数重点骨干企业，对这些企业也要通过结构调整和制度创新来增强其活力。对于其他一般企业改组和调整的步子可以更大些，通过关、停、并、转、包、租、卖等方式，促进存量资产优化配置和结构调整。

**五是建立规范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试点企业要根据权力机构、决策机构、执行机构和监督机构相互独立、相互制衡、相互协调的原则，建立由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和监事会组成的公司治理结构，严格按照《公司法》规范进行。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如何体现，是普遍关注的问题，要通过试点来

探索解决途径。

**六是在清产核资的基础上核定和增加企业资本金，并解决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企业过度负债问题。**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对清产核资中清理出来的企业潜亏、各种财产损失，以及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和政策性原因造成的企业贷款损失，按有关规定分别冲销处理。由“拨改贷”和基建基金贷款形成的历史债务，按产业政策、企业经济地位和偿债能力，可分别展期归还，排帐停息，或转为国家资本金。对不能偿还到期债务、扭亏无望的企业，要根据“破产法”和有关规定实行破产，防止假破产真逃债，探索濒临破产企业进行重组的途径。

**七是分流富余人员，妥善解决企业办社会问题，要区别情况，因地制宜，积极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 28　谈谈当前中国国有企业改革*

## （1995 年 5 月 11 日）

### 一、中国国有企业地位的变化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非国有经济成分迅速增长，国有成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持续下降，例如在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工业企业的比重 1978 年为 78.6%，到 1993 年降为 43.1%，相应地，非国有企业的比重大大增加，其中，集体工业企业由 1978 年 22.4% 增加到 1993 年的 38.2%，其他经济类型（包括个体、私营、外资等）企业由零增加到 18.8%。但是，中国国有企业是不是如不少人士所想象的，一直在走下坡路，没有任何发展？不是的。**由于国家的资金投入，企业的技术改造，以及十多年来下放权力的改革使企业增加了一些活力，国有经济仍在不断发展。**例如国有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净值，由 1978 年末 2115 亿元增加到 1993 年末的 8924 亿元（3.8 倍）；工业总产值由 3289 亿元增加到 22725 亿元（6.9 倍）。即使扣除同期零售物价指数 254%，国有经济的增长仍然是可观的。所以，尽管非国有成分增长更快，但**国有企业，特别**

---

* 本文系作者 1995 年 5 月 11 日在英国“中国经济学会”召开的研讨会上的发言，摘要发表于《中外管理导报》1995 年第 3 期。

**是大中型企业仍然是中国经济综合实力的重要体现,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承担着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据统计,1993年在乡及乡以上工业中,国有企业工业产值占53%,固定资产净值占75%,实现利税占66%,负担城镇职工就业人数占68%。国有企业仍然是我国能源、重要原材料、工业技术装备的主要提供者,在基础产业、交通邮电、金融等部门占有绝对优势地位。

**国有企业还在支持中国改革开放、促进其他经济成分企业的发展上,发挥了重大作用。**我国一些重大改革开放措施的实施,各种非国有经济成分的迅速发展,是在国有企业较多地承担国家财政税收,承担指令性计划任务和不合理价格的负担,承担过多的人员负担和较多的社会负担下取得的。可以说,没有国有企业的支持和承载,不可能取得十多年来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成就。所以我们对于目前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要有一个恰当的估计。

## 二、中国国有企业目前存在的问题和出路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有些进步,有所发展,但**总的来说企业活力不足、效益低下的问题还远远未得到根本解决,**不少企业严重亏损(去年亏损面达40%左右),在竞争力、效益水平和增长速度等方面,与非国有企业相比的差距逐步拉大。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复杂,既有历史因素,也有现实因素;既有企业外部因素,也有企业内部因素。这里**最重要的,一是企业机制上政企不分、产权不清、预算制约软弱等弊端尚未解决;二是国有企业长期以来承载着远比其他经济成分企**

**业要重得多的国家财政税收负担和各种社会负担，**致使前者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对于国有企业如何摆脱现在的困境，进一步深化改革，有各种各样的意见和主张。有一种意见认为：鉴于国有企业问题主要在于产权关系不清，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从改变所有制入手，实行私有化才行。这里面大体又分两种观点，一种观点主张把现有国有企业产权分散，落实到或者"量化"到每个国民个人，就像俄罗斯和东欧一些国家私有化过程中所做的那样。另一种观点主张不触动或绕开现有国有企业，而用迅速大力发展各种类型非国有经济的办法，最终把国有企业挤到无足轻重的地位，就像台湾地区和韩国所曾做过的那样。**私有化方案不符合目前中国国情和改革方向，**因而从来不为中国官方所认可。但是，在反对"私有化"的讨论中，也有一种论点不适当地扩大"私有化"概念，把一些属于理顺国有企业产权关系，创新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措施或改革设想，统统划入到"私有化"思潮里面加以批判，我以为这**也是不符合中国改革的方向的。**中国在所有制结构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上的目标，一方面是要继续发展各种非国有的经济成分，同时坚持公有经济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原则，**对国有企业进行"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这是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来的。这项改革**一方面要对国有企业经营范围进行战略性调整，**使国有企业特别是大量小型国有企业从一般竞争性行业中退出，通过出售、租赁等方式转让给各种类型的民有或民营企业去经营。**另一方面着重进行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改革和改组，将其经营领域收缩、集中于自然垄断性部门、公益性部门和国家经**

**济命脉部位,并按照现代公司制度的通行规范,结合企业的具体情况,分类进行"公司化"的改造,**使之实现"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除了极少数特殊产品和服务的供应可以按"公司法"的规定,采取国有独资公司形式外,其他一般都要实行投资主体或产权主体多元化(包括机构投资、个人投资、外商投资、企业相互持股等),采取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形式,对于一些骨干企业还要保持国有机构控股地位。中国国有企业今后改革方向,大体就是这样。

## 三、国有企业改革成为今后几年中国整个经济改革的重点

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改革的中心环节,这在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就提出了。理论上这一点一直未变,但在以往改革过程中,有时着重抓宏观调控的改革,有时着重抓市场和物价的改革,加上国有企业改革牵涉方方面面的利益,难度很大,所以实际上并没有一直把国有企业作为改革的重点。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后,中国的经济改革进入一个新阶段,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

这首先是因为,**前此十多年的改革,基本上是在旧体制外面让新体制成长,主要是在国有制体制外面让非国有制因素成长,在计划经济体制外面让市场经济因素成长,而对旧体制本身特别是国有企业体制本身触动不大,**国有企业没有真正实行政企分开,没有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今后改革进入新阶段,**就是要攻下这些难题,**把改革深入推进**

**到国有经济传统体制内部，使旧体制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其次，1994 年是改革进入新阶段起步的第一年。去年中国经济改革措施出台较多，但主要集中在财政税收、金融外汇、流通物价等方面，改革在宏观管理领域迈出了重要的步伐，在某些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但它们离新体制完全到位还有相当一段距离。而且去年的经验证明，宏观经济管理方面改革的深化，往往遇到微观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传统体制的障碍。例如国家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变，在国有企业欠银行的呆帐、烂帐占银行贷款相当大比重的情况下，是很难实行的。**1994 年出台的宏观调控体制改革，一方面向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提出了更迫切的要求，同时也为后者提供了一些有利的外部环境，**如平等税负，外汇并轨等等。

再其次，1994 年中国政府为抑制通货膨胀的恶化而采取偏紧的货币金融政策，使国有企业原已吃紧的资金更加短缺，加重了国有企业的困难：库存积压激增，相互拖欠严重，企业亏损面大，停产半停产企业数增多。这样，传统体制的弊端，加上沉重的历史包袱和社会负担，再加上宏观环境中遇到的困难，使国有企业相当部分陷入困境，成为中国经济结构合理化和经济效益提高的一大障碍。**国有企业改革关系到中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今后进程和成败，已经到了非动大手术不可的关键时刻。**

中国政府于去年末今年初作出了决定，从今年起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整个经济改革的重点，其他改革将围绕国有企业改革相应配套进行。

## 四、1995年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任务和今后的展望

**经过十几年的改革,中国初步解决了传统体制遗留给国有企业的一些浅层次问题,企业从政府手里获得了某些自主权但并不牢靠。目前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几乎都是难度很大的深层次矛盾,**诸如产权关系不清,政企职责不分,企业所有权不到位,企业经营者和职工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不健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不顺,以及企业长期背负的债务、冗员和各种社会包袱等等。这些难题都要在改革的新阶段着力解决。去年开始做了一些基础性、准备性工作,包括清产核资、制定改革试点方案等等。《公司法》于去年7月1日开始实施,各地对现有股份制公司试点开始进行规范工作。同时,继续推进一些行之有效的改革试验,如发展集团公司,企业兼并,联合或引进外资进行资产重组,以及拍卖、破产等等。今年国有企业改革,将根据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关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要求,在继续抓紧各项基础性工作、继续推进各项行之有效的改革试验的同时,**着重进行国务院批准的四项大的改革试点,这就是:1. 对百户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外加各省市和主管部门自选试点共约2000户企业);2. 三户全国性工业总公司(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中国石油化工工业总公司、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改建为国家控股公司的试点;3. 55家企业集团的试点;4. 18个城市企业优化资本结构、进行综合性改革的试点。**通过这些试点,探索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中前述的一

系列难点问题，取得经验，然后逐步推广。

今年国有企业改革，牵动着整个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当然不能孤军突进，而**要同时处理好以下几重关系，一是要把企业的体制改革同结构改组、技术改造结合起来；二是要把四项大改革试点工作同面上广大企业的改革工作结合起来；三是要处理好企业改革与其他配套改革的关系，**特别要围绕企业改革，大力进行的养老和失业保险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抓紧市场体系特别是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的培育，并继续完善金融等宏观管理体制改革与法制建设。

最后，我想指出，目前中国国有企业的困难和问题不是一日之寒，所以对国有企业的改革也不可能期望旦夕完成，而需要比较长期的艰苦努力探索。现在看来，经过今明两年的改革试点，总结经验，在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1996～2000年）加以推广并不断完善，在本世纪内初步完成国有企业经营机制转换，基本建成现代企业制度，是可能的。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将是一个很可观的成就，它对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和促进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大业，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 29　当前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和难点问题*

(1995 年 5 月)

中国国有企业经过十多年各种经营方式的改革,企业活力有所增强,对市场的适应能力有所提高。尽管非国有成分迅速增长,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在中国经济中仍占优势地位,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承担着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任务。但由于过去的改革以放权让利为主要内容,没有触动企业产权关系和企业制度,旧体制的束缚和历史包袱使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在经营活力、经济效益和增长速度等方面,与非国有经济的差距逐步扩大。不少企业严重亏损,甚至停产、半停产。造成国有企业目前困难的原因很复杂,既有历史因素,也有现实因素;既有外部环境因素,也有内部管理和机制因素。过去的改革,只是初步解决了一些浅层次的矛盾,目前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几乎都是难度很大的深层次矛盾,诸如产权关系不清、政企职责不分、企业所有者不到位、经营者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不健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不顺、以及企业长期背负的债务、冗员和"企业办社会"的包袱,

* 本文系作者 1995 年 5 月在英国牛津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讲演稿摘要。

等等。这些都是国有企业进一步深化改革要解决的问题。1995年国有企业改革，将围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推行各项改革试点。通过这些试点，探索在国有企业改革中一系列重点和难点问题，取得经验，然后逐步推广。下面，我概略地就这些重点和难点问题，介绍我国理论界和实际部门的一些想法和做法。

**一、理顺产权关系，实现政企分开。**这是国有企业众多重点难点集中起来的核心问题，不仅关系国有企业机制的转换，而且关系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体系的建立。对于如何明晰产权关系，实现政企分开，经过多年讨论，中国经济理论界逐渐形成了三个层次"职能分开"的共识。第一个层次是政府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同作为社会经济管理者职能分开。第二个层次是政府所有者职能中，要把国有资产的行政管理职能同产权营运职能分开。第三个层次是在国有资产的营运中，实现出资者所有权与企业法人财产权的分开。这些都是比较抽象的概括。要实现这三个分开，必须探索建立新的国有资产管理经营体系和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具体方式和途径。

**二、上述第一个层次问题，可以归结为要不要设立和如何设立专司国有资产管理的权威性机构。**对此有几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在议会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层次设立这一机构。一种意见主张此机构应设于政府即国务院。一种意见认为应设于财政部内。还有一种意见不赞成设立这样的机构，主张仍由现在的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和财政部分工行使所有者职能。目前立法部门倾向于在国务院设立一个权威性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专司国有资产管理职能，即在政府层次

实行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同一般社会经济管理职能的分离，这比较适合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和改革需要。

**三、上述第二个层次问题，实际上是在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和基层企业之间，要不要设置和如何设置作为中介的国有资产产权营运机构。**一般认为，政府设立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具有行政管理性质，不宜直接营运众多企业的国有资产。所以由权威性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授权委托中介的产权运营机构进行国有资产的产权运营，是有必要的。后者可以作为国有资产投资主体或产权主体，对基层企业进行国有资本金的投资和营运，具体代表国家所有者持有产权或股权，解决国有资产产权主体不明和所有者不到位的问题。目前改革试点方案初步明确国家授权的产权经营主体和投资主体主要是：国家投资公司，控股公司，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企业集团的母公司等。在上述机构未建立或不健全的情况下，国家可授权有关专业管理部门或机构暂时代行国有资产营运主体或投资主体的权利。国有资产产权营运和投资主体对所持股企业不行使任何行政管理职能，所以建立这种产权运营机构时要严格防止借此搞"翻牌公司"的现象。今后专业主管部门的改革方向将是一分为三：一部分职能转划归综合性经济管理部门；一部分职能划入行业协会；产权管理职能转入专业性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

**四、第三个层次的问题即实现出资者所有权与企业法人财产权分开，这是保证基层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地位的关键。**为此，国有资产产权经营机构或投资机构，作为国有资本金的具体出资者，要退居到股权主体或股东的地位，以股东身份对其持有股权的企业实

行股权管理，不干预企业的日常经营，以保障企业在落实法人财产权的基础上独立行使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

保障企业法人财产权和促进政企分开的有效途径之一，是实行投资主体或产权主体的多元化。除少数生产特殊产品和属于特定行业的企业，可以依法采取国有独资公司形式外，多数改制企业应通过存量折股或增量扩股的办法，吸收各类法人、外资、以及国内自然人的资金入股或合作或互相参股方式，实现股权多元化。改制企业多数采取有限责任公司形式。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只能是符合严格规定条件的少数。对竞争性行业中的企业，国家可以参股；对基础产业、支柱产业中的骨干企业，国家则需要控股。

**五、如何正确处理国有资产产权所有与管理中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对此问题目前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凡是政府投资或政府担保贷款形成的资产，均为以国务院为代表的国家统一所有，地方政府不拥有所有权，只受国务院委托行使一定范围国有资产的管理权。第二种观点则肯定地方政府对部分国有资产拥有所有权，明确提出国有资产"分级所有、分级管理"，主张根据现有国有资产的来源及其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划分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县级政府对国有资产的所有权范围，各级政府成立相应的专司国有资产的管理机构和营运机构。第三种观点也认为应该承认地方政府对部分企业拥有所有权，主张把全民所有的"国有资产"同地方社区所有的"公有资产"区别开来。此问题仍在争论，中央政府部门和立法部门倾向于第一种意见，理论界和地方政府一些人士倾向第二、三种意见。

**六、产权转让、流动与国有资产存量盘活、重组问题。**长

期以来中国国有经济经营领域过广,实际上国家管不了也没有必要管那么多行业。今后要适当收缩国有经营范围,国家只要掌握战略产业部门、经济命脉部位即可;那些不该由国家管的企业,应逐步实行非国有化。要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和地区产业结构的要求,确立发展、支持、调整、淘汰等不同企业类型,根据国家和地方财力,逐步实现国有和公有资产的战略重组。通过企业产权整体或部分兼并以及折股合作等方式,实行国有资产产权转让和流动,是盘活国有资产存量,优化资源配置之所必须。除国家掌握的能控制经济命脉部位、能左右市场的大型企业和集团,以及重点骨干企业(对他们也要进行规范化的改造以增强活力)外,对其他中小型企业改组和调整的步子可以更大一些。首先要在综合改革试点城市中创造经验。在推行国有资产的产权转让和流动中,要切实防止目前确实存在的两种偏向。第一种是担心产权转让必然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因而趑趄不前的偏向;第二种是转让方急于成交而低估资产,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偏向。故对产权转让的流动必须端正观念、堵塞漏洞、严格制度,以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真正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七、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中不可回避的难题之一,是债务负担过重和与此相应欠银行大量不良债务问题。**历史上形成大量企业不良债务,其原因除了企业自身经营不善所致外,很大程度上是国家财政政策调整造成的。例如,本属于国家投资兴办的企业和由财政拨款的企业流动资金,1983 年起采取了用银行贷款代替财政拨款的办法,此后企业生产经营资本得不到应有的补充,加上国有企业税负偏重等其他原因,致使企业负债累累,无力偿还,这不仅增加了企业的困难,而且降

低了银行资产的质量，并减少了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有必要在国有经济范围内，进行财政——银行——企业之间的债务重组，建立一种良性关系。上述试点企业和试点城市要在清产核资的基础上核定和补充企业资本金，探索解决历史债务问题的途径。现在已经设想并试行的办法有：对于清产核资中清理出来的企业潜亏、各种财产损失以及由于企业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和政策性原因造成的企业贷款损失，按有关规定分别予以冲销处理。由"拨改贷"和基建贷款形成的历史债务，按产业政策、企业经济地位和偿债能力，分展期归还、挂帐停息，或转为国家资本金，或银行股权。对不能偿还到期债务、扭亏无望的企业，实行破产一批、出售一批、兼并一批。实施破产时注意防止目前已经出现的"假破产、真逃债"的现象。对濒临破产企业探索进行重组的途径。

**八、人员负担过重，也是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处理的难题。**这里包括约占职工总数10%以上的退休人员的养老负担，约占在职职工总数15%以上不能辞退的多余人员的负担，以及企业为职工提供各种社会福利服务的负担（即所谓"企业办社会"），等等。这些问题，要靠建立和健全新的社会保障制度，多途径地分流多余人员来解决。由于我国过去长期实行低工资政策，目前3万多亿元国有资产中，有相当比例实际上应属于广大职工所得之积累。因此在为企业改革进行清产核资时，让出一部分产权或股权给有关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基金组织掌握，用于职工养老、失业救济、住房补贴等，是合乎情理的。企业为职工办的各项福利服务事业，也要逐项从企业剥离，逐步走向独立经营，或成建制地交当地政府或社区组织来管理。